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斯大林之迷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序：何谓“斯大林之谜”？

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人象斯大林这样获得人们爱与恨、歌颂与咒骂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了。有人赞颂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正义、勇敢和智慧的化身，劳动人民之父，进步人类的导师；有人咒骂他是杀人犯、虐待狂、残暴的独裁者、精神病患者。到底什么是他的真实形象？历史能否为他塑造一座这样的纪念碑——大功大过的历史伟人？

斯大林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矛盾复杂的人物之一。人们经常说“盖棺定论”，然而在斯大林去世40年之后的今天，在斯大林被“焚尸扬灰”、重新埋葬之后，人们仍然难以对他论定。他是一个由互相矛盾的多种色彩组成的多面人，每个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方面。这就更增加了他作为历史人物的神秘性。

斯大林生前高居于万众瞻仰的圣坛之上，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有关他的许多事情不为外界所知。死后留下了许多历史谜案，难辨真伪。斯大林是如何从一个穷鞋匠的儿子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苏联的主宰？他如何创造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时代”，并以其举手投足令世界为之震撼？列宁的政治遗嘱对斯大林说了些什么？斯大体是如何在同别人平起平坐中崭露头角登上权力高位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些列宁的战友、党内反对派是如何在斯大林的手下死于非命的？还有斯大林妻子的自杀之谜，基洛夫被谋杀之谜，大清洗内幕，布哈林案件之谜，斯大体的晚年、同事、家庭和亲属，斯大林情爱生活，以及斯大林的死之谜等等，这一切都给后人以巨大诱惑。可以说，斯大林的一生都是个谜。这就吸引我们和读者一起来探个究竟。

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而了解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则是读者的权利。随着越来越多研究斯大林的著作和大量的历史资料的面世，给我们提供了揭开许多与斯大林有关的历史谜案的可能性。本书不打算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只想从众多有关斯大林的最新材料中，力图经过认真、客观、冷静的分析，去伪存真，还斯大林的本来面目，塑造一个真实的斯大林。

对于伟大的政治人物来说，政治不应该被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个人生活之外的东西，政治生活应该是同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他的政治生涯，除了受到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可以从个人的内在素质，人格和心理等方面得到解释。因此，本书紧紧围绕斯大林以及他身边的人和事来展开，从多种角度来拍摄和介绍斯大林，读者可以通过各种镜头来看到斯大林生活的各个侧面。

就现代世界政治格局而言，恐怕没有比他影响更大的历史人物了，他主笔绘制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地图，他把世界历史打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他使社会主义风靡全球，深入人心；同样，他也使社会主义造成了损害，丧失了信誉。有人赞颂他是劳动人民之父，进步人类的导师，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有人咒骂他是杀人犯，虐待狂，独裁者。到底什么是他的真实形象？历史能否为他塑造一座这样的纪念碑？

——大功大过的历史伟人

斯大林这迷

## 一、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现象

1953年3月6日，清晨六时，莫斯科正处在黎明时的沉寂之中，广播电台传来播送要闻的著名播音员列维坦缓慢、低沉、悲哀的声音：“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消息立刻通过无线电波传遍莫斯科，传遍苏联，传遍全球，震惊了世界。

东西方各国政府都迅速召开会议，商讨斯大林的去世会造成的时局变化。

苏联、东欧和中国人民都为这一消息所震惊，各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悲痛之中。

在斯大林去世的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都怀着诚挚的感情和真正的悲伤来向遗体告别，这些厨师、司机、警卫、值班调度人员、园丁以及侍候在餐桌左右的女服务员依次默默地走到卧榻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瓦连琴娜·伊斯托明娜，人们叫她瓦列奇卡，在这所别墅里跟随斯大林18年，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胸上，象村妇一样嚎陶大哭起来，谁也不想去阻止她。这些侍候过斯大林的人都爱他，他们的悲痛是万分真诚的，他们至死都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斯大林更好的人，任何东西，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信念。

遗体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圆柱大厅，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政治局委员和元帅、将军们轮流守灵。通向圆柱大厅的莫斯科各条街道，人群拥挤，汇成人的河流，人们真心实意地哀哭，悼念这位伟大领袖。

一个处在权力之巅的伟大人物的去世，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也造成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仿佛擎天柱倒，大厦将倾，人们心中一片茫然，不知道没有他的存在是什么局面。这种巨大的历史性悲痛，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斯大林的遗体被解剖，经过防腐处理，被装入水晶棺，安放在红场的列宁墓中，同列宁一样，他成为社会主义、苏联人民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象征。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世界各国政府要人、来宾到这里敬献花圈、花篮，对这位伟人表示悼念。无数的苏联人到这里来瞻仰这位领袖的灵墓，献上他们带来的松柏、鲜花，表达他们的爱戴之意和怀念之情。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党内暗滋潜长着反斯大林的情感。时隔三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终于形成了大反斯大林的潮流，这个潮流的弄潮儿便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刚结束，中央委员和代表们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临近午夜，所有的人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代表们听着中央第一书记惊心动魄的演说，如同在万里晴空爆炸的一声巨大惊雷。赫鲁晓夫第一次揭开了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恐怖的事实，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斯大林的粗暴、残忍、心胸狭隘、滥用职权和飞扬跋扈，在“阶级斗争”和反对“人民敌人”的名义下，成千上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被逮捕、流放、严刑逼供，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

就被枪毙。赫鲁晓夫的发言震惊了全场听众，使他们目瞪口呆，会场上不断出现一阵一阵的惊叹和愤怒的呼喊。

原波兰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列泽克·柯拉科夫斯基写道：“尼基塔·赫鲁晓夫向苏联共产党，不久以后向全世界这样宣称：那个曾是进步人类的导师，全世界的鼓舞者，苏联人民的父亲，精通科学和学识渊博的大师，最卓越的军事天才，总之是历史上最伟大天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虐待狂患者，大规模屠杀者和一个曾把苏联国家推向灾难边缘的军事上的门外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但在当时还局限在中央委员和代表的小范围，因此是秘密的，不为外界所知。事后，这一报告的副本送给兄弟共产党，所到之处无不为之震惊。美国中央情报局听到这一消息后，把搞到这一报告当做特大任务，终于通过以色列情报机构以高价购得这一报告的全文，不久以后，便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这一报告便成了无人不知的“秘密”。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息的封锁，却还属于超级机密。然而，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已经明确无误地全面展开。这一历史性的举动震惊了苏联党，震惊了人民，同时震惊了全世界。赫鲁晓夫的声音由此变成了世界声音，他以这胆大妄为、骇人听闻的举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个原来被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等无数人小瞧了的“庄稼汉”却是一个敢作敢为、足智多谋的“政治魔术大师”。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遇到了一些党的领导人的反对和抵抗，出现了曲折和反复。1959年12月21日，苏联报刊以大量篇幅纪念斯大林八十周年诞辰，《共产党人》杂志这样写道：“12月21日是约·维·斯大林八十周年诞辰。他是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约·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献身于劳动人民的利益。三十多年来斯大林一直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对党、对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都做出了伟大贡献。”

1961年召开了苏共二十二大，11月17日，赫鲁晓夫登上讲台，做了一场不留情面、措词激烈的发言，全面抨击斯大林。一些中央领导人揭发了斯大林时期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真相。大会闭幕前，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的代表们要求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搬出列宁墓。大会为此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其他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不再可能”。决议于10月30日上午通过，10月31日傍晚执行。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斯大林的棺材放了进去，没有往墓坑里填土，却运来了几大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坑底的棺材上。斯大林被“焚尸扬灰”。墓上简单地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维·斯大林”。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闭幕时，列宁墓里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了。著名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克在一首轰动一时，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黑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去。  
棺材慢慢地飘起，擦过了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沉默、长眠。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是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他只不过是打个盹儿，他在筹划，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1963年7月19日，为欢迎匈牙利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他以更强烈的措词表达了反对斯大林的决心：“斯大林枪杀了自己的人！枪杀了革命老战士！正因为他如此霸道，所以我们谴责他……那些想要改变我国的领导，想为斯大林滥用职权的种种行为辩护的人，是在作徒劳的挣扎……谁都不能为他洗刷，无法将黑狗洗成白狗……”。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其狂涛巨浪席卷社会主义各国，波及全世界。以此为最大的触发点之一，带来了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导致中苏长期的尖锐对立。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大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运动。赫鲁晓夫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可耻叛徒、修正主义的大坏蛋、大野心家和大阴谋家、反革命的两面派，他在斯大林生前把斯大林称为生身父亲，而在斯大林死后则把他咒骂成“魔鬼”。毛泽东以此为历史借鉴，提出了反修防修的伟大历史任务。1966年在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修防修，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埋藏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次会上通过决议，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和摧残。1969年11月12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河南开封的一处无人知晓的阴暗囚室中含冤去世，死后以患烈性传染病的名义被迅速地秘密火化，留下了一小盒化名的骨灰，他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权利也被取消。当时的中国，没有人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去。

1964年10月14日，正在黑海岸边索契自己的别墅里安然度假的赫鲁晓夫突然接到通知，立刻赶回莫斯科，但他已经不是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而是以退休者的身份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从此新的中央第一书记叫勃列日涅夫，而新的部长会议主席叫柯西主了。赫鲁晓夫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开始以其充沛的精力去适应“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这个“唯意志论者”、“主观主义者”被罚不许开口，闭门思过。赫鲁晓夫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1971年9月他去世的时候是在报纸上以一行小字被披露的，他在一处偏僻的墓地留下了一个不起眼的坟墓，上面简单地镌刻着养老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他没有能享受葬在莫斯科红场的荣誉。推倒了神像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他应得的

惩罚。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开始有步骤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一些元帅和将军撰写回忆文章，歌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苏联知识阶层以不同的形式抗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一封由 26 名全国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递交给中央委员会。1969 年 12 月，为纪念斯大林九十周年诞辰的活动在党内引起了辩论，匈牙利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和波兰党中央书记哥穆尔卡对莫斯科进行了紧急访问，劝说苏共中央不要进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活动，西方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党也有类似的反应。这样就没有能够公开而全面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

1970 年底和 1971 年初，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内容相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读书出版以前，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出版这本回忆录的消息。苏联塔斯社于 1970 年 11 月 16 日发表了一个所谓赫鲁晓夫声明：“我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过任何人”，“这一切纯属虚构”。但出版者深信不疑，本书内容是赫鲁晓夫谈话的真实记录。中国也翻译出版了这本回忆录。

在这本回忆录的“赫鲁晓夫自序”中写道：“斯大林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天才？他究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慈父’呢？对于我们国家所流的血，斯大林个人应该负有多少责任呢？我们应该揭开掩盖这些和其他问题的答案的盖子。斯大林应该被赤裸裸地暴露在苏联人民面前，这样才能使他在历史上占有恰当的地位。”“斯大林是有功绩的，而且功绩是很大的。”“他确实是具有卓越的才能和智慧。”“然而，假使他今天还活着并让大家投票表决，我就将这样投票：按他的罪行审判他，惩处他”。“我是以一个终生和苏联人民有密切接触并且也是在党的领导方面多年追随斯大林的人的身份来说话的。作为那些年代的见证人，我向后来的一代人讲这些话是为了希望他们将会避免过去的错误”。

这本回忆录是赫鲁晓夫 1956 年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和击退任何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企图。如果这本回忆录是真实的话，那它无疑成了赫鲁晓夫的最后政治遗嘱。同样的，赫鲁晓夫也以他不妥协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而载入了历史史册。

到 1979 年 12 月 21 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纪念约·维·斯大林诞辰 100 周年》的社论，称斯大林“是一位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肯定了他在领导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巨大功绩，同时谴责了他“破坏法制、粗暴地滥用权力、背离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以及由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种种颠倒”。

1988 年 2 月 4 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销五十年前（1938 年 2 月）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判决，宣布为他们彻底平反。苏共中央重新为布哈林恢复党籍。布哈林这个昔日被枪决的“外国间谍”、“特务”、“人民公敌”，重新被确认为党和国家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呼吁在莫斯科建立一个斯大林时代受害者的纪念碑，以纪念在斯大林进行血腥清算及实行农业集体化期间丧生的数以百



万计的人。苏联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将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的纪录影片《第二号危险人物》，该片把斯大林描绘成疯狂的独裁者，其偏执狂导致了无数知识分子、犹太人、军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和其他人士被处死，一位苏联艺术家这样评论。千百万人观看了首播。1989年是东欧剧变的一年。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苏联出兵取得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国家的性质为之改变。12月25日，动乱中仓皇出逃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抓获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被没收全部财产。以扬·伊利埃斯库为主席的救国阵线委员会上台执政，改国名为罗马尼亚共和国。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国名和国徽，国名：波兰共和国；国徽：红色天幕下的白鹰，加上皇冠。

1990年3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他在宣誓就职时表示，他不是某个阶层或政治派别的代表，将不带感情色彩地考虑社会上的各种观点。多党制的迅速发展构成了对苏联共产党的严重挑战。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此外，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20个地区和城市，反对派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夺取了政权。苏联国内已处于危机四伏之中！

1991年6月19日，早已退出苏联共产党的叶利钦以57.3%的选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首任民选总统。形势的急转直下预示着一场暴风骤雨就要来临。

8月19日，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获知他“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组成的8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并实行紧急状态。然而，8·19事变真是昙花一现，两日之后戈尔巴乔夫就重返莫斯科，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参与政变的成员被逮捕，内务部长普戈自杀身亡。政变烟消云散，而在政变中登上坦克振臂高呼的叶利钦却如日中天，相形之下戈尔巴乔夫显得暗淡无光。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8月29日，苏最高苏维埃决定暂时停止苏共活动。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等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

11月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一切活动。

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就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已成协议，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电视演说，宣读了他的辞职声明——《告人民书》。他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也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于当晚7时20分把核按钮移交给了叶利钦。7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国旗悄然降下，换上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国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止。

苏联解体，速度之快，方式之简单，超出了当代最大胆、最有想象力的

预言家的估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了一本《1999：不战而胜》的权威著作，似乎连想也没有想过苏联会垮台，他的战略仍是建立在美苏争霸的基础之上的。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社会主义苏联 70 多年的存在，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这就是斯大林的时代。斯大林所亲手构建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到此已不复存在；斯大林所主笔绘制的战后世界政治地图到此已面目全非。如果说苏联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义的话，那么苏联的解体同样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意义，可能它的影响更加深远，因为它同时结束了对欧洲和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多民族单一制大国 400 余年的存在。从国家史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堪与人类历史上罗马帝国（公元前 753—公元 476 年）、拜占廷（4 世纪—1453 年）、哈布斯堡王朝（1282—1867 年）、奥匈帝国（1867—1918 年）、奥斯曼帝国（1326—1918 年）的覆灭相提并论。然而，上述这些帝国的存在与灭亡只产生过局部的、地区性的影响，苏联则不同，它存在时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世界每个角落都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它的影响，它的灭亡无疑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事。早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沙皇俄国就是“欧洲宪兵”，而苏联则登上了世界超级大国的高位。我们知道，1812 年拿破仑投入 61 万大军，一度占领俄国首都莫斯科，1941 年希特勒投入 500 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都未能灭亡俄国和苏联。直到苏联突然解体时，它还保有足以致任何敌人于毁灭的世界一流军力和武库。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苏联的垮台结束了社会主义整整一个历史阶段。以苏联为核心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由此进入低潮已是既成事实。

我们以跳跃性的快镜头剪辑组合了这一些历史片断，可能它表面上缺乏故事性的情节联系，但读者却会发现这一系列事件内部的关联，由此对斯大林问题有一个总的印象，并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大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这些同样是我们苦苦思索以求得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虽然早已去世，但他留下了一个时代，这一时代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这就是斯大林时代，它以其翻天覆地、摧枯拉朽和惊心动魄、矛盾复杂而高居于历史的奥林匹斯之巅，给人以巨大震撼。一切后来者，只要是这一历史的子孙或同这一历史有关的人，都不可能完全逃避它的缠绕。这正象古希腊的多头怪物：你不回答我，我就把你吃掉。现实就是在对历史的回答中，在历史的惯性推动下并在它的缠绕中开拓前进的！

同斯大林有关的书，成百上千，汗牛充栋。这不只是在研究一个人，而同时是在研究一种现象，这就是斯大林现象，它远远地超出苏联的一国国界，而涉及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甚至涉及到人类的政治观念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虽然早已去世，并且被赫鲁晓夫重新埋葬，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无处不在，不管你是爱是恨，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以此显示着他强有力的生命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进入一切伟大人物的最伟大之列！

斯大林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当我们在阅读有关斯大林的大量资料时，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强有力的震撼，不管你能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你都会经受一次心灵的痛苦考验。这种感受是无法形容的，它或许能够同这一点相比拟：昨天你刚刚参加了一个人的追悼会，今天却突然在大街上见到他。你

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不完美的，但斯大林确实是一个诞生在冷酷无情的时代并改造了这一时代的冷酷无情的人，因此对于想要认识斯大林的人，也需要有坚强的神经！

读者可以跟随我们从全景式的、特写式的、蒙太奇式的多种镜头来熟悉和了解这个伟人。

## 二、从柯巴到斯大林

今天，斯大林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斯大林，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历史史册。

然而，“斯大林”，则是他三十四岁的时候才取的名字。他一生自己取过两个名字：一个是柯巴，流行于革命者中间；一个就是斯大林，震惊了整个世界。

斯大林，最鲜明简洁地表达了他的性格特征，它的俄文意思就是“钢铁”，钢铁般的性格，一个铁腕人物。同样地，柯巴这个名字，同他的性格也极相符合。“柯巴”，意思为“不屈不挠的人”，“无情的人”，在格鲁吉亚的传奇故事里，这是一个绿林好汉的名字。

1935年，当斯大林已经功成名就，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的时候，他返回故里，去看望他的母亲，她对他说：“真可惜！你没能当上神父。”这是她一生深感遗憾的事。斯大林活着时，常常以赞叹的口吻说起这番话，欣赏他母亲对他所取得的人间盛誉及对凡尘利禄所持的轻蔑态度。

那么，从人生的起点开始，生活又是如何安排了一个人的命运的呢？

1879年12月21日，一个婴儿在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城镇哥里降生，受洗时被赐约瑟夫之名。这样，东正教的地方神甫就登记下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名字。

他的父亲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祖祖辈辈都是农奴，他自己则成了一个小鞋匠，与一个农奴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结婚，他们生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小的瑟夫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维萨里昂体格魁梧，黑眉浓须，脾气暴躁，他酗酒成习，把挣的钱都买酒喝了，没有足够的钱养活全家。格鲁吉亚人以能喝酒著称，“醉如鞋匠”是人们的一句口头禅，可见，鞋匠的喝酒更是出类拔萃。

叶卡捷琳娜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把全部的爱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她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才勉强养家糊口。她以当洗衣妇和清洁工所挣的微薄收入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1886年，约瑟夫六、七岁的时候，患了天花，病得死去活来，脸上永远留下了明显的麻子。由于左手长疮，化脓感染，他差一点又死去，当他康复以后，左臂留下了残疾，这使得这位未来的大元帅在1916年被宣布免服兵役。

小约瑟夫在这与生俱来的悲惨和贫困里长大，喝醉酒的父亲的打骂更是常事。有一次，他将一把刀子朝父亲身上投掷过去，父亲怒吼着追他，邻居们把他藏了起来。无情的殴打使这个孩子从小就学会反抗，无所畏惧。

好在有他母亲的爱护，叶卡捷琳娜具有东方妇女无限忍耐和驯顺的性格，在困苦的生活中她把教堂视为唯一的慰藉和人生的目标。在她的极力坚持下，小约瑟夫没有被父亲带到制鞋厂去当鞋匠，而进入了一所初级神学校。这样，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新的鞋匠，而多了一个有着不可预测的前途的小学生。对于一个农妇来说，让自己九岁的孩子去上学，这不亚于是一个英明果断的决定，因为大多数穷苦孩子都象父辈一样渡过了自己的一生。

在哥里学校里，约瑟夫成了最拔尖的学生之一，他天资聪颖，有极强的记忆力，顽强而有毅力，总想出人头地。然而，他也在学校里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对于自己的低贱和他人的富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的同学伊雷

马什维利后来描述他当时的形象是：瘦而结实，鹰钩鼻子，窄脸有麻子，活泼好动。他身材虽小，但强壮有力，好斗，是学校最优秀的摔跤手。

189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酒后争吵斗殴中被人用刀子捅死，那时他才十一岁，他的经历留下的都是痛苦的回忆。从此以后，他没有了粗暴凶狠的父亲，只有同母亲相依为命。

1894年，15岁的约瑟夫独自一个离开哥里的母亲，进入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府，在这里，约瑟夫开阔了眼界。在这个神学校的头两年，约瑟夫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一个用功听话的模范学生。但他个性极强，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威严，他与同学距而远之，也不招人喜欢。

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约瑟夫从这里借阅大量的各种著作，并开始接触一些被称为禁书的进步书籍。特别对约瑟夫有直接影响的是两个比他大的同学，一个是楚鲁吉泽，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才干超群，勇敢无畏；一个是凯茨雷维利，是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他们都极端仇视旧制度，主张革命。1905年6月楚鲁吉泽患肺病去世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游行示威。

约瑟夫开始参加政治活动，组织工人小组，反抗神学校的专横。1899年，他被开除学校，理由是“无故不参加考试”。显然，神学校已讨厌这个惹事生非的学生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二十多岁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取名柯巴，成了一个革命者。约瑟夫走上革命的道路，同其他几位革命领袖有很大不同。列宁作为一个被封为贵族的国民教育视察员的儿子，反抗旧制度是由于他作为大学生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暴发的犹太地主的儿子，则是从他家的窗口去观察贫困和剥削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青年人改变旧世界的激情；而约瑟夫，则是因为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对于社会的压迫有直接的刻骨铭心的体会，不革命就没有出路。

1900年，可以说是柯巴职业革命生涯的开始，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启发了他的思想，他一边在第比利斯的一个气象站当观察员，一边组织工人活动，这是他革命的见习期。这时候他还没有什么专门技能，又不是豪门子弟，只沾上知识分子圈子的边，即使在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他的出身也是够寒酸的，社会地位低贱，脸上有麻子，胳膊有残疾等痛苦的感觉是造成他对别人别别扭扭和气势汹汹以及自卑感的因素。但他是充分具备过地下生活的条件的，他独身一人，能够吃苦耐劳，有头脑而又有强烈的奋斗精神。

1900年“五一节”，柯巴参加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并发表了演说，这次游行发展成为同警察的冲突，一些人受伤和被捕。这次行动对全国都产生了影响。

1901年11月，柯巴被选入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受委派来到巴统。这是一个位于黑海沿岸的小城，是高加索新兴的工业中心。柯巴在这里开始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1902年2月组织了一次罢工和游行示威。这是一次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列宁也赞扬它是在高加索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次示威导致了一次流血事件，柯巴第一次被捕。坐牢和流放，在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是家常便饭。

在他被捕以后，警察局给他立了个档案，档案中有正面和侧面照片以及如下说明：“身高：2俄尺4俄寸半。体型：中等。年龄：23。左脚第二和

第三趾头联趾。头发：黑褐色。胡须：褐色。鼻子：直且长。前额：直而狭。脸：长，黑，有麻子。”

1903年7月，在他被关押了一年半之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流放是一种较轻的刑罚，在流放地的生活也较为自由。然而西伯利亚的严寒和孤寂却是对人的意志的考验，柯巴有生以来第一次从炎热的格鲁吉亚来到这里，就遇上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差一点冻死，脸和耳朵都冻坏了。他终于在1904年1月逃回了第比利斯，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一个工人谢尔盖·阿利卢耶夫的家里。

柯巴作为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成员来到巴库，这是俄国的石油中心，并参与了党内的理论斗争。1905年1月，他发表了一篇《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文章，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他已读过列宁1903年写的名著《怎么办？》，赞赏列宁关于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高度集中而纪律严明的党的观点，他把列宁看成是“党的山鹰”，翱翔在其他领导人之上。

1905年12月，柯巴前往芬兰参加在坦默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列宁。许多年以后，他描述了列宁给他的最初印象：“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可我看见的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然而，列宁的谦逊质朴、非凡的说服力、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和敏锐的政治分析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柯巴又先后两次到国外出席了党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第比利斯和巴库从事的组织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在党内已逐渐成名。他同奥尔忠尼启泽和伏罗希洛夫在巴库搞得有声有色。

1908年3月25日，柯巴第二次被捕，关押在拜洛夫监狱，年底又被判处流放两年。到1909年6月，他又从流放地逃跑，回到巴库。1910年3月再次被捕，重新被流放，这次他服满了刑，但到1911年9月，他违法前往圣彼得堡，又被捕，再次被流放。

从1912年起，他改名“斯大林”，用一个表示“钢铁”的名字来签署自己的文章。那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想在名字中固定自己的坚定性，革命家列·鲍·罗森菲尔德也改名“加米涅夫”，在俄文中是“石头”的意思，他远没有象朱加什维利那样的意志。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头”抵不住“钢铁”的坚硬。

从此，他生涯中高加索的一章结束了。柯巴改名思大林，从一个格鲁吉亚地下工作者逐渐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领袖。然而，监狱和流放也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2月，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跑，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时，列宁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被任命为俄国局的成员。他同莫洛托夫创办了一份《真理报》，故意取了一个与托洛茨基在国外办的《真理报》相同的名字。斯大林再度被捕，又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刚到那里不久又逃回圣彼得堡。

1912年底，斯大林到国外参加会议，他同列宁两人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维也纳，斯大林完成了列宁交给的任务，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文章，列宁很欣赏这篇文章。斯大林由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斯大林同列宁两人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两人都矮小，体格健壮，长相

有点象亚洲人，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列宁的前额向前突出，容易激动，个性强悍，而斯大林则持重深沉，同样具有极强的个性。

1913年2月，斯大林在彼得堡再度被捕，这是他最后一次被捕，也开始了最后一次长达四年之久的流放。

这是一次严厉的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位于北极圈附近，这里气候严寒，大部分时间是漫漫冬夜，冬天的夜晚象是没有尽头，因为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里，只有一两个小时有一线光明冲破黑暗。生活就象原始人那样与大自然搏斗。许多流放者发了疯，自杀现象层出不穷。在这个地方，只有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活下来，而这种经历在他们身上永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斯大林后来常常谈起西伯利亚，谈起“它那严峻的美和粗犷沉默的人民”。他热爱西伯利亚，热爱那里原始荒凉的大自然。他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并且相处得很好，他们教他捕鱼，而且常常捕到很多的鱼。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斯大林常常收到老朋友阿利卢耶夫一家寄来的棉衣和零用钱，他写信表示感激之情，但请他们不要再寄了，因为他们也不宽裕，只是希望能寄来一些介绍地方风光的明信片，因为这里太沉闷、太单调了，这里简直与世隔绝。在那些岁月里，这是孤寂生活中的一点感情慰藉。

斯大林在给阿利卢耶夫的妻子、他未来的岳母欧里加·阿利卢耶夫的信中写道：“敬爱的欧里加·叶甫根尼耶夫娜，我非常感谢您的善良和纯洁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盼望着被释放的时刻。届时，我将到彼得格勒，向您、向谢尔盖为我所做的一切致谢。再过两年我就可以去看你们了！”“我收到了您寄来的包裹。谢谢。我求您一件事——以后不要再为我花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钱啊！”在信的结尾，他“向男孩子们和年轻的小姐们致以问候。我希望他们一切都好”。这些“年轻的小姐”包括他未来的妻子娜佳，她当时还只有十四、五岁。

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已有三十六、七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政治斗争历程，他见过党的大多数知名领袖，同列宁密切共过事，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能一眼看出别人的长处和短处。他已经意识到，他不比任何人差，甚至他可以干得更好。以前，他由于出身卑微而怀有深深的自卑感，对人出言不逊，举止粗鲁，性情怪异，常常和同伴们难以相处。现在，他基于对自己能力的认识，乖张的行为才有所改变，他开始变得比较温和和通情达理，并逐渐养成一个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

他心中正在形成一种伟大的信念，这就是要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再也不是软弱、不发达、管理不善、任人宰割的俄国，而是强大的、有威力的、能够支配世界的国家。他有一股穷人身上的穷志不短的傲气，这股傲气连阻挡的山都搬得动，他还有一种为达目的而忍辱负重的巨大耐性。在党内上升到领导地位，他不是靠耍手腕，阿谀奉承，而全凭自己的本事、忠心耿耿和努力工作。这将决定他要一往无前，奋斗下去。

斯大林虽然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但他现在却已经把自己和俄罗斯民族溶为一体，他了解俄罗斯的伟大历史、它的人民、语言和大自然，他一生深深地热爱俄罗斯。

格鲁吉亚人一般都身躯颀长，肤色深暗，头发漆黑。据说他们秉性粗犷豪放，反复无常，脾气暴躁，慷慨豁达，殷勤好客，健谈善变。这个豪放的民族出了不少诗人、演说家和酒豪。

然而，斯大林除了某些身体特征外，却完全不象格鲁吉亚人，他把自己当作一个俄罗斯人，他投身于俄国革命，并且要创造俄国革命的未来。



### 三、列宁的政治遗嘱之谜

1924年1月21日，列宁病逝。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和托姆斯基乘坐雪橇，穿过寒风凛冽的冬夜，从莫斯科驶抵高尔克村，向这位领袖告别。

列宁的逝世，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卷起一阵悲痛的浪潮。在莫斯科，列宁的遗体被安放在后来叫做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中。在1924年冬格外冰冷刺骨的严寒中，人们排着数小时的长队来瞻仰列宁的遗容，表达他们的深厚感情。至少有70万人在这里汇集，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潮。

广大民众对俄国革命的巨大热情，对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美好愿望，再加上俄国人世世代代的宗教感情，自发地形成了对列宁的狂热崇拜。一项最异乎寻常和最惊人、也最合情合理的决定产生了：列宁的遗体被保存，经过防腐处理，安置在水晶棺中，陈放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旁边的花岗石陵墓里供人瞻仰。列宁的陵墓成了圣坛，列宁成了新的神，共产主义是神圣的。列宁，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苏维埃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象征。

1924年1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题为《失去父亲的孤儿》，这是一篇深有感情的颂辞。“列宁同志首先是一位领袖……这样的领袖在人类历史上数百年才出现一个……在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如此为他的战友所爱戴的领袖”。

在高加索养病的托洛茨基，没有能参加葬礼，他在一封电文中同样表达了一个强烈的崇拜之情：“党失去了父亲，工人阶级失去了父亲，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领袖逝世消息所激起的感情”。

斯大林的演讲成为更引人注目的、对人民群众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悼辞，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列宁宣誓：“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列宁的崇拜以至迷信成为后来党的领袖个人迷信的一次最重要的开端。无疑的，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领导者，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和盛誉，然而，对作为一个人的崇敬和对作为一个神的崇拜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

虽然列宁从1921年就经常患病，后来卧床不起，但他并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他认为领袖应该是在大家的拥戴中产生，他设想的是集体领导。

在列宁逝世之后，任何人想要继承伟大领袖列宁的职位，都会被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冒昧。领导全党的是政治局，在政治局内形成了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或三人执政，此外还有影响巨大的托洛茨基。当时，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兼任彼得格勒党的领袖，长期是列宁的亲密同事，他被认为是党内第一号人物，而他自己也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合乎逻辑的继承人。加米涅夫长期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是列宁的第一副手，又兼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一位革命的传奇式的领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他创建红军赢得内战的胜利，他被看做是“红军之父”和“胜利之神”，他的巨大才干得到公认，但他的自负、狂妄傲慢、装腔作势和高压手段却令人厌烦。斯大林，这时在“三驾马车”内充当第三号人物，他担任党的总书记，身兼书记处、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他倒有点默默无闻，特别同两个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相比，更有点相形见绌，他沉默寡言，是个自我沉思、

很少说话的人，他干着不引人注目的行政和组织工作。此外还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等人。

还在列宁逝世以前，代替病中的列宁处理领导事务的“三驾马车”就同托洛茨基发生了几次冲突，他们都讨厌托洛茨基，特别讨厌他的巨大才干和狂妄自负性格的结合。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无关大局的配角，后来被斯大林流放到国外的托洛茨基称斯大林是“我党最杰出的才能平庸的人”。他们对斯大林的认识为后来的事实所否定，但也因此埋下了他们后来失败的种子。

斯大林并不显得是一个竞争者，他不引人注目，平静而谦虚，他一向是党员和干部易于接近的，能够耐心地倾听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他可以站在室内的一个角上，刁着烟斗，花上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倾听一个心神不安的地方书记或普通党员诉说他的困难。曾任斯大林的秘书、后来逃亡国外的巴扎诺夫写道：“他在沉默方面的禀赋是很高的，就这方面而言，在一个夸夸其谈的国度里，他是绝无仅有的。”他对待批评可以表现得心平气和，就是在向反对派进攻时，他也不象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那样尖刻。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力求做到善与人同。

就连大肆诋毁斯大林的安·费·安东洛夫-奥费申柯也在书中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非常爱好争论的人。在20年代初期，辩论的声音响彻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列宁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争论者。在这种环境下，斯大林的那种保持沉默的本领是惊人的。他把几十年来养成的沉默寡言的作风变成了一种锐利的武器，使他能够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斯大林已经暗中把自己做为列宁的最可能的继承人。他在与列宁以及其他周围同事共同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有深刻的认识，列宁是他尊敬的领袖，他服从列宁的领袖地位，并且维护列宁的威望，但他并不盲从，有时还公开同列宁冲突，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这曾经引起了列宁不留情面的批评。列宁病重以后，斯大林开始认真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他认为其他任何人都不足以领导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自己，才是最当之无愧的合适人选。这样，他就有了—种肩负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使命感，并且为此而展开了扎实而有效的活动。

正是在这时，列宁逝世后不到四个月，发生了一件关系到斯大林政治命运的“爆炸事件”。1924年5月，在第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列宁的夫人、有条不紊的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逝世前的两份口授记录寄给中央委员会，并给加米涅夫附有一封说明信，说她所以扣压这两份被称为“遗嘱”的记录，是因为列宁表示过明确的希望，这些记录要在他逝世以后交给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收到这两份记录的第二天，加米涅夫就将这些记录在由六名政治局成员组成的小组中进行了传阅，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决定把这些记录交给党的代表大会做参考。

1924年5月21日，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到会的是四十多名中央委员，宣读了列宁的“致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这封信对党的六位最高领导人逐个做了全面评价，特别指出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他太粗暴，不适宜担任总书记职务，建议把他调开，换一个更好的同志代替他。这对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指责，斯大林事

前对此一无所知，他现在为此而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忧虑。他一直对列宁是忠诚的，作为列宁最得力的助手，他勇敢无私地把自己贡献给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位自己尊崇的伟大领袖的挑战，对于事情的结局他没有把握。斯大林面对主席台坐在右边第一排椅子上，紧皱眉头，一言不发，绷着脸，两眼直视窗外，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然而，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他们需要斯大林，为了共同对付托洛茨基。斯大林当然更需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帮助来渡过难关。季诺维也夫首先发言：“同志们，你们知道，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我们不止一次宣誓要实现伊里奇的遗志，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没有出现，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列宁的担心是多余的，建议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托洛茨基以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以他强有力的表情，显示出他对这一切的轻蔑，在他的心目中，他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毋庸置疑的伟大领袖。

加米涅夫一直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他现在提议通过表决来决定。表决结果，以三十票对十票决定，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这些记录不应发表，不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同时向他们说明，列宁当时病重，他周围的人向他提供了不准确的消息。

斯大林因此松了一口气，但在当时大家正对逝世不久的列宁狂热崇拜的气氛中，他还是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提出了辞呈。结果，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中央委员会，一致投票不接受他的辞职。决定斯大林一生政治命运的爆炸性事件，就这样悄悄地处理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共同赢得了这一次胜利。

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信件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它是党内的一项机密。有意义的是，斯大林在一生中一直保存着列宁的信件，他去世的时候，这封信在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被人们发现。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公开宣读了它的内容。

长期以来，列宁的遗嘱被秘而不宣，各种历史教科书和宣传舆论使我们形成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宁唯一真正的战友和思想路线的继承者，列宁-斯大林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两人共同领导了俄国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定论是如此千真万确，不可动摇。然而，列宁遗嘱的公开和当时历史材料的披露，使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列宁为什么要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同样地，还有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的看法，都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重新认识。

列宁的身体一向强壮，1918年8月遭社会革命党人范尼娅·卡普兰枪击不久，就康复并重新工作。但到了1921年，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脑动脉硬化正损害着他的身体。这位身材矮壮、曾经精力无穷的人，变得容易疲倦了。他变得脾气暴躁，容易发怒。夏天他用了不少时间到离莫斯科不远的高尔克村休养。

内战之后斯大林担任三个最重要的职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下，他被任命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说明列宁对他高度信任，因为建立这个机构是为了自上而下地监督政府各部门，以消灭旧政府遗留下来的颞颥无能和贪污腐败这些缺点。

1922年4月3日，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斯大林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为他的助手。总书记的职能是协调复杂的党内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从名义上说，它从属于政治局，是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一个秘书班子，在俄文中，书记和秘书是同一个词，书记就是秘书。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人都看不起这一工作，这一疏忽大意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斯大林这时已身兼四职，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惊人的权力，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

1922年5月26日，一次严重的中风后列宁的右半身瘫痪，不能说话。但他不是一个对疾病消极低头的人，他一再奋斗，来克服瘫痪和恢复说话的能力。在休养の数月中，他得以退居幕后，来考虑党、国家以及党内人事问题，他可能正是在这时候才第一次发现斯大林手上集中了极大的权力，这令他不安。人们往往认为斯大林当时正暗中攫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但事实上，他基本上是由列宁主动提拔起来的，他运用自己的权威有效地开展着工作。

列宁同斯大林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22年9月以后，是围绕各民族共和国合并成联邦共和国的问题。斯大林主张把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单位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强烈地谴责这一做法，他主张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内，均应以平等地位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联盟，即组成“苏联”。10月6日辩论这个问题的会议列宁没有参加，他牙痛，但他写了一个条子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我宣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这鲜明地表现了列宁的风格，对他不赞成的错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列宁对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人的问题也大为不满，1922年12月底，他口授了一份《关于民族问题的备忘录》，其中说：“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他强烈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很难指望斯大林会支持这份备忘录，因为他不是一个准备忍气吞声、企图讨好列宁、阿谀奉承的人。

列宁的病情不断恶化，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关注着党的前途，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四分钟。1922年12月23日到31日，他口授了一系列短文，他的秘书玛丽娅·沃洛季切娃把这些口授记录加了一个题目《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就是有名的“列宁遗嘱”。

列宁首先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别做了评价，指出他们是“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但他们两人存在着分裂的危险。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到100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而列宁提出的单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也是一副无效的药方，但列宁早已敏锐地看到了他

---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630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6~617页。

们两人之间分裂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说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该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

以上是对六个人分别所做的政治鉴定，我们应该记住，这是列宁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所提的最后结论性意见。信中毫不掩饰地对六个人各自的优点和缺点都极其中肯地谈到了，这显示了列宁宣言不讳、公正坦诚的性格。在这里，列宁表达了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不信任，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卓越才能，但指出他过分自负，还提到了他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面。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新的事件，导致了列宁与斯大林的又一次冲突。列宁病重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代表政治局同医生讨论了治疗方案，经商定：“伊里奇有权每天把他的看法口授五至十分钟，但这不是书信性质的，伊里奇不要指望任何答复。禁止他接见政治访问者。朋友和他身边的人不应与他谈论政事”。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列宁更好地休息，有利于治疗，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重病的列宁在不了解问题的情况下不适当地干预政务。斯大林负责同医生联络，安排列宁的治疗工作，这是一项吃力而不讨好的差使。

列宁不能放弃参与政治，他用拒绝同医生进行一切合作相要挟，同时他依靠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姐姐玛丽娅·伊里奇娜和三、四个秘书，争得一些需要的文件。当斯大林得知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列宁口授的信后，就给她打电话，愤怒地威胁说，要叫党的监察委员会来起诉她，因为她违反了政治局的指示。

这深深地触怒了克鲁普斯卡娅，她向加米涅夫提出了控告，她愤然写道：

“列甫·波利索维奇：昨天斯大林使我蒙受了一场劈头盖脑的最粗暴辱骂，就因为是在医生的允许下列宁给我口授的一个便柬。我不是昨天才入党，整整三十年来，我从未听到哪个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鲁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在我与斯大林看来，是一样宝贵的。此刻，我需要鼓起勇气尽可能完全控制自己。我比所有医生都更了解什么可以对伊里奇说，什么不可以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令他烦恼和什么不能，无论如何这一点我比斯大林更清

楚”。

列宁于 1923 年 1 月 4 日，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引起这场火爆发的原因，可能是斯大体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行为，列宁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件事，他的措词表明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严重不满。但这是否意味着列宁有意进行一场反对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呢？

从 1923 年 1 月开始，列宁又口授了《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目的是激烈批评官僚主义，“说句老实话，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搞得再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这两封信很明显是针对斯大林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1923 年 3 月 5 日，列宁又口授了两封重要信件，第一封是给托洛茨基的：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委员会中亲自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现在这一事件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承担辩护的责任，我就放心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您不同意这样做，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把这看作是您拒绝的表示。

“致以崇高的同志敬礼。

列宁”。托洛茨基拒绝了列宁的要求，退回了备忘录。当列宁的秘书沃洛季娃打电话要得到个明确回答时，托洛茨基说，因为身体不好，他不能接受这一任务。他不愿卷入同斯大林的直接冲突之中。

另一封信是给斯大林的：

“致斯大林同志绝密·亲启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致敬列宁”这封信是不留情面和带有威胁性的，它被人们称为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绝交信”。这肯定使斯大林感到极大痛苦和伤心，也更增加了他

---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618 页。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701 页。

《列宁文稿》第 10 卷第 314 页。

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满。克鲁普斯卡娅虽然是列宁的夫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享有广泛的威望，但她有时一心只想着丈夫，是个有名的爱大惊小怪的女人，斯大林对她发火的事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是不会引起过份吃惊</ZSBJ09800080\_0036\_0/ZSBJ>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3页。的，因为老布尔什维克大部分都是从流放的残酷环境中走过来的，他们在政治斗争中都毫不留情，谈不上宽容和温和。但斯大林还是立刻写了一封道歉信。

从上面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再联系列宁同斯大林的几次冲突，可以看出，列宁晚年，特别是列宁患病后，对斯大林的不信任 and 不满在不断增加，但如果把这看成是列宁同斯大林的个人恩怨造成的，那就错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即使在1922年4月，列宁还同意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并且对他还是信任的。只是在列宁病重退居幕后，来认真观察和思考，他才发现斯大林的权力过大，联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感到有必要限制斯大林的权力。同时，他了解斯大林大粗暴这个性格特征，斯大林比起其他人更独断专行，无所顾忌，这是令人耽心的。十几年以后，苏联三十年代大恐怖的事实最充分地证明列宁当时的耽心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具有先见之明。列宁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借助托洛茨基，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但如果由此认为列宁希望让托洛茨基来接班，正象后来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所自以为是的那样，那也错了。列宁并不打算把权力交给某一个人，他设想的是集体领导。很显然，托洛茨基是可以排在前边的。1927年斯大林在中央全会的演说中说：“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这虽然有些自我辩解之意，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只有斯大林是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虽然他后来在一些方面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当然，粗暴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一个重大缺点。

假如列宁再活几年，那情形又会是如何呢？可以设想，列宁不会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他会有效地同斯大林的错误作斗争。列宁不会让斯大林来做接班人，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从当时的现实政治考虑，斯大林又是最有可能接列宁班的人选。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做出选择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自1923年3月第三次病情发作之后，列宁最终脱离了政治舞台，虽然他一直神志清醒，但已不能说话，对一切已无能为力。俄国革命按着自己的惯性轨道在前进。

列宁的逝世，“中央两位卓越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裂终于成了现实。那么到底它是如何产生、发展和结局的呢？

#### 四、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构成了俄国革命和苏联现代史最不寻常的篇章，这不只局限在苏联国内，而且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直到今天，虽然他们都早已去世，我们仍然会不时发现他们活动和斗争的暗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从外貌到内在，从出身到经历，从个性到思维方式，都很少有共同之处。可以说他们代表着俄国革命的两面：一个是火，所到之处都要熊熊燃烧，热情洋溢，慷慨激昂，这是托洛茨基；一个是冰，扎扎实实地附着在革命的土地上，冷静镇定，坚固顽强，这是斯大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面是在1907年伦敦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在这里，斯大林头一次遇见了他未来的大敌。这位前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但成功地从流放地逃出，刚刚赶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见面斯大林就对托洛茨基感到厌烦，他讨厌滔滔不绝、哗众取宠的叫喊，他称托洛茨基是“漂亮的废物”。而托洛茨基后来写道，斯大林当时“仍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不仅在党内，就连参加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也不认识他”。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只是后来通过别人写的传记才得知斯大林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在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是亮度不同的两颗星星。托洛茨基已经在国内和欧洲享有盛名，而斯大林这颗星星还只在狭窄的高加索地平线上黯然地闪烁着。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在俄国的整个历史中怀着如此深仇大恨地互相对立，并影响到俄国革命的进程。

斯大林，身材不高，个子1.67米，体格健壮，长相有点象亚洲人，外貌平常，棕色头发和深棕色的眼睛，脸上有麻子，左臂有残疾，不大方便。他经常沉默寡言，深沉持重，自我沉思，善于克制，有时又显出他内在的热情冲动，不能安静而又粗鲁急躁，他身上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外表给人以脾气较平和的印象。

托洛茨基，中等身材，面色苍自，上嘴唇蓄着又黑又密的胡子，下巴上留着一络山羊须，鼻梁上架着一副很厚的夹鼻眼镜，弥补他的近视眼的视力不足，他看上去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偏狭的性格和敏捷而神经质的举动，伶俐的口齿，迅速的理解和那不可缺少的夹鼻眼镜——这一切刻画出一个言过其实、抽象而不实际的人。他为人自负，举止傲慢，好为人师，一般人都对他没有好感，不少人都先先后后挨过他的讽刺挖苦和故意摆架子的侮辱。

斯大林内向而不外露、表现得默默无闻，然而他意志坚强，工于心计，充满自信，有一种征服别人的内在力量，他坚信自己的独立性，决不盲从他人，必要时他可以斩钉截铁，承担起历史重任。他是一个冷静顽强的代表。

托洛茨基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充满激情，勇于冒险，喜欢装腔作势，蛊惑人心，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舞台，而把自己看成是剧作者、导演和头号英雄人物，命中注定要演出一部雄壮威武的历史剧。他是一个狂热激进的典型。

托洛茨基是一个乌克兰犹太地主的儿子，家境富裕，渡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而斯大林则是一个格鲁吉亚农奴的后代，家境贫困，残酷的童年时代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决定这两个人的命运是如此不同，一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渡过，一个取得了神学校的经历，附



着在俄国的土地上，然而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却把他们两个联系到了一起。

托洛茨基出生于 1879 年，和斯大林同一年出生。他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初几个小组刚刚形成的时候加入党的，他十九岁时被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 年秋天他从流放地逃跑到了伦敦，在一个清晨他找到了列宁的住处，克鲁普斯卡娅安排了他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和马尔托夫等知名人物。1902 年底，他到了巴黎，与一个娇艳女子伊凡诺夫娜·娜塔娅结识，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兴趣使他俩萍水相逢，一见倾心，不久就结为终身伴侣。

1905 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托洛茨基从国外返回彼得堡，由于他作为政论家的影响，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但没过多久就又被捕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牢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并在《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中第一次论述了后来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1906 年 11 月 2 日，他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但他还是设法从西伯利亚茫茫无际的冰天雪地中逃到了国外，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国外，他拜访了列宁，并广泛地接触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梅休、考茨基、伯恩斯坦、麦克唐纳等人，最终定居在维也纳。托洛茨基一直摇摆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采取“调和派”的立场，并和列宁发生了几次论战，列宁曾痛斥“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在党内斗争中，列宁和其论敌所用的言辞都是极其尖刻的。

1917 年俄国革命爆发，托洛茨基辗转从美国这回国内。这时他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列宁先于托洛茨基于 4 月 3 日夜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托洛茨基的到来加强了列宁的地位，如今他全力支持列宁，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在“遗嘱”中称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正是指的这一点。

斯大林在列宁回国前的三个星期主持了党的工作，当别人忙于发表演说和争出风头的时候，他却总象一块基石一样扎扎实实地在党组织内工作着。“七月事变”的发生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列宁被通缉，转入地下，托洛茨基被捕入狱。斯大林有行动自由，他出面领导，虽然不如列宁富有活力和想象力，也不如托洛茨基富于戏剧性，但其力量和决心却宛如磐石一般。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反对举行起义，他们并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警告公众，要反对起义，这等于把起义的计划泄露了出去。列宁对这种轻率的举动十分愤慨，称他们为“工贼行为”、“叛变活动”，要求立即把他们开除出党，托洛茨基也提出要严厉制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未因加米涅夫是他的妹夫而有所动摇，这表明他对革命的忠诚高于个人关系。只有斯大林的语调显得温和。列宁在“遗嘱”中所指的“十月事件”就是指的这一点。但他们两个人在遭到反对后，积极地投入了领导起义的工作。

毫无疑问，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最大作用，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协助列宁，部署战斗。临时政府被推翻，彼得格勒的一切权力即交给了这个委员会。无疑，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把十月革命说成是斯大林和列宁两人共同领导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18 年，斯大林在《十月的转折》一文中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是

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遗憾的是，后来出版斯大林全集时，把这篇文章给抽掉了。1917年11月29日，党中央任命了由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组成的“四驾马车”，全权处理一切紧急事务。革命后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和平，当时俄国军队正在前线同德国打仗，但士气低落，已无力取胜，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列宁提出为了生存，必须接受敌人的和平条件，这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托洛茨基幻想德国会马上爆发革命，因此提出了“不战不和”的方案，布哈林以他天真的革命激情投票反对媾和，斯大林支持列宁。托洛茨基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同德国谈判，他以伟大演说家的姿态宣布了他的方案：“我们正在把我国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但是我们被迫拒绝签订这项和约”。整个谈判代表被这奇怪的举动惊呆了，德国军队并没有被托洛茨基的革命演说所吓倒，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府被迫接受了布列斯特和约。俄国为此丧失了一百二十六万七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占俄国农田的27%，六千二百万人口，26%的铁路和75%的钢铁工业。这是一个屈辱的和约，然而布尔什维克政权保住了。这一事件，我们看出列宁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而托洛茨基则暴露了他的一个重要缺点：缺乏平易的现实主义，而有一种夸夸其谈和矫柔造作的癖习，这在很多时候对革命是有害无益的。

十月革命继之以一场残酷的内战和疯狂的外国干涉，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之一，俄罗斯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苏维埃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918年3月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依赖于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托洛茨基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领袖对他的军事才能是否合适并没有研究过。当时，只有大约十万赤卫队亦即武装工人，作为一支军队的底子。托洛茨基有自己的办法，他招募了大批沙俄的“军事专家”，强迫他们服役，并冷酷无情地把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同时把他们置于政委的严密监视之下，这样来确保他们的忠诚。

内战时期，托洛茨基象一颗慧星一样在天空放射光芒，这是他最光彩夺目的时期。他有巨大的热情和过人的精力，乘一辆专用指挥列车巡回于各战区，这辆列车上配备有电报发射台，无线电广播，印刷机，发电设备，医务室，浴室，储藏室和停放小汽车的车库等，由于负荷太重，需要用两个火车头来牵引。他身穿黑皮制服，瘦小但充满活力，他既有骑士风度，同时又滑稽可笑。他利用一切时机对部队高谈阔论发表长篇训话，他把自己高超的演说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惩罚来维持纪律，同时，他又用戏剧性的风格鼓舞起部队的士气。这些反映出他很有能力，喜欢权力和爱出风头。无论如何，内战的胜利，托洛茨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斯大林在内战中一直处在最关键的前线，他到察里津组织抗击卡列金的白军，到东部抗击高尔察克的白匪军，到彼得格勒抗击尤登尼奇的进犯，到南方抗击邓尼金。斯大林显示了他的军事组织才能，他以行动果敢而著称，成为一个勇于决策和有权威的领导人。正是在察里津前线，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成为斯大林的密友，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伏罗希洛

夫原是一个放牛娃，后来成为金属加工厂的工人，参加革命并在内战中出各。最值得提到的是布琼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留着连鬓胡子，两撇八字胡的须角象金龟子的触角一样高高翘起。这位精神抖擞的原骑兵中士的队伍不断扩大，有一天，莫斯科有人来送给他一辆汽车和一张党证，他小心翼翼地把党证放在桌上，似乎那张党证象中国花瓶似的非常容易打碎。弟兄们告诉他，“谢明，这辆汽车嘛，你留下。至于这个，就把他放在这里吧，你知道，反正它不需要吃面包”。布琼尼成了共产党员，他的“坦克部队”在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战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经常发生冲突，他们谁也不愿服从谁，彼此没有好感，列宁则成为他们中间的调停人。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老布尔什克也都讨厌这位“后来者”——他以自己的巨大光环总想使别人都黯然失色。

1921年11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时被授予新设立的红旗勋章，这表明列宁和党中央对他们两人一视同仁。

可以说，内战时期是托洛茨基政治生涯中一个辉煌的高峰，他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列宁一直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活动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曾对高尔基说：“请您给我指出另外一个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的逝世，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推到了前场。开始，斯大林并不显得是一个竞争者，他依靠莫洛托夫做着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对托洛茨基攻击得最凶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深信，用不着象害怕托洛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他们把托洛茨基看做是潜在的丹东，或者说是俄国革命的波拿巴。十月革命和内战以后，许多迹象表明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形成了迷信：在许多机构里，只悬挂着他们两人的相片，在各种各样的组织里选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主席团的名誉成员已成惯例。导致托洛茨基后来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权力斗争最初的决定性阶段，托洛茨基不愿介入。这是由于他认为只有他才最有可能成为党的领袖，他始终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并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是被他的同时代人们的掌声所陶醉，他首先关心的是：后代能否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来承认。

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列宁极其隆重的葬礼，他当时正在高加索治病，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但电报中所说的安葬日期是错误的，按此日期他已赶不回莫斯科。主持葬礼的是“三巨头”，历史性的耀眼灯光对准了他们，突出了他们的鲜明形象。

我们在这有必要提供一两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素描像：

季诺维也夫身材高大，体态肥胖，是一个胡子刮得光光的、有一头散乱短发的犹太人，他讲话嗓音嘹亮彻耳，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很有能力，但性格软弱，喜欢吹牛，他爱好吃喝享受，虚荣心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喜欢搞阴谋伎俩而又不择手段。他不是一个伟大人物，但始终想扮演一个伟大人物。

加米涅夫留着胡须，潇洒而有派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俄国小商人，迷了路走进了奇特的政治领域。他是一个天才非凡的人物，知识渊博，列宁曾称他是一匹“骏马”，同时拉了两辆丰——莫斯科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议。

他不是个贪权的人，而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天赋，作为治国的专家则有余，作为乱世旋转乾坤的领袖却不足。

1924年5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列宁近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倾向于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处于劣势。可以这样说，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托洛茨基仅在列宁逝世以前有过获胜的机会。而现在，他已经要，被迫投降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又干了件极不识时务的蠢事，1924年9月，他出版了一本引起巨大轰动的书《十月的教训》。在这本书中，他把列宁作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伙伴来对待，甚至写到了列宁所犯的过错，并特别写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叛变行为”。这本书被看成是对伟大领袖列宁的攻击，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文章通过托洛茨基的早期生涯说明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也写文章给他做了说理的和毁灭性的打击。斯大林引用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各自的一些话，有力他说明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托洛茨基攻击列宁是“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列宁痛斥托洛茨基是“卑鄙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在党内长期的斗争中，列宁以及其他人之间的言词都是极其尖刻的，但在斗争过后双方一致的基础上又会握手言欢。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托洛茨基又能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得到列宁的信任。现在，把以前的语录汇集在一起，足以把任何人置于死地。托洛茨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呀？全党为之震惊。

托洛茨基的身体垮了下来，他的失败已成定局。1925年1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最后把他整死，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开除党籍的处分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伏龙芝接替它。直到这时候，他才迟迟地认识到，斯大林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劲敌。

托洛茨基由于其自负的特点，过于低估了斯大林，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因此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正如法国共产党左派、著名历史学家让·文伦斯坦在《斯大林现象史》一书中指出：“托洛茨基有时是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一个大作家，一名优秀的演说家，但他始终是一个平庸的战术家，他有应急的能力，但在相对平静的时候，反而会无所作为。在急流险滩面前他是一个伟人，但在涓涓细流之中却始终是一个庸人”。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往往被人们弄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强调它是一场列宁主义同列宁主义的敌人——钻进革命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现在又有人认为他们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幌子和点缀而已。我们认为，它既有权力斗争，又有思想路线的斗争，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不是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而是革命内部的思想路线斗争。试想，如果没有权力的保证，又怎么能推行自己的思想路线？

斯大林还没有最后胜利，斗争的下一步如何呢？

## 五、反对派的失败和斯大林的胜利

托洛茨基这颗明星暗淡了下来，他开始“独善其身”。

“三驾马车”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迅速瓦解。现在开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机会，斯大林比他们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已经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党的各级组织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同托洛茨基一样，虽然都很有才华，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空想家，是浮在政治云空的雄鹰，而斯大林则是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朴实、稳重、强有力的个性，甚至他的粗鲁都能在党的代表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事物的结局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但它还是要按照自身的规律走向自己的结局。

1925年12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政治命运的会议。加米涅夫以孤注一掷的情绪，发表了一篇他的生涯中最强有力的讲话，他满腔怒火地发言，就象他曾经严厉地斥责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反对制造一个领袖！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然而加米涅夫的讲话被代表们愤怒的叫喊所打断，他们喊起来：“要斯大林！要斯大林！”

双方斗争的理论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农民的政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采取了激进的左翼立场，他们强调要反对农民，对农民实行限制性的政策。这时候，斯大林倾向于布哈林对农民实行安抚的温和立场，强调鼓励农民的必要性。

斯大林这时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没有企图把他们置于死地。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变成了九名：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新增加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力量对比在改变，斯大林的势力在增长，他可以左右形势了。

斯大林对于季诺维也夫的真正打击是把他调离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来自这个季诺维也夫领地的气势汹汹的抗议也无济于事。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者和能干的演说家基洛夫被派往这个“列宁的城市”。

这时候，托洛茨基以不屑一顾的神情保持超然态度，轻蔑地注视着曾企图把他置于死地的对手的失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由于两起不同寻常的死亡事件而得到更大的加强。

一起是伏龙芝的死亡事件，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伏龙芝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军人，他聪明，有毅力，文化修养很高。他代替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患有胃溃疡病，这并不是危险的恶性疾病，当时可以采取保守疗法，伏龙芝也不愿做手术。但政治局却专门讨论，斯大林坚持要进行手术，说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胃溃疡。结果，1925年10月31日，伏龙芝因被使用过量的麻醉剂而死亡。他的夫人也因此而自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曾任斯大林的秘书、后来逃到西方的巴扎诺夫写道：“斯大林和我一样把伏龙芝看作是昨天的俄罗斯波拿巴，所以他要立即除掉他”。然而，这种怀疑还

缺乏足够的证据。伏罗希洛夫接替了伏龙芝的职务。

另一起是1926年7月“革命骑士”捷尔任斯基的猝然去世。接替捷尔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卫局职务的是明仁斯基，但明仁斯基患有罕见的脊髓病，掌握实际权力的是亚哥达，他是斯大林的亲信。

1926年4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了私人会晤，迅速地建立起“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听到他的对手联盟的消息后，讽刺挖苦地说“他们彼此赦免了”。“托季联盟”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的理论旗帜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把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寄希望于西欧革命的支持，认为在一国范围内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形成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嘲笑反对派是没有勇气和信心的庸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党和人民树立起一个伟大目标，激起了人们新的革命热情，因此它有极大的感染力。特别是比起托洛茨基的高谈阔论，它更容易为党和群众所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长期以来也歪曲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特别是他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并不是说一国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说社会主义需要世界革命的支持才能最后建成。反对派提出的政策是“超工业化计划”，要用加重农民税收的办法，取得“超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这时候斯大林仍然倾向于布哈林的温和路线。

1926年10月，斯大林开始对反对派采取措施，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候补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被调离共产国际。曾作为反对派一员的克鲁普斯卡娅也成了一个可怜人物，她的影响已骤然下降，她是一个正直的革命家，献身于列宁的事业，虽然她讨厌斯大林，然而为了党的共同事业，她退出了反对派，呼吁党的团结。反对派被迫发表了一个关于抛弃宗派活动的声明。

反对派开始争取群众，他们印刷传单，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独裁”。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游行示威。这一事件结束了反对派的政治生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

当斯大林解除他们的权力时，季诺维也夫痛苦地重新谈起以前讨论列宁遗嘱时拯救斯大林免于结束政治生涯的中央全会，并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斯大林从嘴上取下烟斗，回答说：“哦，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1928年1月，托洛茨基离开了莫斯科的政治舞台，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他的支持者到车站送行，有的举着他的画像，有的喊口号，有的卧轨。这只是他政治生涯的失败，还不是他生命的结束，悲剧还没有开始。

“联合反对派”被击溃以后，在党内又出现了一场新的斗争，这就是斯大林同布哈林“右倾反对派”的斗争。斯大林成为党的领袖，他看到软弱的苏联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只有尽快地使苏联强大，才能生存和自保，他感到自己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因此他急于求成。现实的情况是新经济政策使农业得到比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产生了农民囤积粮食，富农控制农村的局面。斯大林提出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路线，强制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斯大林开始采纳了托洛茨基关于“原始的共产主义积累”的观点和“超工业化”的计划，这是一条剥夺农民的道路。布哈林则主张采取温和的方法，鼓励农民自愿结合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布哈林反对派没有能力去接

受斯大林的挑战。1928年7月，布哈林转而要求加米涅夫的支持，很象当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而要求托洛茨基的支持一样。布哈林激动地对加米涅夫说：“我们和斯大林的分歧远远比我们同你的分歧严重……他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他把每件事都置于他的权力欲之下。”但加米涅夫无动于衷。

尼古拉·布哈林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主编，他被认为是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可以说，在左倾反对派被打败以后，出现过一种“两巨头”执政的局面，这“两巨头”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然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这要首先从他们几个人说起：

布哈林，一个小个子的人，他性情温和，思想活跃，知识渊博，待人真诚，他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和演说家，一个严厉、言辞尖刻的辩论家。他不大象一个政治家，更象一个笔杆子，一名记者或政论家，他是一个温文尔雅、易动感情的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孩子气和友好的性格，使他很受朋友们的喜爱，然而他秉赋着一种特异的气质，接近狂热和歇斯底里。他具有迷人的魅力和令人感动的品格，列宁称他为“党的宠儿”。他根本不会搞政治阴谋，天性纯真浪漫，本应安安静静地成为一个学者，然而闯入格格不入的政治领域，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李可夫，接替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可是他最没有希望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他的外貌象一个俄罗斯农民，穿着节日服装进了城。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有一个健全的头脑。

托姆斯基，是苏联工会的领导人，他生性谨慎，为人质朴，不善辞令，不参加争权斗争。他在党的领袖中是一个不很出色的人物，正象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很出色的一样。

可以看出，由这些不爱争权夺利的温和的人所组成的反对派也只能是温和的，甚至他们算不上是“政治反对派”，只是由于他们害怕采取极端的措施，当他们看到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冷酷无情和可能造成的灾难后果时，他们才本能地起来反对，成为反对派。

从1928年到1929年，斯大林为对付“右倾反对派”，把一些悔过的“左派反对派”成员从流放地陆续地召回莫斯科。然而托洛茨基仍坚持不妥协的斗争，从事于反对斯大林的事业。1929年1月18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在国外的流亡生涯。

192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开始毁灭性地批判布哈林，称布哈林是“资本主义因素的保护者”，“富农思想的代言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都被解除了职务，他们终于彻底认输，公开承认斯大林的各项政策都是英明的。

布哈林由一个喜剧人物变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曾帮助斯大林击败“托季反对派”，但他只是扮演了一个帮手的角色，他曾相信斯大林要推行一条温和的路线，他被政治愚弄了。他的悲剧在于，他并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反对派，他的呼吁更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在上层的小圈子里，他不是斯大林的对立面。他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生涯，然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现在已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1929年12月21日，全国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盛况空前。报纸竞相发表颂扬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挂满了巨幅画像。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斯大林和列宁”成为一个大写的口号。一场个人崇拜的运动蓬勃发展。然而，

就斯大林的性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非要有人在他身边阿谀奉承不可的爱虚荣和自找麻烦的人，他的为人没有多大变化，他有权力和地位，但对财产和奢侈却毫无兴趣，他的爱好简单，生活简朴。夏令时节，只穿一件亚麻布的军装上衣，冬天是同样的毛质军装上衣，呢大衣已经穿了十五年。

无可怀疑的是，斯大林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他默认并鼓励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一个最大的轮子而已，他称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庸才”。如果真如托洛茨基所言，列宁又怎么会把斯大林称作“杰出的领袖”之一，斯大林又怎么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无情斗争的政治迷官中战胜那些在许多方面都强于自己的对手？可以说，在列宁逝世后，只有斯大林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他比其他人都更好地把握了斗争的进程。

斯大林成为领袖，不仅因为他的个性、能力和无情的坚强决心，而且是因为他的现实、他的果敢、他的远见、他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内在力量。党和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从这时起，斯大林消除了一切反对派，掌握了绝对权力，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他被他伟大的目标和空前的雄心所鼓舞，开始不惜一切代价，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场新的震惊世界的革命开始了，这就是苏联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对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来说，集体化意味着没收他们辛辛苦苦经营所得来的财产，这并不是他们的愿望。特别是富农，起来拼命反抗。斯大林开始强制执行这一革命，他要迅速地达到成功。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宣布，“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等于是向为数一千万左右的农民全面宣战，甚至宣判死刑。斯大林靠无情地使用暴力和恐怖来实现这一场农业革命。集体化开始失去了控制，发展到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强奸和抢劫等胡作非为，在许多地区，农民以盲目的疯狂破坏来进行反抗，谋杀和纵火案比比皆是。农民们开始大量屠宰牲畜，对抗没收他们财产的集体化，从1929年到1933年，全国一多半的马匹被屠杀，三分之二的羊被宰掉。暴力和破坏的怒潮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最恐怖的是对富农的消灭，据可靠估计，全国有五百万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途中死去，成千上万的人在村庄里保护自己的财产时被杀害。苏联后来的文学作品真实地描写了这一恐怖时期的农村情景。

斯大林对这种危险感到不安，1930年2月2日，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胜利冲昏头脑》，这场运动才有所收敛。这是一场巨大变革，只有一个毫不悲天悯人的强有力的领袖才能在这样的灾难中坚持这一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那几年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几乎有点不可理解，在这种外貌的后面，必然存在着紧张和苦恼，他紧张地注视着不满的浪潮拍打着克里姆林宫的宫墙。

1932年冬至1933年春，全国发生大饥荒，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对斯大林的不满在增加，前莫斯科党委书记柳亭起草了一份《柳亭纲领》，称斯大林是“革命和俄国的掘墓人”，他要为推翻斯大林而斗争。斯大林展开了对党员的清洗。对斯大林来说，“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工业化取得了巨大进展，工业革命从苏联中部和西部发展到它亚洲部分



遥远的不毛之地，在乌拉尔以东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中心后来成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免遭毁灭性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终于获得了成功，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何评价这一革命，这是后来者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斯大林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悲剧事件。1932年11月，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那娃在她的卧室里开枪自杀。为了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从头谈起。

## 六、斯大林妻子的自杀之谜

斯大林妻子的自杀既是一个人生悲剧的结束，同时又是一系列更大的政治悲剧的开始，它极大地影响了斯大林后来的政治生涯。

斯大林妻子的自杀在斯大林生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少为外人所知。围绕这个谜有许多种传闻，曾有人说阿利卢耶娃是被斯大林杀害的，然而，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

斯大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很少对人有什么温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到了政治方面。然而，他一生曾深深地挚爱过三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可是，他的深情厚意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的母亲一生都住在偏远的格鲁吉亚，她瞧不起儿子取得的成就；他的女儿随着长大成人，同他越来越疏远，后来在 1967 年叛逃到美国，以她的切身经历控诉了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他的妻子以自杀的方式宣告同他彻底决裂。

阿利卢那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他们两人无论就年龄、经历、性格、生活都存在巨大的反差。可以说，他们的结合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

1917 年 3 月，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渡过了将近四年的漫漫流放生涯，于革命前返回到了波得格勒，他立即赶到他的老熟人谢尔盖·阿利卢耶夫的家里。阿利卢耶夫是一个工人革命者，他善良正直，还是在巴库时，就同斯大林交上了朋友，当他全家搬到圣彼得堡后，他和妻子经常邀请斯大林到家里作客，并协助他逃避追捕。斯大林在严寒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常常收到这一家人寄去的棉衣和零用钱。如今，斯大林的归来，使他们全家人都感到高兴。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谈到沿途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很多人把回来的政治流亡者当成从战场上归来的勇士，有人甚至认为“革命”是一个人，是沙皇的继承人，就象 1825 年不少士兵以为“宪法”是当时被认为要继承亚历山大一世皇位的康士坦丁的妻子一样。斯大林见到了阿利卢耶夫的小女儿，人们叫他娜佳，当时她才十六岁，还在上中学。曾有一个传奇性的故事，1903 年当斯大林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在巴库，娜佳才两岁，她在海边玩耍，掉到海里去了，是斯大林救了她的命。现在，娜佳已长成了一个标致的姑娘，她出生在巴库，在高加索长大，她的南方人的外貌，使人们都认为她是格鲁吉亚人，椭圆形的脸庞，黑眉毛，鼻子微微向上翘，肤色深深的，柔和的棕色的大眼睛，直直的黑睫毛。她的面貌还增添了一些吉普赛的色彩，有某种东方的多愁善感的仪态，忧伤的眼神，纤细而修长的手指。她还是一个孩子，有着中学生的浪漫主义情调，崇拜英雄，把从流放地回来的斯大林看成是一个凯旋而归的头号英雄，她崇拜他，也爱上了他。然而，这两个人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斯大林已是一个三十八岁的人了，比她大二十二岁，经历过无数人生的风风雨雨和革命的艰苦磨炼。他有着一个革命者的苦难的经历，和他这样一个人相处，就是他的同志也深感困难。他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不轻信任何事物，偏重理性的思考，遇事冷静地权衡利害得失，总之，已经具备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十分重要的那些特点。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革命者，哥哥斯瓦尼泽也在第比利斯神学校上过学，斯大林可能就是通过他认识他妹妹的。他们大约于 1905 年左右结婚，叶卡捷琳娜显然没有受到父亲和哥哥革命思想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格鲁吉亚妇女，对她来说，丈

夫和孩子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他们是在东正教的教堂举行的婚礼，她和斯大林的母亲一样，也是个虔诚的教徒。她于 1910 年过早地去世了，埋葬时用了全部宗教仪式，斯大林为此深感悲痛。她为斯大林留下了一个孩子，这就是雅可夫。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写道，她的姨母曾告诉她，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曾与当地一个农妇住在一起，他们还有个儿子——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配不上斯大林这个尊贵的姓氏。这也可能是谣传，没有可靠的证据。

斯维特兰娜后来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她写了她母亲的音容笑貌，她的短暂的 31 岁的人生，她的性格和生活上的悲剧，读来令人感伤和叹息。

阿利卢耶夫全家人都反对斯大林和娜佳的婚事，然而这无济于事，娜佳的性格具有内在的坚韧和刚毅，她把革命的热情和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同这个不屈不挠的革命家结合到了一起。1918 年，娜佳和斯大林结婚。从此，他们要并肩前进了，这宛如一支小船系在一艘远洋巨轮上，迎着狂涛骇浪在大海里破浪远行……

开始，他们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不久她就同丈夫一起到了前线。内战结束后，她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列宁同她们一家人很熟悉，曾在临时政府追捕时躲在她们家里避过难，她们家里的一间房子后来成了“列宁纪念室”。

为了尽快使自己成熟，她忙于学习、工作，还要安排家庭生活。她婚后的生活一开始就是艰难的，在二十年代，斯大林一直忙于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同反对派的尖锐斗争，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方面。无疑，他长期忽视了她，常常沉默寡言，粗暴而冷淡，这使她难以忍受。她只有以拼命工作弥补这一点。

1926 年有一次，娜佳和斯大林吵了架，带上她的两个孩子去到了列宁格勒母亲家里，想再也不回来了，独自建立自己的生活。虽然如此，气还是慢慢消了，她还是爱着自己的丈夫。斯大林从莫斯科打来电话，说他想来这里求和并接她回家，娜佳在电话里不无挖苦地说：“你来干什么？你来对国家来说代价太高了，我自己回去。”这样她又回到了斯大林身边。

娜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她性格内向，有很强的自尊心，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事情。她渴望自由生活，对“第一夫人”的地位和生活感到压抑，总想摆脱这种显贵的地位，象普通人一样生活。娜佳不属于讲究实际的女人，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一生都在追求，都在力图摆脱生活加给自己的种种束缚。

所有和娜佳认识的人都喜欢她，尊敬她，她从不把自己当做斯大林的夫人，她永远是她自己，同别人平等相处，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这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甚至同斯大林政见完全不同、有些叛逃国外的人，也以友好的态度回忆她的往事。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怀有崇高的敬意，她和斯大林很不一样，我一直喜欢她的谦逊。”娜佳在工业学院和赫鲁晓夫相识，他们是同学，赫鲁晓夫是她的党支部书记。那时正是大规

模的集体化时期，许多学员都来自农村，他们亲眼看到农民的可怕遭遇。当他们听说一位新来的学员是斯大林的妻子时，他们都沉默了。但后来，人们逐渐感到，娜佳是个了不起的好人，完全可以信赖，他们告诉她农村的真实情况。在这之前，娜佳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农业战线取得辉煌胜利的报道。学员们谈到的农村情况使她大为震惊：成批的枪杀，驱逐农民，乌克兰的严重饥荒，成千上万个沦为孤儿的儿童流浪全国乞讨为生，饥荒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她匆忙赶回家，把听到的情况告诉斯大林，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她：“你是个白痴，这都是假的，这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吗？”娜佳说：“不，只有一个人认为那不是真的，但他是出于害怕，他是我们学院的党支部书记赫鲁晓夫。”斯大林记住了这个名字，赫鲁晓夫因此得福，交上了好运。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们，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如何幸免的？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佳观察我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可见，赫鲁晓夫之所以成为我们所知道的赫鲁晓夫，是应该感谢娜佳的，如果她告诉了斯大林另外一番话，那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有这么个赫鲁晓夫了。

娜佳活着的时候，她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一切由她安排。家庭充满生活的情趣，党的领导人都是她们家的常客。人们时常带着妻子、儿女到这里来聚会、唱歌、跳舞。布哈林、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都常来常往，有时就一直几天住在祖巴洛沃的别墅里。这其中，布哈林是大家喜爱的人，他带来各种动物，满地乱跑。许多年后，布哈林已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而“布哈林狐狸”仍在克里姆林宫跑来跑去。

一件自杀事件在娜佳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大约在1928年到1929年，斯大林前妻的儿子雅可夫曾企图自杀。雅可夫比娜佳仅小七岁，娜佳处处体贴他、关心他。然而，斯大林不喜欢他，不满意他到莫斯科来，不满意他的第一次婚姻，不满意他的学习和他的性格，对他很粗暴。雅可夫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的举止酷似一个典型的受压迫者，经常沉溺在某种内心的秘密活动中。因为同父亲的关系闹到绝望的地步，他在克里姆林宫宿舍的厨房里开枪自杀，幸好只受了伤，子弹穿了过去。斯大林找到了嘲笑他的理由：“哈哈，没打准啊！”娜佳为此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娜佳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她曾把斯大林看做是她心目中革命新人的最高典范，她一心一意地爱着他，把自己交给了他。然而，冷酷的现实和无情的政治斗争，血与火的社会变革都使她心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震动。特别是随着对丈夫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她也越来越绝望。

尽管斯大林可能是一个难以相处和不关心妻子的丈夫，但娜佳本人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妻子和伴侣。她好象根本不理解丈夫肩负的担子有多重，或他工作中的压力有多大，也没有试图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年轻妇女，而她所嫁的丈夫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生活的最后几年，她一定看到了令她绝望的许多事实，这使她一步步走

向生命的终点。

自杀的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32年11月8日夜，斯大林和娜佳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一次宴会，席间，斯大林当众对她说：“喂，来！你喝一杯！”她对他在大庭广众中不尊重她而感到气愤。她突然喊道：“我不是你的什么‘喂’！”她离开了餐厅。

当天夜里，她就用她哥哥巴维尔从柏林带给她的小左轮手枪自杀了。

第二天早上，斯大林才知道，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说他自己也不想再活下去了。他异常愤怒，大发脾气，娜佳死前给他留下了一封遗书，那是一封很可怕的信，充满控诉和谴责，这不单是一封私人的书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封政治信件。对他来说，这封由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人留下的最后的信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她以死这个最严厉的方式来惩罚他！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他认为她是作为一个敌人而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处女公墓去看妻子的坟。他搬到了克里姆林官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他妻子共同住过的祖巴洛沃别墅。他在孔策沃新建了一幢房子，他再也没有去过祖巴洛沃。

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妈妈的死对他来说是可怕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他失去了对人、对朋友的信任。他一向认为妈妈是他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把她的死看作对他的背叛，在背后给他一击，于是他变得冷酷无情。”

那些年月，常有人开枪自杀的事。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著名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冷酷无情的现实并不是所有的神经都经受得了的。

1932年，正是集体化进行得最剧烈的时期，一个可怕的饥谨年。党内要求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呼声也很高。斯大林的妻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杀身亡的。

对于一个31岁年纪的娜佳来说，冷静思考的时期还没有到来。这是一种诗人的性格，而不是政治家的性格。普希金说过：“不能把一只战战兢兢的鹿和一匹成马套在一架车上。”是的，结果就可能是鹿的死亡。

斯维特兰娜写道：“我常常想，如果她没有死，那么她以后的命运会是如何呢？不会有什么好事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的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雷登斯、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决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

也许这话是对的，娜佳的死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一场大恐怖即将在全国展开。娜佳的死是否加速了这场大恐怖的到来，抑或是它的先兆呢？

---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53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30页。

## 七、基洛夫死之谜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官他的办公室里被枪杀。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谋杀，它震惊了全国，随之带来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他为人直率，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具有充沛的精力，勇敢非凡；在工作中坚持己见又有独立精神，他的高度的理论水平和演说家的天才结合在一起，这一切使他当时成为全党的宠儿，在党内深孚众望。基洛夫在党和国家的影响不断增长，到1934年按他的威望来说无疑已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了。

基洛夫的被害激起了苏联公众的深切哀悼和极大愤慨，他们要求追查凶手并对他们严厉制裁。斯大林极其震怒，当天就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哥达、日丹诺夫等人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在车站上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韦季时，斯大林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他一记耳光。到列宁格勒后，斯大林立即把对此案的一切领导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凶手尼古拉也夫也由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也夫是个精神反常的人，他在内战时参加红军，战后担任过各种行政职务，1934年3月被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开除党籍，并失去了工作。愤怒和绝望，使他产生了要杀害党的监委主席的恶念。但他后来又转移目标，枪杀了基洛夫。

案件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12月22日发表了通报，说尼古拉也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他们接受了“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的委派而暗杀了基洛夫。

然而，这一谋杀案却充满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在案件发生的一个月以前，尼古拉也夫曾因行踪可疑而被基洛夫的卫队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基洛夫日常活动路线图和一只公文包，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塞在包里。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审讯尼古拉也夫之后，打电话给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几小时以后，亚哥达指示把尼古拉也夫释放。恢复了自由的尼古拉也夫非常愚蠢，不久他又被基洛夫的警卫人员逮捕，第二次搜出了上了膛的手枪，但按照上面的意见又被释放。这件事引起警卫人员的极大怀疑，但上边告诉他们：这件事不该他们去管。

事件发生后，基洛夫的卫队长包利索夫受到传讯，他在被传讯的途中因车祸死去，而同车的内务部人员却都安然无恙。包利索夫是被人用铁棒打死的。

许多迹象表明，亚哥达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参与了基洛夫的凶杀案。然而，亚哥达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他是奉谁的命令？斯大林是否知道此事？为什么又把杀害基洛夫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伙人指示干的？这一切都成了一个谜。

后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专门谈到了这一案件：“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也夫可能得到了警卫人员的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也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1934年12月2日被带去询问，但途中“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 1938 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斯大林的女儿对这一谋杀案的分析却有独到之处，她认为这种事极可能是贝利亚干的，贝利亚内战时期就是一个两面派，作为一个侦探，他时而为红军效劳，时而为反革命匪帮服务，看政权落在哪一方，而决定取舍。“有一次贝利亚被我们部队逮捕，他因叛国罪落网，坐了牢等候判决，基洛夫有电报指示，要求处决这一叛徒，基洛夫当时指挥外高加索前线。后来因为紧接着又有军事行动，没有顾得上这个小人物，没来得及执行判决。外高加索的老布什维克当时都知道有这封电报，贝利亚本人也知道有过这件事……过了几年基洛夫被谋杀，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基洛夫被害不久，1934 年贝利亚被提升，以后就日益青云直上……一个死，一个升，这两件事——这种巧台多么奇怪。大概基洛夫决不会允许这个人被选为中央委员”。

“基洛夫很早以来，大约是从高加索的时候起，就是我们家的最好朋友”。“基洛夫住在我们家里，他是我们自己人，朋友和同志。父亲很爱他，对他情意深长”。“如果说这一枪杀是与贝利亚的名字联在一起，而不是现在人们说的那样与我父亲的名字有关，那不是更合逻辑，更应该吗？”

“说父亲与这一暗杀有牵连，我永远不会相信。父亲和基洛夫的关系比斯瓦尼泽，比所有的亲戚，比雷登斯，比在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都要亲密得多。基洛夫是他的亲信，他需要基洛夫。”

她的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斯大林和基洛夫很早就建立起个人友谊，他一开始就对基洛夫表现出直党的好感。斯大林有一种敏锐的直觉，表现为对很小一部分人的直党的信任：梅赫利斯、莫洛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基洛夫，也许还有其他几个人。对这种好感要找到什么合理的根据是困难的，有时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完全属于心理学的领域。斯大林喜欢基洛夫的微笑，喜欢他那坦诚的俄罗斯的面孔，尊敬他在工作中的朴实无华和全神贯注。他们曾不止一次地一起度假，虽然他们通常住得相距很远，但他们两家之间也有根深的感情。

1924 年，斯大林把他写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送给基洛夫时写的一句感动人的话证明了他同基洛夫的友谊：“赠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作者约·斯大林。”

基洛夫死后受到了国葬的待遇，尊荣备至。斯大林非常伤感，他在守灵时，怀着对基洛夫的深切爱戴，几次俯身灵柩，亲吻死者。然而说基洛夫是贝利亚杀害的，这不大可能，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赫鲁晓夫写道：“在斯大林守灵时，我曾仔细观察他，他有着极大的自制力，他的表情是绝对无法看透的。”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以及随后的谈话中，曾暗示这一谋杀案可能是由斯大林授意的，并做出许诺要为此进行一次充分的司法调查。

---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765—766 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55 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55 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55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113 页。

当然，斯大林和基洛夫也有许多政治分歧和各种矛盾。1932年基洛夫反对枪决柳京一批人，后来他们被流放。1933年饥饿时期，基洛夫号召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而斯大林则主张强硬的政策。基洛夫在党内以较为温和而出名，1933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恢复党籍一事也和基洛夫的影响分不开。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坚决抵制对原反对派参加者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之后被恢复了党籍。

1934年2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基洛夫的影响和巨大声望更是广为人知。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鼓掌通常是两分钟，欢迎斯大林的掌声则长达十分钟，而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台时，全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宁格勒代表团欢迎他的热情，带动了整个会场。有迹象表明，一些对斯大林的政策和错误深感不满的中央委员曾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基洛夫不同意这样做。对斯大林的不满也反映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投票上面，按票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是最后一个，在反对基洛夫的只有3票的同时，反对斯大林的有270票左右。只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同候选人人数一样，斯大林才彼选了出来。大会检票委员会慌了，请来了负责这次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在大会上宣布的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3票。但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选举的真实情况。

十七天以后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了一些复杂的人事变动。象叶若夫和麦赫利斯这样的人被提拔到中央机构的要害岗位。斯大林还要求基洛夫从列宁格勒搬到莫斯科，但基洛夫不愿意离开列宁格勒。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写道：“基洛夫被暗杀归罪于斯大林的说法在1934—1935年里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却显得很真实，并从逻辑上和政治上几乎得到证实。相反，在1934—1935年，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暗杀基洛夫案件中是有罪的说法曾经好象很真实，可是今天却是不可想象的了。”

令人惊奇的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叛逃美国后写的《仅仅一年》中，再次谈到了基洛夫被害一事，她写道：“1956年赫鲁晓夫是第一个谴责这一事件的人，并暗示父亲直接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暗杀”。“我想了很久，这可能吗？这可能吗？要知道基洛夫是老朋友，他那一年夏天还和父亲一起在索契休养……可是令人可怕的回答自己就来了。布哈林又如何呢？他不也是老朋友吗？妈妈在世时，他在夏天不也和我们一起住在别墅里吗？如果父亲有可能控告布哈林并且把他处决，那为什么他不能迫害基洛夫呢？这一切是那么叫人恶心，真恨不得大声嚎哭，跑到哪里躲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也不止自己看见……”

直到今天，基洛夫之死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虽然我们已不能再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作是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但斯大林究竟和这一案件有何种关系，还是令人难以最后回答的。

无论如何，基洛夫之死是一个不祥之兆，它成了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大恐怖的重要开端，由此进入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政治灾难时期。

---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264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152页。



## 八、大清洗内幕

基洛夫被杀后，斯大林开始了一场对所有反对派的大规模清洗。这场清洗迅速弥漫全国，数百万人遭到逮捕，很多人被枪决，更多的人被流放，许多列宁的战友、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上断头台，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恐怖笼罩全国，人们心惊胆战。这场大恐怖猖獗了四年之久。

基洛夫死后，立即在列宁格勒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和枪毙。1935年的头几个月里，数千名列宁格勒公民因被怀疑同情反对派而被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主要同事被逮捕，囚禁在上乌拉尔斯克。他们曾于1932年被第二次开除出党，到1933年5月被允许从流放地返回。1935年1月15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判，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这仅仅是恐怖和大清洗的开始。

斯大林首先开始布置大清洗的得力骨干，作好人事安排。叶若夫主管了监察委员会，马林科夫成了中央书记处干部部的副部长。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还担任外高加索党的第一书记。在幕后，还有一个只有斯大林能指挥而谁都害怕的人物，他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1934年，他负责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特别秘密政治处，作为斯大林私人秘书处的一部分。

1936年8月19日，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开始。这个日子是相当举世瞩目的，因为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把他的大规模镇压措施付诸实施。他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心和无与伦比的胆量，策划了一场震惊世界也深深地刻进历史记忆中的审判。这次出庭受审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叶甫多基莫夫等十六人，史称“十六人审判”。罪名是同托洛茨基一起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策划暗杀了基洛夫，还准备阴谋暗杀斯大林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恐怖和颠覆活动。

审判在莫斯科苏维埃宫内的十月礼堂举行，这里共有350个座位，经过周密的布置。

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血色，满脸浮肿，眼眶下垂着两团肿泡，看上去一副病态。他正忍受着哮喘病的折磨，不时张大嘴巴吞咽空气。出庭第一天，他一落座就赶快解开衣服，取下活领。在后来的整个审判中，他都一直穿着没有活领的衣服。

被告们作“最后陈述”，这真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其内容一模一样，他们全都主动诋毁自己，把自己说成十恶不赦的罪犯，同时歌颂斯大林的英明。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陈述时再次强调，他承认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仅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反而向法庭证明，他不应当得到宽大。当他讲完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来说道：“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没有其他机会对他们讲话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少先队员。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向后看，要向前走。同苏联人民一块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该季诺维也夫作最后陈述了。人们很难相信，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曾经多次在党代会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使听众为之倾倒的天才演说家。他呼吸沉重，讲起话来既无自信又缺乏表情。他直立在栅栏后，宣读着别人

为他拟好的稿子。他象一个平庸的替身演员，正在竭力模仿一个叫季诺维也夫的人过去的演说风格。季诺维也夫的最后陈述，同加米涅夫如出一辙，他也没有为自己，反而为斯大林作了一通辩护。

1936年8月23日晚7点30分，审判庭成员离庭进入会议室。判决书的内容是早就拟好了的，可是，审判庭成员却在会议室里整整呆了七个小时，半夜2点30分，即8月24日凌晨，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审判席。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判决书。他呆板地读了十五分钟，才念到量刑部分。审判长停顿了一会儿，当大厅恢复平静以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死刑——熟悉政治案件审判程序的人们，都以为审判长接着会讲出这种场合惯用的公式化语言：“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过去的革命功绩，本法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施用死刑，改为……”

然而，这一套没有出现，是“死刑——立即执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被枪决，无一幸免。

这是一次成功的审判，但是中间也出现了一个大的漏洞。审判中，哥尔茨曼供认，他1932年11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时，曾到哥本哈根，在“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接头，一道去见托洛茨基，安排了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但这一供词一登报，托洛茨基马上在国外声明那全是谎言。8月25日十六人彼枪毙后，9月1日，丹麦报纸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年就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哥尔茨曼的供词完全是凭空捏造。美国一位著名哲学家约翰·琼组织的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得出了同上面一致的结论。同时，还准确地证明，1932年11月23日到12月2日这段时间，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一直在柏林参加考试，还有他在柏林给父母写的私人信件为证。这就从一个角度推翻了审判中的不实之词。

正是在这次审判中，还发生了一件同莫洛托夫政治生命密切相关的事件。被告人赖因霍尔德，一个彼收买然而并没有因此幸免一死的人，他供认：“托季联合总部”计划杀害斯大林和其余全部政治局委员。可是审讯记录在送给斯大林审阅时，斯大林却亲笔勾掉了莫洛托夫的名字，这表明莫洛托夫已经失宠。审判中被告的供词中都承认要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唯独没有莫洛托夫。据说，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莫洛托夫试图劝说他取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审判。内务部领导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逮捕莫洛托夫的命令。以往莫洛托夫每次外出休假，斯大林总是亲自到车站送行，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前往车站。然而，莫洛托夫的专列开出后约一个小时，亚哥达突然命令内务部交通局给莫洛托夫发出一封电报，说斯大林曾去车站送行，只是迟到了。这可能是为了安慰一下莫洛托夫，怕他会自杀。这样，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始终无人提及莫洛托夫的名字，后来斯大林才决定“宽恕”他。在第二、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莫洛托夫才又回到罪犯准备暗杀的名单之中。谁都知道，莫洛托夫这一遭遇，面临着入狱的危险。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托姆斯基自杀了。他的儿子尤里——托姆斯基家庭的唯一幸存者曾回忆说，他父亲的自杀是在斯大林的一次来访之后立即发生的。斯大林带着一瓶酒来到了托姆斯基的寓所，开始他们谈话很平静，后来他父亲向斯大林叫喊起来，他指责斯大林在推行谋杀活动，并猛烈地推开门，

让斯大林滚出去，斯大林愤怒地离去了，书房里传出了枪声。

1936年9月26日，亚哥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被叶若夫所代替，斯大林指责他肃反不力。叶若夫的就任，开始了大恐怖的更为残酷的一个阶段。叶若夫，他的名字已广为全世界所知，成为大恐怖的代名词。可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魔鬼式的人物，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幼小即失去父母成了一个孤儿，从十二岁起就由施略普尼柯夫一家抚养成人，施略普尼柯夫在1937年被枪毙，他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逮捕和流放。与叶若夫共过事的人们都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残忍的人，给人留下的是活泼愉快的印象，即使赫鲁晓夫，对叶若夫一直有着好感，对亚哥达也同样有好感。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直是喜欢亚哥达的。我个人看不出他的行为中有什么反党的地方。我不懂斯大林为什么要撤换亚哥达，既不能理解他公开提出的理由，更加不能了解他内在的动机。在另一方面，我对叶若夫肯定地没有反对的意见。他既勤劳又可靠。我知道他在彼得格勒当过工人，从1918年起就是党员，这是有利于他的一个资格”。然而，叶若夫同斯大林的相处，他完全落入了解斯大林的那种几乎具有催眠术般魅力的影响之下。

“在叶若夫于1936年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镇压行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利害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大批、大批的人被送进了‘绞肉机’”。1937年1月21日，开始了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这次被审的是皮达科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十七名被告，史称“十七人审判”。这些被告都曾是二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他们被控参加所谓“平行总部”，策划恐怖阴谋，从事间谍活动，企图借助德、日两个帝国主义的力量瓜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次审判多数被告都有国家指定的辩护人，但辩护人的辩词和国家控告人的起诉如出一辙。

皮达科夫是“列宁遗嘱”提到的六个人之一，“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这是列宁对他的评语。可以说皮达科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他的真正才干，是在经济战线上表现出来的，他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优秀组织者。皮达科夫素以廉洁奉公而闻名于党内外，他和家人住在一幢旧楼里，而且只占用了两间很小的陋室，从不享受特权，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他工作夜以继日，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又瘦又长的身材，看上去很象俄国的唐·吉珂德，他总是穿一件廉价的、做工很差的西服，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知为什么衣服到他身上总显得特别小，袖子短得可怜。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结斯大林。

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据说是在斯大林的亲密同乡和朋友奥尔忠尼启则向他做了许多许诺之后，他才同意上法庭的。1月23日，皮达科夫按照早已拟好的供词，承认自己曾于1935年12月中旬乘飞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前往维克萨尔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即1月25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一项通告：“皮达科夫来奥斯陆同托洛茨基会面一说完全不足为信”。“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决心铤而走险——向苏联政府挑战，他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为皮达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苏联交付审判。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拉狄克也算是被审判中著名的一个，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活动家，但他天生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极力显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拉狄克的真正才干，是在宣传鼓动、写文章方面，政治局主要把他作为一个天才记者来使用。1927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曾给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信道：“我们决不能默默无闻地、无所作为地眼看着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和十月革命的领袖被虐待狂烧死！”可是，不久他就彻底投降，反过来痛斥托洛茨基。1933年他以其特有的文学天才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大肆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他又得到重用，被任命为《消息报》的主编和政治局负责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但他还是被作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作为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在法庭上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如此纯熟，许多人都相信了他的供词。作为一个可悲的被告人，他也把这看成是出人头地的机会，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1937年1月30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了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名死刑，他们都是在内务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被枪毙的。其他四人被判处十年徒刑，这其中就有拉狄克，当宣判完毕后，拉狄克转身向其他被告人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为自己的成功有点不好意思。

皮达科夫被枪毙后不久，报上登出讣告：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死亡。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最老的同事和朋友之一，1912年在他的提议下，斯大林首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同所有的反对派斗争中，他都热心同斯大林合作，但他是个仁慈和温和的伙伴。他为他的哥哥普列亚的被捕并受到拷问感到不安，他对逮捕皮达科夫表示抗议，而皮达科夫长期以来是他的亲密同事，并在他的许诺下才走上法庭，枪毙皮达科夫等人和疯狂的大恐怖使他深感绝望。于是他开枪自杀了。这直到1956年才由赫鲁晓夫正式宣布。当时的官方诊断书是由四位有名望的医生联合签署的，其中三人不久就被逮捕并处决了。为了斩草除根，逮捕了除他妻子之外的家庭成员，以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甚至连他别墅里的守门员也没有放过。就在苏联报纸公布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枪毙的当天，内务部政工局一名参加过侦讯工作的干部自杀了。接着高尔基市内务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又开枪自杀，乌克兰内务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利斯基又饮弹自尽。一场清洗内务部的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内务部里许多残忍的迫害狂，不久前还令那些被告胆战心惊，现在自己也成了牺牲品，因为他们“做恶太多”。仅仅在1937年里，被处决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就有300多名，只有亚哥达本人还暂时没有被枪决。

1937年6月11日，苏联报刊登出一篇简短的政府通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红军高级将领，因充当间谍和叛国罪名被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第二天宣判已结束，全体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并立即执行。

叱咤风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一位军事上的天才，是使红军真正现代化的人，他在内战中功勋卓著，成为军队中的宠儿。他曾属于伏龙芝的集团，因此被看作是三十年代的波拿巴，斯大林是不信任他的。这次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波列维奇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

由此展开了一场对军队的大清洗，总共五名元帅中的三名，十五名军兵种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长中的五十七名，一百九十六名师长中的一

百一十名，四百零六名旅长级干部中的二百八十名，所有十一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八十名委员中的七十五名都被逮捕枪毙。至少有两万名军官被捕，占全部军官总数的25%，有几千名军官被枪毙。军队经过了一场血洗。这一切都是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进行的。

不经审判的枪毙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苏联全国。正是在这阴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正在加紧进行。

1938年3月，开始了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出庭的被告人有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柯拉夫斯基等二十一人、史称“二十一人审判”。他们被控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鼓动和组织下，犯有间谍、恐怖主义和破坏的罪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二十一人中还有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他就是参与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并枪毙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亚哥达。他被指控为外国间谍、谋杀了他的前任明任斯基，参与了谋杀基洛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被捕前，正是他志得意满的时候，他正在忙于给内务人员更换新装，制定新的礼节规定。现在他象一头困兽，等待着他的同样是被枪决的命运。

审判出现了曲折，克列斯廷斯基推翻了他的供词和认罪。轰动了法庭，但后来他又公开认罪了。最后，布哈林、李可夫、亚哥达都承认有罪。二十一人被告中，除普列特诺夫、柯拉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三人被判处徒刑外，其余全部被处死刑，执行枪决。

三十年代的大恐怖是以三次莫斯科审判为最突出代表的，然而，大规模的屠杀、逮捕和流放却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各级领导机关。清洗主要是针对以前的反对派成员，在公开审判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前反对派成员都不加审判而予以枪毙。甚至一些斯大林的密友也不能幸免。最突出的代表是叶努启则，他同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是有名的最亲密的格鲁吉亚三人帮，他同斯大林少年起就是知心朋友。叶努启则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是个心慈手软的人，被清洗者的家属都认为，他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高级官员。斯大林的女儿多次提到这位“阿维尔叔叔”同她们家的密切关系，当娜佳同斯大林发生矛盾时，他常常是最有效的调解人。但他对斯大林的很多做法越来越不满，当他被斯大林赶出莫斯科，到外高加索去上任时，他也没有及时给斯大林写悔过信，这使斯大林极为不满，于是叶努启则只好去就任格鲁吉亚疗养院院长了。叶努启则则下定了决心，断绝同斯大林的一切关系。事情的结局是1935年6月叶努启则因生活作风糜烂被开除党籍。1937年12月19日报载：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判处叶努启则、卡拉汉和另外五人死刑，判决已经执行。大规模的恐怖不仅是对一些“罪犯”本人，还涉及到他们的亲属，他们的妻子、成年子女，往往还有兄弟姐妹和父母。例如，图哈切夫斯基一家的遭遇非常悲惨：他的妻子和弟弟在狱中身亡，他的女儿和四个妹妹都被逮捕。叶努启则的亲属有八人被捕。布哈林的妻子被捕并被流放。几十万其他无辜的人们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

军队受到了血洗，党同样受到了更大的血洗。据统计，1934年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即是基洛夫获得巨大声望的大会，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决，占70%；有代表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遭到逮捕和枪决的有1108名，占一半以上。从1936年到1939年大清洗中，被捕的人数为500万，其中被处决的有40到50万人。

大清洗到 1938 年 7 月开始刹车，贝利亚取代了叶若夫。大清洗是以叶若夫的被逮捕和枪毙而宣告结束的，叶若夫因“作恶太多、滥杀无辜”而罪有应得。与此同时，内务部做了一次大清洗，许多人被处决，还有些人被送在劳改营。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同托洛茨基有关，托洛茨基被缺席判处死刑。内务部专门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执行这项判决。直到 1940 年 8 月 20 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他的防守严密的住宅中被人用利斧砍死，他的脑浆溅满了他正在写作的斯大林传记的稿纸。暗杀者拉蒙·麦尔卡捷尔，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他的母亲因帮其实现暗杀而被授予列宁勋章。托洛茨基的大儿子谢多夫在法国一家医院里不明不白地死亡，二儿子被杀害，他的女儿——一个叫希娜的患有肺结核病的瘦弱女子死在了监狱里。

斯大林的反对派到此已被消灭干净。对反对派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托洛茨基，他一生都坚持他的“不断革命”论，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个同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相抗衡的“第四国际”，组织他的革命活动，直到今天，仍有影响。托洛茨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法共著名人士爱伦斯坦 1979 年 3 月 2 日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公开为托洛茨基平反，意共领导人雷克林称他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从今天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一个革命家，然而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极左革命家。

莫斯科大审判是成功的，它使苏联人民、外交使团和国外舆论相信，这些被告人受到了公正的判决。即使当时美国任苏联的大使戴维斯也认为，被告人的罪行是有证有据的，并补充说，这是外交观察家们的普遍看法。采访这几次审判的外国记者大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然而，今天已经明白，这些审判都是虚假的，对被告的起诉没有任何证据，唯一最可靠的证据就是被告人的供词。现在，所有在莫斯科政治审判中的被告人的公民权都已被恢复，其中十七人被恢复了党籍，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苏联著名军事统帅已被彻底无条件平反。

这就出现了令人最困惑不解的难题：三次审判中的被告大都曾是最卓越的人物，坚强不屈的革命家，为什么他们在审判中纷纷承认指控他们的一切罪行？还有，斯大林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大规模恐怖悲惨的清洗，不惜杀掉那么多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这些都是为什么？

莫斯科审判使全世界大为吃惊：被告们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来污辱自己，他们还想方设法地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被告们在法庭上的离奇行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被灌了大量的摧残意志的药品等等。

然而，正是被告们自己公开在法庭上对此做了否认。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驳斥了那些关于他和其他被告受过刑、被施过催眠术以及被灌过麻醉剂的说法，他把这些流言蜚语指责为不合实际的神话和实实在在的反动寓言。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感到，只有一点才能做到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是：这些被告们

都是第一代革命家，是同列宁一起领导党并作为党的一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在他们看来，党永远是正确的，而个人的意志永远要服从党的意志，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被党所抛弃，已使得他们结束了政治生命，从精神上彻底垮了。他们不敢对党提出异议，并把自动认罪看作是对党的忏悔。这种关于党的观念是如此牢固地左右着他们，使他们在“党的审判”中失去了任何抵抗力。正象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5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说：“反对派可以采取的最明智和不愧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步骤，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在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之后所应采取的态度，就是走到党的面前来说‘我犯了错误，而党是正确的’。”托洛茨基也在讲话中说：“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1928年，皮达科夫更突出地表明这一点：“十月革命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都是奇迹！”“离开了党的队伍，他就没有生命，他随时准备相信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只要这是党的需要。”

党是至高无上的，党永远是正确的，而现在，斯大林就代表着党。作为失败了的反对派，作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个人，他会随时按照党的意志去做到这一切。这是多么强烈的观念！

而这，正是他们最大、最深刻的悲剧！

当然，被审判的被告各人情况很不一样。一些证据说明，严酷的非法刑讯，不停地对人精神的摧残都在审讯中起了作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利用对被告的妻子儿女及亲属的生命的威胁，也足以致人于死地。有人证明，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和刚的出生儿子消灭后才开始“交待”的，而克列斯廷斯基是在威胁他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打死后才在侦查记录上签了字。被告们比谁都明白，不在法庭上主动认罪，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那将是比枪毙更可怕的后果。

今天已经清楚，三十年代的大审判，按其后果来说是灾难性的，它无疑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阴谋暴行，它最突出最充分地说明了斯大林“粗暴地滥用权力，践踏法制”的罪行。这些可怕现象同在我们心中的斯大林形象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一次巨大的精神上的打击和心灵上的创伤。这是我们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说：“斯大林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她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斯大林是一个异常多疑的人，他中了纳粹机构的阴谋。

还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迫害狂。虽然有一定的迹象，但总的说来，却是一种表象之见，是一种简单的不负责任的说法。

斯大林无疑是一个神经坚强的人，他是一个具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性格沉着、自制力甚强的人。他是一个铁腕人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因为如此，他对周围的人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三十年代苏联的现实是：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危险，斯大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战争迫在眉睫。1931年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在远东给苏联的安全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

争的阴云布满欧洲。1936 年形成柏林罗马轴心，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斯大林要用铁的手腕对党和国家进行控制，消灭反对派，实现强有力的领导，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高度统一。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血腥的手段。斯大林领导苏联经过惨重代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知道能否对此做出解释，以证明这种残酷的做法确属必要，这要历史学家来下结论了。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大清洗也是为了达到斯大林牢固控制权力的目的，这不需要多加说明。政治家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掌握权力，才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正是在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布哈林完成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永远没有结束。



## 九、布哈林案件

布哈林可以说是一个最带悲剧性的人物，他帮助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后来又击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后轮到他了。直到死前，布哈林还在为党和斯大林工作，从 1935 年到 1936 年，他主笔起草了一部苏联宪法，就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枪毙不久，通过了这部宪法。这部宪法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斯大林宪法”，这可以说是布哈林为党和斯大林的最后服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宪法的起草人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这是多么同宪法的精神相违背！

布哈林曾称斯大林是一个“天才的药剂师”，然而，这最后一次为布哈林所配的处方，却超过了任何的服用剂量，他无法再醒来。

布哈林的死不但是苏联政治的一个大悲剧，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大悲剧，同时也是布哈林个人性格的大悲剧，他的家庭的大悲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888 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曾获七等文官的中学教师家庭。早在 1906 年，他就成了一名党员。还在大学的时候，他就积极地参加了工人和大学中的宣传活动。他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不高，瘦削灵活，长着稀疏的胡须，高高的前额，有一头棕红色的头发。他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从流放地逃跑，越境到了国外，只是到革命胜利以后才回到俄国。

流亡六载，对他来说是硕果累累的 6 个年头。在国外他认识了列宁。列宁不单对他总是怀着热诚，而且对他非常喜欢。当然，这并不妨碍列宁时常同他进行激烈的辩论。这位崭露头角的理论家并不是从书斋里钻出来的，但却迅速地掌握了德语、法语和英语，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密切的友好关系。由于斯大林的一再恳请，从 1927 年起布哈林就经常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布哈林作为一位气质敏感的人，一直对斯大林保持着友好、坦诚和真挚的感情。他们向来相互以“你”相称，而无须用“您”。斯大林称呼布哈林时只叫尼古拉，布哈林通常习惯把斯大林叫“科巴”。从 1924 年到 1928 年间，斯大林很注意倾听布哈林的意见，他不只一次向人们强调指出，“列宁对他的理论头脑评价很高”，党很珍惜这位才华横溢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 1928 年初以前，斯大林在许多地方是以布哈林解决经济问题的观点为指导思想的，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斯大林“依靠”的是他。斯大林的秘书处成员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巴拉绍夫，曾常受委托去征询政治局委员们对各种问题的表决意见，当把征询表决的结果递送到斯大林面前的时候，他常常连头也不抬，就问道：“布哈林是什么意见，赞成吗？”

然而，政治是不能感情用事的。他们两人在各方面的不同导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这分道扬镳的方式却是你死我活。

布哈林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和有说服力的作家，文章水涌，满腹珠玑。他有很大的魅力，有许多朋友，但他感情用事，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列宁曾把他称为“党的宠儿”，但也说他象块“软腊”，一个容易受人影响，政治上不稳定的人。直到临死，他也不能代表他自己，他在法庭上不遗余力地为斯大林大唱赞歌：“全国人民都在跟随斯大林前进。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已经深入到全国每个人的心中……”

布哈林被枪毙，他留下了一个新婚不久的年轻妻子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代替他的苦难和悲剧的是，他年轻妻子的长达二十年的监禁和流放，他刚出生的儿子在孤儿院中开始的漫漫生涯。

1933年，已经45岁的布哈林遇到了一个以美貌出名的姑娘，她就是老革命家拉林的19岁的女儿安娜·拉琳娜。两个人彼此一见钟情，他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她为他的才华横溢而折服，巨大的年龄差距也未能阻挡住他们的相爱，不久他们就结了婚。这对于饱经政治风霜、命运坎坷的布哈林来说，不啻是一次命运的转机，是冷酷的政治波涛中一点可以躲避的感情港湾。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死神的降临。

拉琳娜在1937年6月，也就是布哈林被捕后四个月也被捅了，她和她刚出生的幼子分开了，以后二十年她是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在监狱牢房和劳改营中渡过的。

1956年，在西伯利亚一个边远的小村里，有一家人团聚了。在俄罗斯中部的孤儿院和教养院长大的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尤里，知道他还有一个妈妈活着，在流放中。他长途跋涉去到她那里，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尼古拉·布哈林的独生子，这母子俩抱头痛哭。从这一天起，他们就开始了为她的丈夫和他的父亲平反昭雪的长达三十二年的漫漫路程。1961年，拉琳娜和她的儿子获准在莫斯科重新定居。他们开始申诉，请求为布哈林平反昭雪。还在布哈林被害前，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就草拟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并要求他的妻子拉琳娜熟记心中，她反复地背诵了这封信，直到一字不差地记下来。布哈林死后，她遭到逮捕，就把它装在脑子里带进了监狱里。她一经获释，便把这封信写了出来，寄给了苏共中央检察委员会。信中写道：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

……而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多数的所谓机构，已蜕化成为官僚主义的组织，没有思想，腐败无能而又待遇优厚。它们借助以往契卡的威信，迎合斯大林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狐疑心理，制造那些卑鄙的案件，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因为历史是不会容忍罪恶行径的连署人的。

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假若斯大林怀疑到他自己的话，马上也会有证据提出来加以证实的。

我18岁就入了党。我终生的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这些天来，冠以‘真理’这个神圣名字的报纸在刊登着最肮脏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想摧毁十月革命的胜利，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从未有过的蛮横行为，是一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让后人对我作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样严厉的评判吧。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

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

然而，这封信没有能感动党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由四名老布尔什维克签名的一封呼吁书寄给了中央委员会。这其中有一叶·斯塔索娃，她曾是列宁的秘书，在斯大林之前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这封信写道：“列宁在遗嘱中估计了过去的一切，仿佛是给某些党的工作者以最后鉴定，他称布哈林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撤销非法判决和恢复布哈林的党籍，将不仅是为列宁时代我党一位杰出领袖个人申张正义，而且在进一步阐述这一时期党史的问题上也将起重大作用”。信的最后写道：“被列宁誉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是不能留在叛徒和被党抛弃者的名单内的”。

然而，这封信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当时党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报告中说，“也许应该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但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赫鲁晓夫也未能为布哈林平反，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深感悔恨，称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遗憾的一件事。

事过十多年，在苏共二十五大前夕，拉琳娜和儿子尤里又向勃列日涅夫寄去一封信，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并于1977年6月21日给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寄去了一份请求书。然而，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

尤里·拉林开始寻求全世界的支持，他于1978年3月12日特意给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贝林格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参加为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信中写道：

“尊敬的贝林格同志：

我是在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惨死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给您写这封信的。

……我知道斯大林是罪大恶极的，知道他捏造党史至何种程度，也知道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对我父亲的指控和后来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审讯都是十分荒谬和拙劣的。但是，我父亲就是在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从事间谍活动、叛国、搞破坏和谋杀）下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和判处死刑的。

在大部分居民都是用谎话连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育出来的国家里，有很多人仍然认为我父亲是个叛徒和希特勒的奴仆，尽管事实真相是：他是一位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曾把全部精力用于揭露法西斯主义，向世人警告不断增长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贝林格同志，我向您求助，不仅是因为您是西欧最大共产党的领袖，并已摆脱了斯大林罪行的负担，而且还因为尼·伊·布哈林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成员。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识他，并且经常热情地缅怀他。

我向您求助，请您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只消您觉得最适合于您的方式就行。”

信的最后是以布哈林的信的最后一句话结尾的。罗素和平基金会得到这个信息，就将它散发到全世界许多国家征求签名，世界各国一百多位名人共

同签名，寄给苏联政府一封呼吁书。这些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又过了十年，苏联换了三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1988年2月4日，布哈林死后五十年，苏联最高法院终于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判决，宣布为他们彻底平反，布哈林也被恢复了党籍。1988年10月，苏联科学院重新接纳布哈林为科学院院士，为他恢复名誉。历史绕了一个大圈，才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当年正值妙龄青春的拉琳娜如今已成了一名70多岁的老人，这就是她所热爱的布哈林带给她一生的命运。而他们的儿子，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如今也要进入老年了，他为父亲的平反而奋斗了一生。长眠地下的布哈林不知道是感到欣慰，还是悲哀？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杰出的理论家在历史的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不朽的。

## 十、战争：从莫斯科到柏林

斯大林以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冷酷无情的决心对党和国家进行一场大清洗，就象一个惊涛骇浪中的舵手驾驶着一艘颠簸摇摆的大船，根本不顾无数人落水丧生，甚至为了减轻船的重负而把同自己不是一条心的人赶下去，毫无顾忌地又开着船继续前进。

大清洗达到了斯大林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就是使党在自己的钢铁意志下保持统一，而他自己则成为党和国家的不容置疑的领袖和主宰，成为一个庞大国家的绝对统治者。

人类历史上一场最大的灾难就要来临，而斯大林，列宁的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斯大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寻求与西方国家结盟，共同反对希特勒。然而英法政府奉行绥靖政策，敌视苏联。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希特勒德国。斯大林苦思冥想防止战争的策略，考虑着每一种可能性。

1939年5月，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丘吉尔谈到莫洛托夫，说他“具有杰出的才能，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他那带有西伯利亚寒气的微笑，他那经过审慎斟酌，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貌的风度，使他成为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斯大林多次提出同英法结盟，遏制希特勒的扩张，然而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万般无奈的孤立处境下，苏德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官会见法西斯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特派代表里宾特洛甫，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而签订了一个共同的条约。对于这项条约有着各不相同的评价，但它无疑尽力拖延了战争的到来。

希特勒的闪电战势如破竹，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接连失陷。斯大林集中了全部精力来防止战争在1941年爆发。然而，到1941年6月初，来自各方的情报都显示出德国将要进攻苏联，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间谍左尔格都提供了德国入侵的确切日期。但斯大林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敌人散布的假情报。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国进攻苏联。德国军队动用了162个师，300万人的兵力，3400辆坦克，分三路进军。

斯大林尽力避免战争在1941年爆发的愿望没有达到，德军的突然袭击使苏联仓促应战。这是斯大林一生受到最大刺激的时刻之一，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错误。有迹象表明，战争的突然降临，使斯大林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感到空前的无力。

正是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格，总参谋长朱可夫和副参谋长瓦图金收到前线司令员们发疯似的来电。他们立即打电话报告斯大林，斯大林长时间沉默。凌晨4时30分，所有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斯大

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站在桌子旁边，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显然他极为震惊。

赫鲁晓夫曾在“秘密报告”中大肆渲染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神经崩溃，完全绝望，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这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刺激和失望之后，他就又重新开始了他强有力的领导。

战争初期，苏联军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6月28日，西线陷落，斯大林情绪低落，十分愤怒，西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和其他将领遭到审判，被枪毙了。然而，这并没有鼓舞士气，反而影响了军队将领的信心，斯大林没有重复这一错误。后来，打了败仗的将领只是降级，或者他们干脆就失踪了，他们的命运一直无人知晓。

7月3日，德国入侵后十二天，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没有华丽的词藻，而是在呼吁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卫祖国的顽强的民族精神。他以朋友和领袖的姿态讲话：“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它在消沉失败的气氛中鼓舞了人们的斗面对德军的不断深入，苏联开始把工业大规模地向东转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人们的努力来说也是一项英雄业绩。

10月，德军占领了被称为苏联粮仓的富饶的乌克兰，并且洗劫了基辅，逼近莫斯科。苏联政府和外国使馆都已迁到伏尔加河岸的古比雪夫，斯大林留了下来，敌军狂轰滥炸，莫斯科处于慌乱之中。

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庆祝活动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最高统帅斯大林发表了演说，他又一次施展出明确的、条理分明的、科学的分析才能，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告诉他的人民应该如何有效地抗击侵略者，他宣布，闪电战已经在苏联失败，我们面临的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他最后以伟大的自豪感和爱国精神号召人们：“让我们的伟大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

翌日上午，斯大林在红场，站在列宁墓上，检阅军队，鼓舞他们开赴前线，奋勇杀敌！

斯大林在莫斯科危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离开莫斯科，即使在敌人推进到莫斯科郊外的情况下，他依然坚守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命运仿佛同莫斯科已融为一体，这是一次对命运的挑战。全世界的命运也仿佛都系于克里姆林宫的塔尖上。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来说，克里姆林宫已经成为他们意志和力量较量的象征。当斯大林拒绝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希特勒发布了他的命令：“炸毁克里姆林宫来庆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被推翻”。正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环境中，战时斯大林的形象才达到了今天人们所知道的高度，斯大林成了百折不挠、无坚不摧的象征。

1942年夏季来临，英美军界除了少数不同意见之外，一致认为苏联的抵抗很快就会被粉碎。德国军队在北面推进到列宁格勒，在中部推进到莫斯科城下，在南部跨过干燥辽阔的平原，一直向伏尔加格勒推进。

正是在这个危急时刻，1942年8月，丘吉尔来到莫斯科，首次同斯大林会见。这次会见使两个经历和观点截然不同的人走到一起来了。丘吉尔是马尔博罗公爵的后裔，是公认的战时领袖，具有伟大的表演才能，酷爱威武雄壮的战争戏剧。斯大林则出生于贫穷之家，靠无情的才能成了最高统帅和苏

联人民之父，对他来说，战争是他早已司空见惯的残酷斗争的一部分。

斯大林这时已 63 岁，在他坚强的褐色面容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一个不必要的动作和举止，严肃朴实，饱经风霜，意志坚定。1942 年 9 月 7 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做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的报告，他是这样描述斯大林的：“同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会晤，对我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俄罗斯能在它的生死搏斗中得到这样一个伟大、倔强的人的领导，是值得庆幸的。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适合于命运为他安排的黑暗的、暴风雨的时代。他是一个具有无限勇气和意志力的人，一个言谈直率甚至粗鲁的人……特别是他怀有一种在任何人和任何民族都最为重要的幽默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赋有非凡冷静智慧的人，是摆脱了一切幻想的人……”这是一个曾经作为对手的朋友的评语。

斯大林格勒，这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是苏联的象征，苏德双方倾注了巨大的兵力来一拼死活。斯大林从战争一开始，就对军队实行了强有力的领导，他安排战争的各个方面，向各方面军发布命令。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成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经过 182 天的激战，苏军获得了胜利，德军损失了 50 万人的兵力，战争形势为之改观。斯大林已经作为一个军事巨人出现在全世界面前。

苏联的工业自从 1941—1942 年秋冬大疏散以来已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工业的发展使红军的装备有了极大的改进。苏联军队已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占了优势。更重要的，战争锻炼了一批年轻的、富有才干的将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沃罗诺夫、安东诺夫、瓦图金、叶廖缅科、马利诺夫斯基、崔可夫等，已广为人知。

1943 年库尔斯克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形势，苏军转入反攻，到 11 月，收复基辅。德军在退却中，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一些村庄和城市几乎灭绝。苏军收复了失去领土的三分之二。

1943 年 11 月底，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首次会晤。会议的地址是斯大林选定的，他要就近保持对战场的指挥。会谈在苏联驻伊朗的大使馆里举行。这是一次世界性的会议，将要讨论的是整个世界的命运。然而，谈判桌上的这三个人，在身世、观点和抱负等各个方面具有多么大的差异：一个是公爵的后裔，一个是鞋匠的儿子，一个则是资本家的血统，斯大林和丘吉尔处于对立的两极，而罗斯福则居中调和。

斯大林身着苏联元帅服，他发言语气平缓，思维周密，言简意赅，常常带着绝对权威性的口气，而丘吉尔则在议会上演讲，灵感迭现，高谈阔论，晦涩冗长，这使斯大林很不耐烦。会谈总的来说还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

会议临近结束，在庆祝丘吉尔 69 岁生日时，斯大林把他作为“伟大的朋友”而举杯祝贺。在另一个仪式上，丘吉尔以英王的名义赠授给斯大林一把“斯大林格勒荣誉剑”，斯大林此时深受感动，充满感情地在剑柄上吻了一下。这是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谁会想到，英王陛下竟会给这个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以这样的礼遇！

丘吉尔始终对斯大林有些敬畏，他的私人医生说，他当着斯大林的面总有一种不自在感。他感到面前的这个人思想敏捷，运筹帷幄，思考周全，拥有绝对而又无情的权力。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认为斯大林具有杰出的军事头脑，说他每次发言中都是以他那敏锐而又准确的洞察力来弄清局势的各

种含义，“在这方面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突出，谁也不会看不到此人的伟大之处”。

德黑兰会议建立起三国同盟，并商定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7月，苏军把德军赶出国门，并进入波兰东部。8月，红军占领罗马尼亚。10月，推进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1945年1月，苏军开始了四个方面的大攻势，朱可夫和科涅夫担任主攻，两个方面军拥有220万人，迅速地向西推进，直抵奥德河。

1945年2月初，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决定了战时各国的命运，绘制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地图，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联合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建立的，会议确定了德国应无条件投降，并予肢解，制定了盟军各自的占领区，决定了德国赔款的数目以及战犯的命运，划定了东欧各国的边界。同时，也讨论了对日作战和战后日本的命运，萨哈林群岛、千岛群岛归苏联管理等等，这些影响到世界上亿万人命运的新地图就是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三巨头”绘制的。然而，他们有时针锋相对，激烈争吵，有时又漫不经心，自我消遣。会谈中，斯大林在摊在前面的纸上画狼，丘吉尔一个劲地抽他的雪茄，罗斯福却心不在焉，好多次昏昏欲睡。这时候的罗斯福已到了生命的极限，他仅有60天的寿命了。

1945年4月30日，苏军直捣德国国会，希特勒自杀。5月8日，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统帅部向朱可夫元帅投降。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大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控制着整个场面，千百万人欢呼他们的胜利。

1945年7月，三个同盟国的领导人——斯大林和丘吉尔，这时加上美国的新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晤，解决对日作战和战争遗留问题。这次会议的气氛同前两次已迥然不同，杜鲁门仿佛得道成仙一样傲慢自负，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向斯大林透露了一项重大消息：美国有了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式炸弹”，斯大林同样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听着他的诉说，而丘吉尔则冷眼旁观。正是这个“新式炸弹”，使会谈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会议中途，丘吉尔满怀必胜的信心返回伦敦参加大选。然而，再回到波茨坦谈判桌上的已经不是他了，而成了新首相艾德礼。艾德礼以同样的傲慢对待斯大林。两个无知的狂人认为他们可以主宰世界了，他们犯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由此开始了战后长期的冷战时期。

1945年8月6日，美国把两枚原子弹投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它的灾难震惊了全世界。战争狂人想以此威胁苏联，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任何人手中的法宝都不是永远灵验的。4年以后，苏联同样有了这种法宝，可以同美国针锋相对地较量了。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以7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取得的一场艰苦卓绝的胜利。它拯救了苏联，也拯救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命运。战争中斯大林的最高统帅地位是没有疑义的，他手下的杰出将领都无异议地接受他的领导，他不是靠职务，而是靠才能，智慧和远见卓识，还有他强有力的个性支配了他们，鼓舞起军队和人民必胜的信念。正如丘吉尔所言，苏联人民能在“它的生死搏斗中得到这样一个伟大、倔强的人的领导，是值得庆幸的”。正因为这样，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的胜利，将



把斯大林的名字永远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斯大林参与并主笔绘制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地图，这就是后来的东西方格局。苏联军队由东到西直扫柏林，战后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毫无疑问，这些都铭刻下斯大林巨大的历史功绩。

战后，全世界开始对斯大林和苏联刮目相看，斯大林成了一个世界巨人，他的声音震撼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 十一、斯大林的晚年

战争结束时，斯大林已是一个 66 岁的老人。他的身体一向强壮，然而几十年颠簸动荡、艰苦紧张的生活，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刻下了印记。革命前 7 次被捕、6 次流放，总共长达 9 年多时间，后来是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特别是这一场世界大战，夜以继日地紧张操劳，呕心沥血，都极大地耗费了他的精力。象整个国家一样，他也需要休养生息。但是都没有充足的时间。

战争使全国满目疮痍，敌人的烧杀抢掠所造成的惨象令人毛骨悚然，几乎没有哪个苏联人没有被夺去亲人的生命，广大人民生活艰难困苦之中。1946 年到 1947 年，被称为富饶粮仓的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事。

早在 1943 年，斯大林就开始考虑在战后怎样重建国家，他曾宣布，“旧俄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也打过它。这些统治者打它，就是因为它落后……我们至少比先进国家落后 50 年至 100 年”。现在，苏联开始了全面重建，新的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体现了英勇奋斗的精神，打上了斯大林的不屈不挠的决心的烙印。

苏联开始在战争的废墟中勇敢地站立起来，并作为一个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出现在世界舞台。

斯大林的形象越来越高，他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身上的巨大而神圣的光环，使他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现在成了他一个人主宰着政治舞台。全国上下对他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荒谬程度。不仅他的几千万张的大幅照片到处张贴，而且他的全身和半身塑像还成千上万地在全国各地出现，他的胸像甚至矗立在高加索的最高峰爱尔勃鲁兹上，底下镌刻着这样的字句：“献给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斯大林成了神话中半神半人的英雄，每当提到他的名字，就要说“我们敬爱的父亲”，“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我们亲爱的十分敬爱的斯大林”和“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被描绘成各民族的最伟大慈父，一切科学的泰斗，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194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的 70 大寿，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对斯大林颂扬的比赛，人们挖空心思寻找最空前绝后的语言来献给斯大林。

政治局委员们一个个不甘落后，要超过别人。赫鲁晓夫的颂扬无疑是名列前茅的：“千百万人民对斯大林怀有最深的爱戴和忠诚的感情。是斯大林同列宁一起建立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正因为如此，我国各族人民以非同凡响的热情和儿子般的爱戴之情称伟大的斯大林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

伏罗希洛夫的语言也同样响亮：“斯大林——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物，英明的领袖，导师和天才的统帅……光荣属于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英明、天才的领袖和导师。”

苏联的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把斯大林的神圣还扩大到斯大林的母亲身上：“12 月 21 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在这一天我们也不要忘

记别的事：我们的思想转向了第比利斯近郊仰望着达维德山，心中怀着虔诚的悲痛和热烈的感激，在格鲁吉亚一位矮小、朴素的妇女的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遗骸面前我们低头默念，70年前，她给了世界以人类最伟大的男子，我们的领袖和父亲。”

颂辞铺天盖地而来，斯大林成了神圣的上帝。

斯大林本人对这种“个人崇拜”如何呢？他在接受这种效忠和歌功颂德时，态度是超然的，并不为之感动。他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考虑接受了这一点，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图慕虚荣的人。在外交关系中，他都表现得很朴实、谦虚和庄重。

1951年夏天，斯大林回格鲁吉亚的波尔若米度假，一路上都使他不愉快，他最忍受不了的是一大群人给他鼓掌，向他大喊“乌拉”！这时他总是脸都气歪了，十分难看。格鲁吉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使他走不出车厢，无法上汽车离开车站……人们差一点没有卧倒在车轮下面，他们扑过来，大声喊着，投来一束束的鲜花。在这种热烈欢迎的场合，斯大林总是十分生气，他曾恶狠狠地说：“张着大嘴伸着脖子喊，简直是木头！……”他感到这种崇拜的盲目、愚昧和无知。

尽管这样，他还是为自己的伟大所陶醉。晚年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固执，刚愎自用，不通情理，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而他周围的同事全都拜倒在他的脚下，看他的限色行事。他的性格中的一些病态的因素得到发展，无端的恐惧和猜疑心理也被一些投机分子所利用，导致对许多无辜者的滥杀。

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和斯大林在一起度过他的最后几年是根难受的。他尖锐地感到孤独的难受，他需要有人始终呆在他的身边。

“我想起斯大林在阿方度假期间发生过一次惊人的事件。这一定是发生于1951年，因为1952年他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休假。一天，米高扬和我正在庭园里兜圈子散步，斯大林走出来，站在门廊里。他好象没有注意到米高扬和我。他没有对象他说：‘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也不相信我自己’。

“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自白。我们看到这种对人的不信任已经很久，可是现在他却自己承认了，而且承认得如此直截了当。你能想象这样的话是出自一个决定他国家的命运和影响世界的命运的人之口吗？不信任人那是一回事，即使他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恰恰表明他心理上有严重问题，那也是他的权利。可是，一个人出于一股不能自制的冲动，要搞掉任何一个他不信任的人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这些在斯大林身边的人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要他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就得以继续生存和工作。但是，只要什么时候他对你的信任中止了，斯大林就要开始对你注意审查，直到他的不信任不断上升，终于超过饱和点。于是就轮到你追随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们去了。那就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并在党的队伍中同他一起工作、同他并肩奋斗的人们的处境。许多斯大林的最有贡献的战友都被消灭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可以说明我的意思的最好的例子。斯大林1951年在阿方的这种自供使我得到帷幕后面的一瞥，这个幕的后面隐藏着他领导党和国家的年代里所演出的悲剧的一些原因。而他统治的时期是长的，非常之长的。许多忠实和无辜的人们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丢了他们的脑袋。

“斯大林的性格是残酷无情的，他的脾气是粗暴的；但是他的残酷无情并不总是对被如此粗暴地对待的人含有什么恶意。他是属于一种天生的残

酷无情。他对每一个人都粗暴无礼。我常常亲自体验到他的粗暴无礼。斯大林是喜欢我的。假使他不喜欢我或者对我有了丝毫的怀疑，他很可以在任何他愿意的时间用他除掉那么多被他讨厌的人同样的方法来把我除掉。不止一次，在粗暴地或者恶意地对待了我之后，他会表白他的善意。但道歉是不合他的真正本性的”。

晚年，又出现了几次大的清洗。

1949年前后，发生了一起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这一案件有许多疑点，它导致了由日丹诺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党内许多高级官员被枪决。案件本身可以说是直接同日丹诺夫相联系的，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突然去世，他的死也留下了一些疑点。在去世前，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巅峰时期，他在斯大林之后任第一书记，许多人把他看做是斯大林的最可能的继承人。而这一时期，马林科夫曾一度失宠，1946年7月他被派往土尔克斯坦，朱可夫元帅被调往州里领导军区，赫鲁晓夫则被撤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日丹诺夫的两名助手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得到重用，沃兹涅先斯基是新的专家名流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位经济学教授，长期负责苏联的计划工作，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库兹涅佐夫一直担任列宁格勒党的第二书记，日丹诺夫被召回莫斯科后，他接任了第一书记，1946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国家安全和军队，这意味着他监督了贝利亚本人。可见，日丹诺夫一些人得势的同时，正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失势的时候。

1948年夏，即在日丹诺夫去世前，马林科夫回到中央，为总书记之后的第一书记。日丹诺夫去世后，即开始了一场对列宁格勒的清洗，据说是因为他们建议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中央迁到列宁格勒，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被看做企图反对中央。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库兹涅佐夫被捕前，他有一次同人一起到斯大林那里参加宴会，这位年轻英俊的列宁格勒书记微笑着走到斯大林跟前，可是斯大林却不伸手给他握，只干巴巴他说一句：“我没叫你来。”库兹涅佐夫一下变了脸色，缩着身子就走了。

不久，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人都被逮捕，因犯有“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赫鲁晓夫后来在“秘密报告”中说，“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感到恐慌。现已查明，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斯大林好几次提出要让沃兹涅先斯基重新工作，他重视他的才干。然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却始终置之不理，他们必欲置对手于死地。

1949年底，赫鲁晓夫从乌克兰回到中央，并任莫斯科第一书记，“斯大林将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改变一下我们这个集体领导中的均势，为了遏止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事的增高，处在权力顶峰的斯大林日益孤陋寡闻，越来越不能从实际出发来领导这个国家。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最

后的几年，他的生活非常孤僻”。 “他到处看见敌人。这已经是一种变态心理，一种迫害狂，这都来自他的孤独和心灵的空虚。”

这时候又发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案件”。这一案件的发生是这样的：还在战时，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它的负责人是中央委员、工会国际前主席洛佐夫斯基，成员有莫斯科犹太剧院院长、著名演员米赫伊尔斯，还有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莫洛托娃，她是中央委员、渔业部长。这个委员会在乌克兰解放后，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认为这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搞的阴谋，这样就导致了一场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浪潮。

斯大林一向对犹太人没有好感，怀着极深的偏见，但作为领袖和理论家，他很留意决不使他的著作或演说有反犹太主义之嫌。早在1944年的时候，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准备结婚，她的丈夫是她的中学同学，是一个犹太人，这使斯大林很不高兴，他坚决地说，他永远不要见到他。一直到1947年他们离婚，斯大林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女婿，不愿让他到家里去。离婚反而使斯大林非常满意。有一次，和女儿谈到她的第一个丈夫时，斯大林说：“这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他硬塞给你的。”虽然斯大林本人从未强迫女儿离婚，然而马林科夫也赶快照此办理，也让自己的女儿和她的犹太丈夫离了婚，以此显示出他紧跟领袖的忠心。

这一案件导致洛佐夫斯基及其一批知名的犹太人活动家被逮捕并处决，许多人被流放。

伟大的戏剧艺术家米赫伊尔斯则被谋杀，其谋杀的指示者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女儿都详细地谈到这一点。斯维特兰娜写道：“1948年在一次偶然的场合里，我几乎成了一件蓄意谋杀事件的见证人。”“在偶然一次和父亲在别墅会面时，我走到他房间里，正好听见他在和什么人打电话……他象下结论似他说了句：‘好吧，汽车车祸’……在第二天我到大学上课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她父亲在犹太剧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哭着告诉我，昨天在白俄罗斯，坐在汽车上的米赫伊尔斯惨遭杀害。”米赫伊尔斯就这样死于汽车事故。

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莫洛托娃也因此被逮捕，当中央委员会讨论免去她各项职务时，其他人都投票赞成，莫洛托夫弃权，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莫洛托娃被流放，整整四年，甚至她的女儿也不知道母亲上哪儿去了，大家以为她早死了，斯大林去世后，她才从哈萨克斯坦流放地回来，她还活着，她把一切都归罪于贝利亚。她开始不断地颂扬对伟大的斯大林的怀念，甚至在做菜汤时也把蒜丝切得细细的，还说“斯大林一直是这么一种吃法。”

当时被逮捕的还有安德列耶夫的妻子，加里宁的遗孀等，因为她们都是犹太人。

斯大林的疑心越来越重，这使他失去了对一切人的信任，他到处注意到的都是“敌人”。

1948年，当时任南斯拉夫中央执行局书记的德热拉斯来到莫斯科，这是他第三次见到斯大林。他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几次

---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23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15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140—141页。

会见的情形，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德热拉斯笔下的我父亲的写照既传神，又可信，无论是父亲的一举手、一投足，他讲的话以及当时的气氛都无不酷肖。”

德热拉斯对 1945 年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描绘的：“他穿着元帅服，软底鞋，没有配戴什么勋章，只有一枚金星，即苏联英雄勋章挂在左侧胸前。在他的举止中看不到任何做作和大人物的架子。这不是画像和纪录影片中的威严的斯大林——不是那个行动缓慢、举止从容的人。相反，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一会儿摆弄着他那个邓希尔公司生产的带白色标记的烟斗，一会儿用蓝铅笔把谈话的主要题目记到纸上，马上又把记下的东西用斜线划掉，他的头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儿转到右边，坐着也一刻都不能安静，总是动来动去。”

“他个头很小，身材也不好看——身躯短并不魁伟，四肢太长，左手和右肩显得不太灵活，他的肚子不小，头发稀少，从前额到头顶并没有秃的地方。他的脸色很白，面颊红润，后来我知道，这是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的特征，在苏联上层社会中称之为‘克里姆林官的脸色’。他的牙齿发黑，也不整齐，有些往里歪。就连两撇胡子也不浓密，不给人以威严之感。但不管怎样他的面孔并不令人讨厌，而是有一种民间的、农民的、一家之主的表情，那不断转动的黄眼睛里有某种严厉的和狡猾的混合体的东西存在着。”他有一种“颇为粗鲁而充满自信、含蓄而深刻的幽默感。他对别人的谈话的反应迅速而果断，丝毫不犹豫，虽然他能把手听完，但是显然不愿听长篇大论。”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比，也是那么冷静、谨慎，遇事从各方面进行周密的计算得失，然而斯大林的天性是热情的，易于冲动的，同时他又具有各种不同的面孔。而且他进入每个角色时，都表现得如此真实，以致于在人们看来，他从来不会假装，每次都是非常真诚。正因为这点，他比莫洛托夫具有更深的洞察力，预计事物可能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更有远见和更加灵活。”

第三次会见时，斯大林已有了明显的衰老，“我觉得他的衰老中，有某种悲哀和病态的因素”。“他思维能力的衰退更加明显。他总是喜欢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西伯利亚流放，高加索的童年等等。”“只有一点没有变化，他还是那个粗暴、尖刻、多疑的斯大林。所有的人都奉承他，在他尚未表态之前每个人都避免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一旦表了态，就都急忙地表示赞成。”

当时，季米特洛夫住在苏联，他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是得到斯大林尊重和在他面前享有威信的人。他正在患病，一副病态，然而，他的思想活跃、敏锐而新颖，和他的缓慢而疲倦的动作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未老先衰的，体力已完全衰竭的人，还在发射着强大的智慧和热情。

一次，在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三国领导人会谈中，斯大林对季米

---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 154 页。

[南斯拉夫]米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45—36 页。

[南斯拉夫]米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52—53 页。

[南斯拉夫]米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15 页。

[南斯拉夫]米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20 页。

特洛夫倡议建立东欧各国联邦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两国成立关税同盟极为不满，他的机智变成恶毒的粗暴，他的固执变得毫无调和的余地，这时他还是克制自己，不要使自己狂怒到不可收拾。斯大林喊道：“我们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你们的这些勾搭的！你们如同大街上的娘儿们一样，满嘴胡说八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新闻记者马上就抓住了而且如获至宝！”季米特洛夫想要解释和辩护一下，但斯大林总是打断他的话，不让他把话说完。“您是想标新立异，一鸣惊人！您完全错了，你们的联邦是不可思议的。”

季米特洛夫用一种和解、几乎是屈从的口气说：“是的，我的确是错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些错误，可以学习到如何处理对外政策，并取得教训。”

斯大林尖刻地嘲笑他说：“学习！搞了50年政治，才想起纠正错误！你的问题不在错误，而是立场问题，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不同。”

季米特洛夫满脸通红，他稀少的头发散乱地贴在满是皱纹的脖子上。这位勇敢无畏、曾在纳粹的法庭上痛斥法西斯、震惊世界的“莱比锡审判案的巨狮”现在落到如此垂头丧气的地步。

当季米特洛夫抓住曾把关于关税同盟条约草案送给苏联政府，而并未遭反对时，斯大林还是毫不妥协：“胡说八道！你如同一个共青团员不自量力。您总想震撼世界，似乎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

斯大林粗暴而严厉，他在处理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时，明显地表现了大国霸权主义，一切都应该由苏联来决定，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同铁托的关系更是每况愈下，他不能容忍铁托的独立。后来，铁托成了“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铁托主义”取代了托洛茨基主义，铁托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曾扬言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然而，斯大林不遗余力，铁托也没有垮。斯大林去世后，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一张铁托写的便条：“斯大林同志：我请您不要再向南斯拉夫派遣意在杀害我的恐怖分子……如果这样的事情还不停止的话，我也将向莫斯科派去一个人，而且可能用不着再派去第二个。”由此可见，斯大林在处理同铁托的关系中达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斯大林的最后几年，他身边的“老近卫军”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安德列耶夫都失宠了，斯大林甚至怀疑他长期的密友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并在他的住所安装了窃听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整天处于提心吊胆之中。正象布尔加宁说的一句话：“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房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

那么，斯大林这些同事们的命运如何呢？

## 十二、斯大林的同事们

在斯大林的晚年，出现了一个谁都害怕的人物，这就是贝利亚。他把斯大林的性格和心理揣摸得极其精熟，因此他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关于这个人要多说几句，许多见过他的人都极其一致地认为，他天生就具有当密探的才能。德热拉斯写道：“贝利亚也是个小矮个子。在政治局内大概没有比斯大林高的人。贝利亚也是个胖子，脸色又苍白又黄，手心软而潮湿。当我看到他的四四方方的嘴唇和透过夹鼻眼镜看着对方的那双青蛙般的眼睛时，我简直是如同触了电一般，因为他实在太象伏伊科维奇——贝尔格莱德王国警察局的一个局长，他的专长就是折磨共产党员。我用巨大的毅力才摆脱了这个不愉快的比拟，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不但从外形上很象，他们两人的全部表情——自信、蔑视、拍马奉迎和谨慎的混合体——也都太相象了。”赫鲁晓夫则把贝利亚说成是一个恶棍，“他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家伙，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以谄媚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凭借欺骗和奸诈爬上了高位”，“他是一个阴险的，不择手段的投机分子，他是一个屠夫，是一个凶手”，“在贝利亚身上，不仅没有一丝共产党的气息——而且连一丝人类尊严的痕迹也没有。”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同赫鲁晓夫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贝利亚这号人在巧言令色的侍臣中，是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在他身上体现了东方式的奸诈阴险，谄媚奉迎和口是心非，甚至连通常不易受骗的，如我父亲那样的人，也被他所蒙蔽。”“我认为贝利亚的为人更狡猾，更背信弃义，更奸诈，更无耻，更死不回头，更顽固，也就是说胜父亲一筹。”早在1922年，贝利亚还在格鲁吉亚，他不时来到莫斯科，对斯大林顶礼膜拜，那时他还声不响，不露锋芒，而且也很谦虚朴素。而娜佳则向斯大林大闹过一场，她要求一定不许这个人进自己的家门，斯大林问她：“贝利亚到底有什么不对头？拿出事实来！你没有能说服我，我没有看到事实，我信任他。”娜佳则一个劲地喊：“你还需要什么样的事实，我看他就是个坏蛋！我不能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娜佳是否有先见之明呢？她是否是以女人特有的敏锐的直觉认识了这个人呢？

关于贝利亚，在他生前谁都不敢多发一言，甚至斯大林也让他三分，而在他后来被枪毙后，则到处都流传着他的无穷无尽的轶闻趣事。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其卑鄙下流无以复加。当他还在格鲁吉亚政治保卫分局的时候，有一次他坐专车到一个地方，见到了一个17岁的少女，这就是有名的大美人妮娜，她是赶来为她被捅的哥哥求情的，然而她进了车厢后就没有能再出来回到自己的村子，她被贝利亚带走了，因为她的漂亮，他把她锁在卧车里，她就这样委身于他并成为他的妻子。

在贝利亚拥有绝对权力的时候，凡是看中的每一个女人都要成为他的情妇，他的私生子是不计其数的。在他被捕后，中央得到了一份人数超过一百以上的被贝利亚奸污的女孩子和妇女的名单。贝利亚对她们都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请她们吃一顿饭，给她们喝放有催眠药的酒。在他被枪毙后，在党内会议上揭露了他的无数“风流丑事”，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党的会议开得如

---

[南]米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4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9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54页。



此引人入胜：这位业已垮台的“领袖”的色情生活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全党第一次知道贝利亚还只是在1935年。1938年他接替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战后贝利亚被授予元帅军衔，当然是宪兵元帅，他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46年他成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是苏联获得奖章最多的人，光是列宁勋章就有七个。贝利亚手中的权力越来越令人生畏，任何人如果想确保斯大林对他的欢心，就不能不同时巴结讨好贝利亚。

赫鲁晓夫写道：“战时，贝利亚成了党内不可一世的恐怖人物。在斯大林身边的组成上，我清楚地看到了贝利亚日益增长的权势。”“有一个为斯大林做烤肉的高加索厨师长已经当上了陆军少将，我每次到莫斯科，都看到这位厨师长的经带和勋章越来越多，显然这是为了酬答他做烤肉的技术而奖给他的。”“每个人都感觉到，有这样一个穿着军装，挂满一身勋章的厨师长实在讨厌，可是我们从不提它，因为说了没有什么好处。除了那个少将厨师长之外，还有一个专为斯大林的厨房采办酒类、烤肉用的羊羔和其他各种食品的格鲁吉亚人，他在战争期间已经当上了陆军中将。每次我从前线回来，总注意到我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也增加了一个或两个勋章。我相信无论哪个人都会对这种做法和我一样感到恶心。”

在斯大林晚年，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主要人物还有：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等人。

马林科夫是党的年轻的后起之秀，他更矮更胖，具有蒙古人的面容，颧骨高高的，肌肉松弛，一头漆黑的头发。看上去，他是一个不露声色，寡言内向的人，注意力集中，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但在他那厚厚的脂肪下面似乎存在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活跃而机灵，有一双聪明而无所不见的眼睛。二十年代他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毕业后成为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后来成为党中央干部部副部长，1939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任苏共中央书记，战时成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1948年，在斯大林总书记之下任中央第一书记。他后来被当作“皇太子”，斯大林的继承人。

日丹诺夫个子也不高，留着褐色的短胡子，前额很高，鼻子尖尖的，脸色红红的，一种病态的红润。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局里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又有心脏病，总的说来是个性格温和，极好相处的人。他处处听命于斯大林，就象小孩子紧拉着大人的手不放，自己也想学大人一样。在家里他从来是唯女人之命是从：听他姐姐们的，听老婆的。他被看做是政治局里的理论家，一度曾成为斯大林的最可能的继承人。

莫洛托夫是和斯大林合作最久的一个老搭档，早在1912年他们就合作主办《真理报》，他早于斯大林在1921年担任中央书记。莫洛托夫显示出来的是巨大的组织工作能力。邱吉尔曾形容他是完全现代化的机器人，然而这只是他的外表和他的特征之一。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令人捉摸不透，他身材结实，沉着稳重，能吃苦耐劳，说话字斟句酌，富有条理。在政治局里他是唯一一个同斯大林以“你”相称的人，他从来没有过自卑自贱的媚态。他有一个清秀雅致的妻子，也是中央委员，担任渔业部长，人们把她看成是莫斯科第一夫人。

卡冈诺维奇咋咋呼呼，粗声大气，外表看起来很象一位居住在自己庄园

里的普普通通的胖爷爷。他在党内享有“天才组织家”的声誉，他也是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早在1924年就担任党中央书记，他后来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莫斯科第一书记，中央农业部部长，长期以来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赫鲁晓夫是这样评价他的：“卡冈诺维奇是这样一种唯唯诺诺的人，只要斯大林使个眼色，叫他杀死自己的父亲，说那是为了事业——斯大林的事业，他也会照办的。斯大林决不需要特意去控制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是一个非常讨嫌的谄媚者，到处胡乱告发，说人家是敌人，使人家遭到逮捕。”

“他是一个十足的走狗。斯大林只要抓抓卡冈诺维奇的耳朵背后，他就会向党狂吠。”后来，当逮捕他曾担任航空工业部部长的弟弟时，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斯大林打电话告诉他，说他弟弟可能要被逮捕，他说：“好吧，如果需要，那就逮捕他吧。”然而他的弟弟没有等到逮捕，就在一个小卫生间里开枪自杀了。

米高扬，早在1935就成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商业部长。关于他，流传了许多笑话，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不倒翁。“您知道吧，米高扬写了一个回忆录，书名是《从伊里奇（列宁）到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不梗塞，不麻痹》”。他在政治局里是跳舞跳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他青年时代的宿愿是当个舞蹈演员，他没能实现这个幻想，但却把舞蹈艺术别具匠心地运用于政治之中，令人头晕目眩的轻快和敏捷、严格准确的节奏以及在难度最大的旋转中精湛高超的舞步——所有这些都被他巧妙地运用到政治舞台上。

伏罗希洛夫身体健壮，始终保持着军人的风度，他是政治局中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一个，他在内战时出名，后来被誉为“红色统帅”，苏联第一元帅，长期是斯大林最信得过的亲密同事。他十分讲究阔气排场，酒量过人。

布尔加宁生得很漂亮，是个非常典型的大个子俄罗斯人，留着老式的小胡子，说话办事异常谨慎，他处处不显出自己的特色。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并任国防部长，是斯大林的军队第一副手。他从没有军队的经历，他以一个文职人员获得了元帅的军衔。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赫鲁晓夫，他是一个身材矮胖、结实、性格活泼、动作灵巧的人，仿佛是用一块木料刻出来的一样。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和所有的实干家一样，特别能适应环境。他喜欢的一句谚语是：“打架时没有时间选择木棒”。他的知识和才能主要来自生活和实际的积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来自民间的幽默和生动而形象地表达思想的才能使他招人喜欢。他给人的印象是忠厚和直率，自然而不做作。他无疑是一个精明的实干家，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具有难得的才干。赫鲁晓夫在政治局中和马林科夫一样是一个后来者，1929年以前，中央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仅仅过了十年，到1939年，他已成了政治局委员。他始终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然而，人们都把他看错了，以为他是一个可以胡弄的人物，可他却反过来胡弄了每一个人，包括斯大林。可以说他是一个表面上憨直而心理极其复杂和阴险的人。

他们组成了一群活跃在斯大林身边的领袖班子，说他们活跃，是因为他们经常同斯大林在一起，是斯大林最亲近的同事，但他们都明确无误地知道在斯大林面前处于什么位置，什么时候要表示忠诚，什么时候不能多嘴多舌，什么时候要唯命是从，他们全都象一个模子里训练出来的一样。谁都不能为

---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01—502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4页。

自己打保票，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自从 1939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直到 1952 年 10 月才召开党的十九大，这中间，近十三年时间都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是由政治局决定的，更直接地说，是由斯大林身边的小圈子决定的。特别在战后，斯大林常常和他的同事们在他的别墅里一起共进晚餐，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晚餐，通常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四、五点钟。斯大林形成了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他的同事们也只好全都适应他的习惯。在这种晚餐的过程中，他们从每日新闻、生活趣事、往昔回忆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国家大事，无所不谈，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前途和命运也是在这中间决定下来的。

斯大林到了晚年，越来越感到孤独，他需要有人始终待在他的身边。自从他女儿 1944 年结婚以后，他们已很难见到一次面，可以说，他已没有了家庭生活。因此，他和同事们在一起的生活几乎就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选择了一个小圈子，老是使他们在自己身边转，而在另一方面总还有另一批人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内得不到他的邀请，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惩罚。被邀请和斯大林会面共进晚餐，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如果你被邀请一次而没有再被邀请，就会认为是不祥之兆。

赫鲁晓夫，斯维特兰娜，还有参加过这种宴会的德热拉斯都曾详细地描述宴会的情形，他们有着差不多一致的看法。晚餐中人们都相当随便，无拘无束，由于酒喝得很多，更是无所顾忌，这中间充满了许多轶闻趣事。

最后这些年，晚餐差不多都是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即孔策沃别墅。每个人谈自己所负责部门的最新消息，当天会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及自己的工作设想。大家都痛快地喝酒，而斯大林酒喝得不多，他只是看着别人大吃大喝感到很愉快。有一次，斯大林还是喝过了头，于是同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一起唱起了民歌，那位部长喝得站都站不稳了，但是觉得十分幸福，一直到最后大家才好不容易使这位部长安静下来，把他送到汽车上，打发回家了。

晚餐上，也经常打趣开玩笑，甚至说些“市井俚语”，满口粗话，更少不了贝利亚最粗野和下流的玩笑。被取笑最多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和米高扬，而贝利亚总是在挑起斯大林去攻击别人。椅子上偷偷放上了西红柿，等人住下坐的时候，大家就粗声大笑起来。酒杯里放一匙盐，或把伏特加和葡萄酒混起来。斯大林只是坐在那里吸烟斗，看着别人逗乐。被称为“席长”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经常是烂醉如泥，被弄回家去，一般他都是醉倒在厕所里，吐了一地，贝利亚回家时也是这副模样，虽说谁也不敢往他的坐椅上偷偷搁西红柿。斯大林把他叫做“检察官”。

有时，斯大林也取笑一下贝利亚，他老是讲一个笑话：一个契卡人员和他的一个教授邻居。这个教授对这个邻居的不学无术十分恼火，便对他说：“你呀，连《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著名长诗）是谁写的都不知道！”这位契卡人员觉得受了奚落，不久他就把这位教授邻居给抓起来了，他在朋友面前夸耀说：“他在我手里承认了，他就是作者！”换换别人是不敢开这种玩笑的。

斯维特兰娜写道：“夏天领袖们就在露天寻欢作乐。父亲的别墅里有一个不大的浅水池，有时候人家就把这位‘席长’推到水池里去，引起一阵轰然大笑。后来警卫员就找了一个理由把这个小水池的水放了，免得哪位领袖

呛死在里面，这很象彼得大帝时代皇帝解闷拿宫廷大臣取乐。”

有时候，斯大林的小心翼翼达到了病态的程度，每当一起进餐时，别人没有尝过的菜，小吃或酒，他是不去碰的，每一种菜都有指定的试味人。只有贝利亚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因为他从来不吃送给大家的菜肴。甚至在同斯大林共餐时，他也总是吃自己从别墅里带来的饭菜。

参加这种晚宴，有时使人们很难堪。斯大林总是要人们跳舞、喝酒，结果人们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串通女服务员用有色水来代替酒，斯大林发觉受了骗就发火，大闹了一场。还有一次，斯大林在摆弄一枝枪，走了火，险些打死米高扬，当时斯大林坐在米高扬旁边，子弹钻进地里去了，砂土溅了一桌子和米高扬一身。没有人说一句话，大家都吓坏了。

斯大林到了老年，各方面都在衰退，但作为一个专制的家长，疾病在折磨着他，这是他强有力的个性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也就更加粗暴、疑心、不讲情理。这是象斯大林这样的老年人不可避免的症候。这就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一个谁都惧怕的说一不二的领袖，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最后两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失宠了，斯大林连面都不愿和他们见，这使两个人很难过。赫鲁晓夫写道：“我深信，如果斯大林活得更久，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将会有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伏罗希洛夫也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有一次斯大林竟然发起火来：“伏罗希洛夫是怎样钻进政治局的？”别人对他说：“那是你把他安排进去的。”他对人的不信任感缠绕着他，使他难以摆脱。

这艘由一个固执病态的老人驾驶着的大船将会如何呢？

---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 353—345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446 页。

### 十三、斯大林死之谜

斯大林的最后两年，他周围的人们围绕着权力的斗争更加激烈。有迹象表明，斯大林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清洗。

1951年，发生了所谓“格鲁吉亚事件”。一大批格鲁吉亚领导人受到了控告，其罪名是：在格鲁吉亚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中心，这个组织要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企图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并入土耳其。这样就在格鲁吉亚进行了一场清洗，共和国中央书记，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和国总检察长、司法部长、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等人都被逮捕，格鲁吉亚中央局十一人有七人被捕，到1951年11月，有427名党的州、市和区委书记被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撤职和逮捕。与此同时，还逮捕了明格列尔地区许多领导人，这一案件又称为“明格列尔案件”。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成了这种专横而不法清洗的牺牲品。

这一案件极可能是针对贝利亚的，因为格鲁吉亚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贝利亚的领地，各项人事安排主要由贝利亚负责。1949年1月，格鲁吉亚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新领导人在格鲁吉亚搞起了对贝利亚的个人崇拜，贝利亚的影响竟然超过了斯大林，这明显是对斯大林个人权威的挑战。

斯大林虽然重用了贝利亚，但对他也并不完全相信，甚至早在1941年斯维特兰娜到贝利亚家里作客，晚上被他的妻子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斯大林就怒气冲冲地给她打电话，使劲在电语里嚷道：“你还不给我快回家来！这个贝利亚我信不过！”当然这在当时是极其偶然的一次，但斯大林从来不会对任何人绝对放心，即使这些人对他唯唯诺诺、百依百顺。

赫鲁晓夫写道：“战后，贝利亚成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为贝利亚权势的增长开始感到忧虑。更有甚者，斯大林开始害怕贝利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恐惧的根源，可是后来当贝利亚的那套把人搞掉的整个机器彼揭露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明白了。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具体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么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

据说有一次，贝利亚把一份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呈报中央审批时，斯大林挖苦地问道：“他们都是党员吗？”这使贝利亚感到不安。

赫鲁晓夫对格鲁吉亚案件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斯大林在害怕贝利亚，这一感觉在斯大林编造明格列尔案件时，得到了证实。我绝对肯定，谋反的罪名是为了整掉贝利亚而虚构出来的，贝利亚是一个明格列尔人”。

斯大林甚至赶走了在他周围身边服务的所有格鲁吉亚工勤人员，换上了俄罗斯人，“斯大林大概相信他已经切断了贝利亚通过自己身边的侍从伸向他的厨房的手。但是，斯大林确实变得年迈糊涂了，他不知道贝利亚仍然是多么的有力量。”

贝利亚的骄横日益增长，没有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决定下来，事先没有得到贝利亚的支持，你甚至不能向斯大林报告，贝利亚一直在加强着他的势

---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48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49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49页。

力。正是贝利亚向马林科夫伸出了援助的手，使他重返莫斯科。斯大林常常在吃饭时开玩笑，叫他们“那两个捣蛋鬼”。

在斯大林的晚年，贝利亚常常表现出对斯大林的不尊敬，而且越来越露骨。当然，这一般是在背后，当着斯大林的面他还是毕恭毕敬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两个最重要的亲信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伏拉西克也开始失宠，并被捕入狱。波斯克列贝舍夫几乎一直是斯大林的第二个“我”，他负责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这是直属斯大林的情报系统，它负责斯大林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组织工作，就是说，党政领导人，特别是政治局委员的所有服务人员都由特别部委派，这不由他们自己挑选。同时在全国各地还有其下属的特别部。波斯克列贝舍夫因此掌握了巨大权力，即使政治局委员也都害怕他。这个“特别部，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机关，它最终使斯大林能够凌驾于党和政治局之上，并对每一个人进行控制。

伏拉西克则负责斯大林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从1919年起就在斯大林身边，最早是担任警卫的一名红军战士，之后则成了幕后权威人物，他领导斯大林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因此也拥有了巨大权力。

这两个人对斯大林绝对忠诚，任何人想利用他们反对斯大林是办不到的。由于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同娶了一对亲姐妹，当1937年逮捕他的妻子时，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

斯维特兰娜写道：“在最后的时日，甚至连父亲最亲信的人都已经失宠了，1952年冬季，一直忠于他的优拉西克被投进了监狱，那时为父亲工作二十年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被革职了。”

斯大林撤掉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是因为他泄露了某种机密材料，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他泄露了斯大林的经济学手稿，他被逮捕。

这两个人的撤职和逮捕，极可能是贝利亚为了控制斯大林以自保为由而采取的阴谋，这两个关键岗位换上了两个新人。

贝利亚也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格鲁吉亚案件”后，贝利亚担心斯大林给他安排好了与亚哥达、叶若夫相同的命运。

1952年10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是自1939年党的十八大之后十三年又召开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非常奇怪的是，大会由莫洛托夫致开幕词，伏罗希洛夫致闭幕词，而由马林科夫作政治报告。自1924年以来，这种报告一直是由斯大林自己作的，这看来清楚地表明马林科夫要做接班人。赫鲁晓夫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也是他的一个重大荣誉。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辞掉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他是因为年老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会议还有两项决议，一是把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一是中央政治局改为主席团，组成了一个二十五人的庞大主席团，又从中设立了一个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由九人组成：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没有包括在内。从这九人中又形成了有五名成员的核心：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斯。斯大林去世前，又发生了一起“医生谋杀案”。一个叫季马舒克的女医生给斯大林写了封信，她断言，日丹诺夫之死是因为有关医生们故意对他使用了不正当的治疗方法，而非自然死亡。这样就逮捕了一大批医生，这些医生都是克里姆林宫医院里给政治局委员、政府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看病的医生。科涅夫元帅也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

林，声称他也受到了据认为是毒死了日丹诺夫的同样药物的毒害。因此这些医生们被指控用药物毒害了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想毒害伏罗希洛夫、戈瓦洛夫、科涅夫元帅、什捷缅科将军和海军上将列夫琴科。这些医生们受到了审判。斯大林曾对国家保安部长伊格纳捷夫说：“如果弄不到医生的招供，就要搬掉你的脑袋。”

这些医生们在斯大林去世后被释放，后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死后，我们研究了这一案件，发现从头到脚都是假的。”

这一案件可能是为了要进行一场新的清洗而主要是针对贝利亚的，还可能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场反对“人民敌人”的运动就要展开。

赫鲁晓夫写道：“在他死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我们通常总是一起去会见斯大林的——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我。布尔加宁并不每次都参加核心圈子的晚餐会。斯大林在智力上和体力上的衰退一年比一年更为明显起来。特别显著的是他的智力和记忆力的丧失。当他健康和神志清醒时，他仍旧是一个坚强的领导，可是他衰老得很快。我想起有一次，他转向布尔加宁，可是想不起他的名字。斯大林凝视着他，说：‘是你么，你叫什么名字？’‘布尔加宁’。‘当然啦，布尔加宁！那就是我正要说的话’，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斯大林就很感气馁，他不希望别人注意它。可是这些记忆力的岔子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这种事情常常把他弄得几乎要发疯。”

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晚上，斯大林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一起在近郊别墅，象往常一样，晚餐一直吃到早晨五、六点钟，斯大林兴致很高，看不出他身体上有丝毫患病的迹象。

第二天，警卫人员发现斯大林没有起床，他夜里突然中风，已失去知觉，不省人事。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都赶到近郊别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是在3月2日被人叫去的。

赫鲁晓夫和斯维特兰娜都写到了当时贝利亚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行为。

赫鲁晓夫写道：“斯大林一发病，贝利亚就在旁边兜来兜去，对斯大林口吐怨言，还嘲弄他。听之简直不堪入耳。可是，也很有趣，一等到斯大林脸上显出一些恢复知觉的迹象并使我们认为他可能清醒时，贝利亚就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吻起来。当斯大林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这就是贝利亚的真面目。”

斯维特兰娜写道：“只有一个人行为举止几乎有失体统，那就是贝利亚。他激动万分，他那张本来就使人厌恶的脸，此刻因强烈膨胀起来的欲望而变得歪扭不堪。他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图虚荣，残暴，狡猾，他需要权力、权力……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脸上。他走近病榻，久久地注视着病人的脸。我父亲有时睁开眼睛，但显然处于没有知觉或半知觉的状态。这时贝利亚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父亲知觉模糊的眼睛，此时此刻，他还想表示他是‘最可靠的，最忠心的，’一如他曾经不遗余力地使父亲相信的那样。”

“现在，他内心的一切毒恶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再也无法抑制他自己了。不只我一个人，很多人都理解这一情景，然而他们怕他怕得要死。他们知道在我父亲弥留之际，在俄罗斯再没有人比这个可怕的人握有更大的权力和力

---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9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8—9页。

量”。

斯大林死得很困难，很可怕。“最后一分钟，他忽然睁开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十分可怕，显示出好象是疯狂，也许是愤怒和充满对死亡以及俯身在脸前的医生的陌生面孔的恐惧。有一瞬间，这一目光扫过了每一个人。然后一种无法理解的和可怕的情景出现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但也不能忘记，他突然举起右手，好象指向上空某处，也好象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手势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充满着威胁，没有人说得他指的是什么和指向谁...

...紧接最后一次挣扎之后，那灵魂终于挣脱了肉体。”

斯大林就这样去世了，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一个伟大历史人物就这样去世了。他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列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时代，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斯大林时代，也留下了一种千百万人长久思考的现象——斯大林现象。

斯大林的去世也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1976年，一个从苏联流亡西方的学者，被西方誉为“克里姆林官学家”的阿夫托尔哈诺夫在德国出版了一本轰动世界的书——《斯大林死之谜》，他提出了“斯大林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杀”的观点，引起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他认为，贝利亚是谋害斯大林的主谋，此外还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正是这“四人团”加速了斯大林的死亡。

关于斯大林被谋杀一说，并非始于阿夫托尔哈诺夫。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在格鲁吉亚一些最虔诚的崇拜者中间就开始广泛流传斯大林是被谋杀的说法。在斯大林卫队或“服务处”工作的人员中也有这一说法。

坚持斯大林是被谋杀的，还有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根据斯维特兰娜的说法：“1953年3月2日，瓦西里也被叫到父亲身边，他也在那挤满了人群的大厅里坐了几个小时……又喝酒、又大闹，破口大骂医生，大喊有人‘杀害了父亲’或‘正在杀害父亲’。”“父亲之死使他极为震动，他怕得要命，因为他确信父亲是给‘毒死’或‘杀害’的”。但他妹妹说，他已经是个病人，他得了酒精中毒症。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斯大林到底是如何去世的？有没有人加速了他的死亡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他的死亡？

我们从上边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一系列事实，可以从逻辑上作出推断：贝利亚是希望斯大林死去的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赫鲁晓夫也证实：“斯大林一去世，贝利亚就容光焕发”。贝利亚确实认为他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控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去路。现在他可以所欲为了。”

贝利亚筹划了一系列的阴谋，来达到自己掌握权力的目的。列宁格勒案件已基本证明是他搞起来的，其他的案件也大都有他的插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在罗织各种各样肮脏的无耻的事件中，我们党的死敌，外国

---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9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2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30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32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64—465页。



间谍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到了极其卑鄙的作用。现已查明，这个恶棍是以数不清的尸体作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阶梯的。”

斯大林生前对贝利亚的不信任逐渐加深，格鲁吉亚案件和后来的医生谋杀案基本上可以说就是针对贝利亚的，这使贝利亚感到自己命运的危险。“贝利亚知道得很清楚，他的性命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而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和伏拉斯克将军的被捕恐怕就是贝利亚阴谋策划的结果，贝利亚在斯大林周围安排了许多自己的亲信，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他对斯大林的反击。

这中间有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有意除掉贝利亚，为什么要打草惊蛇呢？是他无力除掉贝利亚，就象后来赫鲁晓夫对付贝利亚的那样？还是他还需要贝利亚？或者是他根本没有打算除掉贝利亚，只是为了警告他一下呢？这些问题都还无法回答。

贝利亚是斯大林去世前最接近斯大林的四个人中的一个，特别是他直接负责内务部，他比另外三个人更接近斯大林，他是有条件按照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那样去采取行动的。

那么，是否是贝利亚筹划了谋害斯大林的阴谋呢？或者是他在斯大林发病后延缓治疗甚至采取了有害的治疗呢？这些还都不能得到有力的说明。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伊·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续篇》中认为“斯大林非自然死亡”的说法不足为信，没有理由认为当时的医学报告是不真实的。

我们认为，斯大林非自然死亡，贝利亚参与了这一过程，这一点从逻辑上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说明，但是还没有足够可靠的事实证据。因此我们就无法不相信斯大林因患脑溢血去世的说法。同时，斯大林因病去世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只是在于斯大林病前和病后的过程中有无其他非法的活动。这就要由历史学家等待发掘新的历史材料再下结论了。

无论如何，斯大林的去世结束了一个时代。正象斯大林 1937 年说的一句话：“领袖来而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我们说：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也将是不朽的。

---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792 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耶《仅仅一年》第 343 页。

#### 十四、斯大林的家庭和亲属

斯大林度过了他 73 年翻天覆地、惊涛骇浪、矛盾复杂、伟大不凡的一生，他从一个格鲁吉亚贫穷鞋匠的儿子，成为苏联这个伟大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并把世界历史打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他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也影响到了世界的命运。

凡是他所经历和接触到的一切，无不深受他的影响，他的家庭和亲属也被他巨大的光环所笼罩，当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处在他的阴影之下。由于他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一个悲壮崇高的时代里，是很少有什么喜剧的，更多的是悲剧。他的家庭和亲属更多地是以悲剧结束的。

恐怕可以说，只有他的母亲是受他影响最少的人，她因此有一个自然的命运。她一生都非常虔诚地信仰上帝，她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神父，而没有能达到这一点是她深深的遗憾，她看不起儿子取得的非凡成就，她一生都是在格鲁吉亚度过的，不愿意到莫斯科过克里姆林宫里的生活，这里对她来说仿佛是一个无法生存的世界。

自从他溺爱的儿子 15 岁离开家到第比利斯神学校上学她们母子俩就很少见面。在以后的五年里，她的约瑟夫每次回家看她的时间都很短。以后他实际上离开了她的生活，她虽然经常收到他的信，但他们已属于不同的世界。她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妇女，她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这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的原则，经历了严峻的、艰难的、诚实的一生的原则。她没有什么嗜好，无视任何人间的荣华富贵，对于自己清贫简朴的生活却有一种难分难舍的依恋之情。1934 年，当她的孙儿孙女们去第比利斯看望她时，她住在一座老式住宅的一间阴暗、矮小的房间里。曾给她安排了豪华舒适的住处，但她还是自己选择了这个地方。屋里有一张很窄的难看的铁床，窗台上放着一捆一捆的草药，她感动地用她那干瘦的骨节粗大的双手依次拥抱和亲吻她的孙儿孙女们，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她的这种生活使她的孙儿女们深感惊异，无法理解。她的三个孙儿女中只有一个懂格鲁吉亚语，他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她的儿子远在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宫这个过去属于沙皇的宫殿里。她不时把自己亲手做的核桃酱寄给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她还给儿子寄了一床用高加索轻软的羊毛制成的羊毛毯，也是她亲手做的。她的儿子也不时从莫斯科给母亲寄些东西。这是相距遥远的母子俩交流感情的唯一方式。她接着自己的生活原则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到 1936 年去世，她活了 80 岁。

她一生都对儿子的崇高地位无动于衷，她既不羡慕，也无自豪，对她来说，一切都是生活，在上帝面前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假若她知道她的约瑟夫被当做一个伟大国家的父亲而加以崇拜，当她知道她一家在哥里住过的小茅屋被笼罩在贵重的大理石的亭子下面，象圣物一样加以保护，当她知道有一个伟大作家肖洛霍夫献给她自己一篇伟大的颂辞，不知道她会作何感想？

斯大林一生都深深挚爱他的母亲，尊敬她的做人原则。他的性格和生活也深受他母亲的影响，他象他母亲一样，坚定顽强、严以律己，不向困难屈服，生活简朴，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他经常向他女儿介绍母亲的一生，回忆童年的生活。

斯大林的女儿写道：“他说祖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他指的是她的精神品德，不是指的她所受的教育，因为祖母只能马马虎虎写她自己的名字。父亲有时讲给我听他小的时候，祖母是怎样打他，他那爱喝酒的父亲又如何

用掌揍他。大概她的性格坚强而严厉，这使父亲十分钦佩。她年轻守寡，变得更加严肃。她有过许多孩子，但都已早丧，只活下来父亲一个人。”

“他曾经爱慕过的或喜爱过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和他母亲有关联的。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母亲同名，也叫叶卡捷林娜，他母亲看中了这位美貌安详的妇女，由于她的坚持，两个人是在教堂结的婚。”

斯大林爱他的女儿，他总是说：“你真象我妈，真可笑！她也是红头发，一脸雀斑！”

对于母亲的感情深深地留在了他的心中，这是他不幸的童年生活中仅有的感情慰藉。然而，他在心灵上和地理上与她相距是如此遥远，他不会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孝心和感情，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只好将这份感情深埋在自己的心中。

斯大林和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雅可夫。雅可夫两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他是他的姨妈教养大的，当他已长成一个少年的时候，才来到莫斯科。他比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继母娜佳，只小七岁，然而娜佳对他很体贴，他们的关系很亲密。斯大林不满意他来莫斯科，也不满意他的学习和性格，对他很严厉，这使他很苦恼。

雅可夫是个性格非常平和的人，为人温顺，沉默寡言，有些慢吞吞的，十分安静，但是内心刚毅，有坚强的信念。他更多的象他的母亲。他没有野心，不爱权势，谦虚朴实。踏实肯干。

雅可夫由于和父亲的关系很别扭，生活很困难，他的第一次婚姻又不顺利，他在父亲身旁总感到自己好象一个继子，父亲的粗暴使他难以忍受，他曾经绝望地开枪自杀。后来他去了列宁格勒，在一个热力电力中心工作，成了一个电气工程师。

1935年他按照父亲的意愿进了莫斯科炮兵军事学院，希望做个军人。他离婚后，又和一位被丈夫遗弃的长得很好看的女人尤莉娅结了婚，这个妻子是个犹太人，这使斯大林很讨厌。但雅可夫有自己的见解，他热爱自己的妻子。

1941年，战争开始时雅可夫33岁，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就上前线去了，他们的部队开赴战斗最激烈的西部战线。他没有企图利用那怕是最微小的可能性去逃避危险，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有其他选择。不久，他就受伤被俘，被关进了德国的集中营。

当时，斯大林对被俘的人员是非常严厉的，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怀疑雅可夫的被俘与他妻子有关，有可能是尤莉娅出卖了他。于是尤莉娅就在1941年秋天被捕，一直到1943年春天，事实证明她是无罪的。

1941年秋天，德国人在莫斯科撒了许多传单，上面印着雅可夫的照片。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斯大林认为自己的儿子给他丢人现眼，当外国记者正式向他问这件事时，他回答说：“希特勒的俘虏营里没有俄国俘虏，只有俄国叛徒，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收拾他们。”问到雅可夫时他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叫雅可夫的儿子。”

当德国人提出要用雅可夫交换他们的人时，斯大林拒绝了：“我不和他們做交易。不，战争就是战争！”

雅可夫没有辱没他军人的尊严，他拒绝了敌人的一切阴谋，遭受了残酷

的虐待，最后死在了集中营里。

雅可夫的一生是真诚的和正派的，他勇于献身，从不追求任何特权，任何人提到他是什么人的儿子，他都非常厌恶。他一生真诚地拒绝任何由于他的家庭关系而可以得到的特权。他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

雅可夫牺牲后，斯大林很难过，觉得以前对儿子太不公平了，尽力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并同维斯特兰娜多次谈到雅可夫的死，但他也不同意一些人极力想把雅可夫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

当 1932 年斯大林的妻子娜佳自杀的时候，她的儿子瓦西里只有 11 岁，女儿斯维特兰娜只有 6 岁。娜佳的死，使斯大林悲愤欲绝，他不能再住在祖巴洛沃，在孔策沃又建了一处别墅。以前的家庭生活为之解体。

娜佳在世时，一家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充满着欢乐的气氛。家里总是有许多客人，经常也举行一些有意义的晚会，大家跳舞、唱歌，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都唱得特别好。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甚至常住在家里。娜佳还自己管理家务，领到各种供应券、口粮和实物。根本不需要服务人员，后来请来了一个女管家安排生活。亲友们常来常往，娜佳的父母亲住在楼下，雅可夫的舅舅斯瓦尼泽，姨妈莎什科和玛丽娅，娜佳的两个哥哥费加和巴维尔，姐姐安娜和其丈夫雷登斯等都经常到家里来，组成一个友好欢乐的大家庭。

娜佳死后，这一切都在改变，虽然亲友们还都经常来看望斯大林，但以前的家庭气氛却没有了。娜佳的死，使斯大林心灵上经受了巨大的打击，他好象有意开始和亲属们疏远。到后来，家庭完全公家化了，从厨师、值班清扫人员到服务人员、警卫人员全都是由专门的干部处派来的，这些人都成了保安人员，由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甚至儿女的家庭教师也是专门派来的人员，外出上学或上街，也都由人专门跟随。这一制度的建立，已使正常的家庭生活面目全非了。

娜佳死后，斯大林尽他的一切可能努力做一个好父亲，经常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和学习情况，在孩子们的成绩单上签字。一般来说，他对儿子瓦西里很严厉，瓦西里经常惹事主非，学习成绩不好，这使他气得要命，经常训斥他。他对女儿斯维特兰娜则倾注了全部的爱，他对她温存体贴。

孔策沃别墅是个二层楼房，斯大林一直住在一楼，他只住一间房子，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间房子里。他在沙发上睡觉，到晚上就在沙发上给他铺好卧具。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工作必需的几架电话。屋里有一张大餐桌，上面堆满文件、报纸和书籍。没有外人时，他就在这张桌子的一头吃饭。房里还有一个酒柜，放着餐具，有一格放着药品。房间里铺着一条又大又柔软的地毯，有一个壁炉，这就是斯大林仅有的奢侈品和舒适的享受。

斯大林几乎每天都和政治局他的同事们一起吃晚餐。当他深夜离开时，常常到小女儿的房中，吻吻已经睡着了的的女儿，他对女儿的感情是深厚的。这是否是因为对失去母爱的女儿的补偿呢？

在战前的那些年，斯大林每次外出到索契度假，总要给女儿写信，这些信充满了父爱。

从斯维特兰娜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父女之情：

亲爱的斯坦卡：

你九月二十五日的信收到。谢谢你没有忘记你的好爸爸。我过得不坏，

身体健康，你不在，我很想念你。你收到石榴和桃子了吗？如果再给我一个命令，我就再带给你一些。告诉瓦夏叫他给我写信。好，再见。热烈地吻你。你的好爸爸。

（1934年9月8日）

你好，小主人！

捎给你一些石榴、桔子和蜜饯水果。吃吧，高高兴兴地吃吧，我的小主人！不给瓦夏带什么，因为他学习得一直很坏，而且只对我空口许愿。你讲给瓦夏听，说我不信他的空口许愿，等他用实际行动证明，那怕是学习分数得“良”，我才能信任他。小主人同志！向你汇报：我到第比利斯去了一天，住在我妈妈家，并替你和瓦夏向她问好。她还算健康，她热烈地亲你和瓦夏。好，就写到这里。亲

你。很快会见面了。

（1935年10月18日）

斯大林在信上的签署都是一样的：“小主人斯坦卡的好秘书可怜的约·斯大林”。这是父女之间的一种游戏。斯大林总是要小女儿给好秘书不断写新的“命令”，小女儿厌烦了，有一次干脆写道：“命令你允许我每六天写一次命令”。这是1937年小女儿11岁的时候。

最后一封这种游戏的信是1941年5月战争前夕女儿写给父亲的：

我亲爱的好秘书：我忙于通知你，你的女主人写的作文得了“优”。可以说第一场考试已通过，明天通过第二场考试。请为你的健康尽兴吃吧！喝吧！将亲我的好爸爸一千次。问候其他秘书。

女主人

然而，随着战争的到来，斯维特兰娜童年时代的结束，父女之间也开始疏远。1942年，当斯维特兰娜16岁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知道她母亲不是死于急病，而是自杀身亡，这对她幼小的心灵是一次痛苦的打击，她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大清洗时家庭的巨大变故，更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对斯维特兰娜来说，母亲的自杀，只是她周围亲属不幸命运的一个开端，其他人的命运也都很悲惨。

她的舅舅，娜佳的哥哥巴维尔，长相和娜佳非常相似，他个子高高的，人瘦，腿长，有着一双忧郁的但又极其温柔而善良的棕色的眼睛，他性格温和，待人随和，他是一个军人。后来他作为军事代表被派往德国，公开身份是商务参赞。娜佳和她哥哥的关系非常好，他总是从德国给娜佳买各种东西：衣服、香水、日用品等。还给她带回了一个精巧的小手枪。妹妹的死使他深为震动。他从德国回来后，在国防部装甲兵局工作，他是装甲兵的创始人和组织者。1938年，当雅可夫的舅舅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和妻子，他的姐姐安娜的丈夫雷登都已被捕后，巴维尔不止一次地找过斯大林，他还坚持要保那些军队里被捕的熟人，但都毫无结果。后来，当他休假回到装甲兵局工作时，已经找不到和他一起共事的人了，他们都被清洗……这使他紧张不安的神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的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办公室里。

雅可夫的舅舅亚历山大·斯瓦尼泽，是格鲁吉亚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曾留学西方，知识渊博，他是一个美男子，身材结实，一头金发，蓝眼睛，风度翩翩。他是格鲁吉亚第一任财政人民委员，他娶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妻子，一个著名的歌剧演员，这一对漂亮的夫妻同娜佳一家人的关系很好，经常到

斯大林家里。斯瓦尼泽后来在莫斯科任外贸银行行长，经常到国外出差。娜佳死后，他还一如既往去看望斯大林和他的孩子们，斯维特兰娜很喜欢这个舅舅。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在1938年被作为“人民敌人”而逮捕，但他是个坚强的人，拒不认罪，也不请求宽恕，1942年2月他被枪决。当他的妻子玛丽娅得到丈夫被判处死刑的通知时，马上因心脏破裂而死亡。这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毁灭了。斯大林去世后，他才被平反。

娜佳的姐姐安娜为人善良，对人热心，不拘小节，娜佳讨厌她那过份直率的性格和不修边幅的作风，但她们姐妹的关系也很好。斯大林恨她那基督教的原谅一切的精神，称她为“无原则的愚蠢的人”，说“她的善良比卑鄙下流都坏”。她的丈夫雷登斯曾在格鲁吉亚契卡工作，他和贝利亚在一起，两人谁也不喜欢谁，后来雷登斯到莫斯科契卡工作。1938年大清洗中，他想办法见斯大林，力保他的同志们，并和斯大林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不能容忍别人干涉自己对某人的评价，这样，雷登斯取得的唯一成果，就是他自己完全丧失了和斯大林接触的机会，也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他不久就被捕，并被处决。

这接连不断的死亡，对维斯特兰娜的外祖父母是一连串的精神打击。谢尔盖，这个老革命者开始变得非常孤僻，沉默寡言，他结实的身体逐渐多病，他们夫妻在斯大林家里感到很拘束，虽然他们和女婿彼此很尊重，然而，他却从来不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他生有一身傲骨，有自己的自尊心，从来不向任何人恳求什么，因此对于女儿，儿子和女婿的死，只好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痛苦。

到1948年，开始了新的逮捕浪潮，娜佳的姐姐安娜和巴维尔的妻子这两个寡妇也被逮捕。当斯维特兰娜问她父亲姨妈和舅妈犯了什么罪时，斯大林说：“她们太喜欢说，她们知道的事情太多，说的也太多，这对敌人有好处”。他已经失去了对周围人的信任。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被判十年单独监禁。她们被关了六年，1954年，斯大林逝世后被释放。她们俩人都把一家人的灾祸归罪于贝利亚。安娜出狱后，对一切事都很冷漠，连亲生的儿子都不认识，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她得了精神病。后来，当她病情好转后，她还是以她原谅一切的精神说：“现在把一切全推在斯大林的身上了，斯大林的事是很复杂的，我们知道他，他本人流放过多少次，也不应忘掉他的功劳”。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在父亲周围，好象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是落入这圈子内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在生活中消失了。”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1939年，他18岁时进入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1941年，他20岁时就成为一个空军少校，他周围的人都在这个年轻的首长面前卑躬屈膝，巧言令色，这帮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没有一个和他平起平坐的朋友。战争结束时，他已是一位24岁的中将，人们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提拔上去，根本不考虑他的能力、才华和缺点，只想如何去取得斯大林的欢心。1947年，他从东德回到莫斯科，马上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

瓦西里是一个热情好客、性格开朗的人，他作风粗犷，好喝酒，勇敢无

畏，讨好女人，他也善良，忠于朋友。然而他的“皇太子”地位和周围人的巴结讨好把他毁了，他住在大别墅里，猎狗成群，骏马满厩，他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一些握有权力的要人不断给他军衔、勋章、享乐。

可是他已经酒精中毒，斯大林无情地骂他，当着别人的面，象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叫他下不来台，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1952年，“五一”节莫斯科举行阅兵式，当时天气恶劣，可是瓦西里还是下令让飞机飞过红场，结果有几架飞机坠毁。斯大林非常恼火，亲自下令撤销了他的空军司令职务。

斯大林让他进总参学院学习，对他说：“我已经70岁了，还在学习！”但是，他已经不能学习了，酒精中毒使他沉缅在酒中。

父亲之死，使他非常害怕，他确信父亲是给毒死的，他责怪所有的人，到处大闹。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把他叫去，建议他去指挥某一个军区，他断然拒绝了，非在莫斯科不行！布尔加宁非常生气：“丢掉他的肩章”。他离开了军队，成为一个退伍的将军。他妻子这时也离开了他，他成了孤苦的一个，一个无人需要的酒鬼。

1953年4月28日 he 被捕，他的罪名很多：营私舞弊，挥霍公款，滥用职权，还有在上层搞阴谋致人死亡。现在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辩护，相反，都出来作证，控告他的罪行。他被军事委员会判处十一年狱中监禁。

他的妹妹斯维特兰娜到伏拉基米尔监狱去探望他，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前，墙上仍然挂着斯大林的大幅肖像。典狱长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百思不得其解。

1960年，赫鲁晓夫亲自接待了他，建议他到外地随便什么地方去，改换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姓名，另外还要求他不要去格鲁吉亚。他被放了出来，他的将军军衔、党籍、退休金、汽车都恢复了，还发还了他的全部战功勋章。然而，到处都有一些人围着他转，许多格鲁吉亚人都热烈欢迎他，他又开始大闹起来。

他又重新去服刑，但他整个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肝脏有病，胃溃疡。1961年又被释放。

1962年3月19日，他在喀山同许多格鲁吉亚人大喝了一顿酒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他仅仅活了41岁。

在喀山墓地里，至今还保留着瓦西里将军的坟墓。

作为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命运更是曲折复杂的。她周围人的命运都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她生活的环境也给她带来许多不正常的刺激，这就决定了她后来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斯维特兰娜在她孤寂的生活中，遇到了一个中年剧作家卡甫列尔，单纯的少女迷上了这个很容易引起女孩好感的作家，两个人经常约会，谈文学，谈艺术，写情书，这自然瞒不过跟随斯维特兰娜的保安人员的眼睛。这个卡甫列尔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同斯大林的女儿来往？正值大战期间，他有什么目的？

卡甫列尔竟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地报告，是写给他的情人的，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写给谁的。

一天早晨，斯大林突然回到家里，怒不可遏，对女儿吼道：“你的作家的信都在哪里？你干的好事，现在仗打得这样，可是你却干得出……！你的卡甫列尔是个英国间谍，他已经被捕了！”

“可是我爱他！”斯维特兰娜争辩着。“你爱！”斯大林大喊了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她两个耳光。

卡甫列尔是个犹太人，这更使他愤怒。

卡甫列尔被捕，并被流放，直到1953年7月才被释放。

父女关系开始破裂了。

1943年，斯维特兰娜中学毕业后，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这是听从她父亲的劝告。1944年，斯维特兰娜和她的一个中学同学结了婚，她的丈夫是个犹太人，这使斯大林很不高兴。后来到1947年夏天，他们由于个人原因而分手，他们有一个儿子。

斯大林由于战争紧张，和女儿很少见面。1949年春天，女儿按着父亲的意愿，和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结婚。斯大林在晚年越来越感到孤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想念娜佳，他还在极力寻找她出事的原因。他经常和女儿谈到她母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和餐厅里都挂着娜佳的巨幅照片，他怀念她。

1950年，斯维特兰娜生了一个女儿，她在医院的病床上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这是她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你好！小斯维特兰娜！

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你总算平安地过来了。肾脏是开不得玩笑的。又加上分娩……你说我丢下你不管了，你是从哪里想出这些来的？做梦才能看见这些东西……

我劝你不要相信梦。珍重万千，好好照看你的小女儿，国家需要人，早产婴儿也不例外。再稍等一等，我们就会见面了。吻我的小斯维特兰娜。

你的好爸爸（1950年5月10日）这是一个71岁的老人写给女儿的信，他的女儿不知道，作为父亲，也同样孤独，需要女儿的感情。

斯大林生前没有任何积蓄，世界各地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礼物，他都指示交给了博物馆，他不明白自己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他每月的工资都装在一个袋子里，放在他的桌子上，他自己从来不花钱，他的一切都是国家包了的。最后几年，他常常给女儿一些钱，并且说：“这是给雅沙的女儿的”。他要求她自己独立生活。他有一次竟然说：“你还是过寄生虫生活，一切享受现成的吗？”

父女两个之间很难理解，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性格、经历和目标。斯维特兰娜是在她特定的环境长大的，她的经历、周围人的命运无疑都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她有她自己对问题的认识。

1953年，父亲的死，使她深感悲痛。然而她也知道，父亲的死，结束了一个时代。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有一天，米高扬派车把斯维特兰娜接去，给她拿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她说：

“看看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讨论一下。别着急，好好想一想。我们在楼下等你吃晚饭。”她在他的图书室里一连耽了几个小时，终于走进餐厅。米高扬夫妻俩都以极其不安的心情看着她。“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象是真的。”斯维特兰娜痛苦地说道。

1962年，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俄国东正教教堂接受了洗礼，皈依宗教。她对一切都不再相信，开始从宗教中寻找人生寄托和感情慰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复，她又回到了她祖母的出发点，投入了宗教的怀抱！

1964年，她在莫斯科同一个印度共产党员布拉杰什·辛格结婚，当时辛格已是一个57岁的病人，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有点弓背，带着眼镜，肤



色黝黑。他是一个富有的印度王公的儿子，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熟谙世事，博学多识，举止温文尔雅，特别是他真诚善良，宽厚容忍，他主张用善改造世界。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1966年10月辛格就病故于莫斯科。

1967年，斯维特兰娜护送辛格的骨灰回印度。这一去，她没有再回苏联，她从印度叛逃到美国，并在美国定居。她放弃了自己的国家，也别离了自己的儿女，最后成为美国公民。

到美国后，她发表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两本书，她把她父亲说成是一个邪恶的人，控诉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一时风靡世界，影响很大。

1967年6月25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联合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阿利卢耶娃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她有病，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

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想到斯维特兰娜，就使我眼中淌出了泪水。她的结局使我悲伤。从她的一生刚刚开始时起，她的命运就是十分复杂的，她的境遇从来不是顺利的。这些固然都不成为其为饶恕她已经干下的事的理由，但当我想起她的时候，它仍然使我悲伤甚于愤怒。”

斯维特兰娜，这个最受斯大林宠爱的女儿，最后以她自己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她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她也是一个有缺点的女儿，她和她母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易动感情，浪漫而不切实际，没有经历过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磨炼，缺乏生活的根基，在那样狭小的上层圈子中生活，就象一颗浮萍一样漂忽不定，难以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她的性格与政治格格不入，而她又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政治的旋涡之中，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

## 十五、斯大林的情爱之谜

对于一个一生都致力于激烈的政治斗争、高居于圣坛之上的铁腕人物，他的个人情感生活又如何呢？斯大林在世时，到处是对他的颂扬崇拜之辞，他被描绘成人间的上帝，全知全能，扑倒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只能顶礼膜拜，不敢有任何非议。斯大林隐藏在铁幕之后，人们只能在莫斯科红场成千上万高呼万岁的人潮中远远地看到站在列宁墓上的一个庄严神圣的人影。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斯大林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国家和人民操劳和工作，他的生活只能是政治生活，是同千百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有关斯大林的众多著作，除了提到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和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之外，几乎都没有提到他同其他女人的情爱关系。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他的父亲对女人不感兴趣，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政治斗争上。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不乏向他献媚邀宠的风流漂亮的女人，但他向来对这些卖弄风骚的女人极端反感。作为女儿，斯维特兰娜当然了解父亲的脾气性情，应该说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斯大林的生活对任何人，包括对他最亲近和周围身边的人都有更大隐秘的一面。

曾居留苏联 14 年之久的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其所著的《斯大林的生与死》一书中写道：“从社会方面讲，由于关于斯大林神话的泛滥成灾，即使有这方面的传闻，大多数人也会把它作为恶毒中伤的谣言而不予置信，以至于现在，关于斯大林私生活的传闻，也仍是寥寥无几。”

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包括如斯大林这样的世界名人，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一点。因此，对于写斯大林的情爱之谜，我们踌躇再三，难以下笔。我们无意于损害历史人物的形象，也不想哗众取宠。只是我们觉得，一切过去的都成为历史，任何人都应该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一个人的情爱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刻地暴露一个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重要方面，它构成人性的不可缺少的一面。更何况作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斯大林，他的情爱生活毕竟与众不同，充满着不解之谜。

据说，斯大林在被流放到严寒荒凉的西伯利亚期间，在漫长难耐的孤独和寂寞生活中，曾遇到一个朴实善良的当地妇女，并与她同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当斯大林已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之后，这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但他没有到莫斯科来找过这个难以确定的父亲。显然，他配不上斯大林这个显赫的姓氏。斯大林的女儿斯特兰娜后来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对此将信将疑，因为仅仅是传说而已。

1932 年 12 月 8 日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就是娜佳自杀之后，斯大林在他后来的二十来年生活中是否有过结婚的考虑？要知道，娜佳去世的时候，斯大林正是 53 岁。他在孤寂的生活中本是需要一点感情慰藉的。但由于妻子的自杀使他深受震动，他认为妻子是作为背叛他的敌人而离开他的，所以他没到新处女墓地去看一次妻子的坟，婚姻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已经不愿再为婚姻而约束自己了，更何况他还要负起教育两个子女的责任，他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斯大林卑微的出身、苦难的童年、作为鞋匠而好酗酒难得对儿子慈爱的父亲，都没有给予他多少人间温情。长期动荡危险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使他

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特别是他七次被捕、五次流放，在他 22 岁到 37 岁这段时期，他在沙皇的监狱和边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度过了长达八年零五个半月的犯人生涯。这一切不能不说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性格心理，他的粗暴、冷酷无情都与此有关。对于斯大林这样一个本来就感情冷漠、好抑制自己的人来说，长期的流放生活无疑对他本来就孤独乖戾的性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坚强的意志力、不屈不挠的精神也都来源于苦难生活的磨炼。

对于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他有没有和普通人一样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对爱的追求和情恋生活的渴望？

列昂纳德·根德林所著的《克林姆林宫秘史——斯大林情妇的回忆》一中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个疑团。在这本回忆录中，莫斯科大剧院著名歌剧演员、国色天姿的达维多娃回忆了她伴随斯大林度过二十个春秋，彼此恩恩怨怨的生活，同时也揭露了亚戈达、贝利亚之流达官显贵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卑劣灵魂，描绘了维辛斯基等人卑鄙无耻的丑恶嘴脸，谅解了基洛夫、马林科夫、优罗希洛夫等人对她的爱慕之情，叙述了她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苏军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一段撕心裂肺的感情纠葛。

“我和斯大林姘居了 19 年。我有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共和国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荣获过多枚勋章和奖章，而且三次被授予斯大林奖金。那么为什么我要迈出责任如此重大而又有极大危险的一步呢？为什么要把人们闻所未闻的斯大林的私生活告诉您呢？或许您会认为，我是一个曾被抛弃的、恼羞成怒的情妇，因而下决心对昔日拥有无限权力而今长眠地下的领袖进行报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很清楚，斯大林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我的，他总是急不可待地盼望我的到来。然而，只有现在，当他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敢直言不讳地说，在那 19 年的日日夜夜里，我违心地取悦于他，被迫地玩弄自己的感情。

“我是一名演员！这或许就是我在满腹狐疑的斯大林的心目中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的原因吧！当然，在他的助手当中，还有一个可以同我媲美的人，这就是最忠于他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里列舍夫。

“多年来，我一直被迫地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我不得不在剧院、排练场、音乐会上从事排演活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斯大林热烈而又疯狂的爱抚中消磨时光。

“我之所以讲述这一切，是希望在我死后人们能够认识和了解另一个斯大林——剥去伪装的斯大林”。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出生在诺夫哥罗德，父亲是土地测量员，母亲是人民教师。出生后不久，全家便迁居远东，住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中学毕业后，在合唱团里当了几年教师。1924 年，考上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后到马林歌剧院工作，当时才 23 岁。1932 年早春，达维多娃随团到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坐在政府首脑的包厢里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应该说，这是彻底改变她命运的一次演出，她平生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斯大林。她以美丽动听的歌声演唱的《卡门》获得了极大成功，被邀请到政府的包厢里，介绍给

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达维多娃同志，对待自己的成绩应当不骄不傲，当心！别头脑发热！”斯大林轻声地说，“您想住在莫斯科，在大剧院工作吗？”

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到莫斯科大剧院工作的调令。那时，她已经与歌剧演员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切德利泽一尤日内结了婚，但他们之间却处于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1932年12月底的除夕之夜，达维多娃参加了克里姆林宫的音乐会，并出席了招待宴会。会后，她突然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不知谁写的小纸条：“练马场附近有汽车等您，司机会把您送到该去的地方。请把纸条保存好。”她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上了汽车，被送到了斯大林的住宅，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

一个星期以后，达维多娃领到了三间一套单元的住宅居住证。不久，又有人给她送去了时髦的家具，并安装了电话。“我每走一步都感受到他的关怀，我明白他在找到理想的新欢以前是不会和我断绝来往的。这种前途对我合适吗？我常常扪心自问。斯大林已经54岁了，而我才28岁，年龄相差太大了。然而，我能拒绝他的追求吗？他是时局的主宰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创作上和肉体上宣判我的死刑”。

斯大林就这样爱上了达维多娃，他为她的美貌所倾倒。

“你长得太美了，这使我精神振奋，使我这个高加索人热血沸腾，我已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达维多娃知道斯大林不喜欢袒胸露臂的连衣裙，每次前去都要换上得体的衣服，甚至还特意换上一双矮跟便鞋。

进入斯大林的生活圈子，也就一下子失去了个人自由。她的住宅单元的邻居被迁走，她也被“保护”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开始经常出现在她的周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斯大林的安全。

进入斯大林的生活圈子，而且是作为关系最密切的情人进入斯大林的生活圈子，使她得以最详细地观察斯大林和他周围人的各个方面。参加斯大林的个人宴会，大家比较随便，客人中有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布琼尼、莫洛托夫。“我终于看清了他的长相：矮个子、身材丑陋不堪，瘦骨嶙峋，锁骨突出，躯干窄而短，而两腿和双臂又过长，右臂比左臂长。”“我偶尔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凶狠加上爱记仇，不久又发现他还爱报复和多疑。这些特点是相互补充的”。

有时候，面对达维多娃痛哭时的委屈，斯大林又会表现出难得的温存和体贴：“韦罗奇卡，我真怕你闹脾气，耍威风，我和你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你是女魔法师，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富有魅力的女人！坦白地说，在你之前我只有普通的婆娘，但没有女人。两个人心心相印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我请求你只做我的女人！我一见到你，就心花怒放，见不到你，又撕心裂肺般地思念你！是的，我是一个凶狠、尖刻、执拗的人，看来，这种秉性将来也不会改变的”。

斯大林安排达维多娃一起到索契度假，并特意派人给她在国际车厢安排了单间，三个雅致的手提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应有的东西：毛料女上衣、夏装连衣裙、斗篷、裙子、便鞋、美国的长丝袜、法国的全套内衣，各种各样的香水，还有一套最理想的修指甲的用具。服装的大小尺寸，完全适合她的身材。

她和他徘徊在海滨浴场，或并排躺在温暖的沙滩上。这时候，斯大林会情不自禁地讲起他的经历，倾吐出自己的内心之言：“我的童年很艰苦，父

亲当过裁缝和鞋匠。象革命前俄国的所有手艺人一样，他也有酗酒的恶习。他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和母亲打得半死。9岁那年我被送进哥里教会学校，学习6年以后我被第比利斯东正教教会学校录取。我还没毕业，就被开除了。教会学校当时只接收有钱人家的子弟。我究竟在谁的庇护下才被录取的，这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妈妈希望我将来当神甫”。

达维多娃在同斯大林的相处中，也开始接受着不断的考验，斯大林需要的是服从、安份守己和绝对忠诚。

美丽非凡的达维多娃在斯大林的周围有着许许多多的倾慕者，她不断地周旋在这些上层追求者中间。执掌着千百万人生杀大权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头子亚哥达也以妒忌的心理爱上了她。即将走完他人生末路而成为斯大林的替罪羊的亚哥达苦苦地追求着她，并挑拨她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您为什么委身于那个恶棍、虚伪的格鲁吉亚人、麻子朱加斯维里呢？他是酒鬼的儿子，他身上留有父母的强盗本性的深刻印记。我爱您！我要和妻子离婚，我要离开机关，回去重操我那药剂师的旧业”。这个谁都惧怕的人物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在做着自己的美梦。

作为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也成了达维多娃的追求者。然而，在她的眼中，季诺维也夫长得极不匀称、动作笨拙、身体虚胖，贪图虚荣而又胆小怯懦。他不断地对达维多娃献殷勤，纠缠她，同时发泄着对斯大林的仇恨。“我就爱你这样的女人，高大、丰满，有一双漂亮的腿。对所爱的女人，我是决不会放弃的。宇宙是永存的，但在地球上没有比约瑟夫·朱加斯维里更可怕的恶魔了，我们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他，斯大林，毒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再过一个时代，过十年，如果他不被杀死，他在死前一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暴君。但或迟或早他是不会得好死的，他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诅咒和唾骂……”

而图哈切夫斯基对达维多娃的爱恋则使她激动狂喜，终生难忘。第一次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别墅，他以熟练的技巧演奏了难度极大的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漂亮的相貌、神态端庄的气质和熨得平整的衣着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他们俩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次美好的时光。“在他的怀抱里我既高兴又冲动。他身体的每个线条都使我感到真正的男性美。我同米哈伊尔·尼古拉那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交往所体验到的那种极度快感是无法言喻的。热切向往的那种无限幸福、甜蜜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忘记了生命的存在，忘记了时间和吃喝，好象世界都不复存在了。以后只要回想起他，我就浑身颤抖，热血沸腾，心脏狂跳”。1937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这位苏联元帅、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因“间谍和叛国罪”而被枪毙。他的死使达维多娃悲痛欲绝。

基洛夫生前曾邀请达维多娃到列宁格勒演出，并向她表达了他的爱意，两个人一起跳舞、散步和交谈。基洛夫被暗杀后，达维多娃受到传讯，并被关进肮脏阴暗的牢房，后来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审讯，没有问出任何东西才把她释放。

骑兵元帅布琼尼的追求更是与众不同，他粗人快语，直接了当。新年音乐会后回家的路上，布琼尼的汽车追上了达维多娃，并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韦罗奇卡，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热血沸腾，就象茶壶里的开水一样，血管膨胀，嗓子发干，简直是无法忍受了，特别想尝尝你的味道。我只恳求你，当我床上的老婆，我要干事的时候，你可不能把屁股扭到一边去。我叫

你，你可得乖乖的”。这位勇猛剽悍的骑兵元帅热情地招待了达维多娃，临走时在汽车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礼品。

马林科夫当时 30 来岁，长得活象莫斯科动物园里笨拙的小胖熊。他其貌不扬，稍微有点谢顶，已经开始发胖，长着金黄的头发，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稀疏，象个女人。如果演电影，他扮演喀山婆娘倒很合适。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身边握有大权，他多次在紧急时刻及时地保护了达维多娃，特别是保护了她不受亚哥达和贝利亚的寻衅滋事和骚扰虐待，他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他对达维多娃的关心和爱恋。达维多娃也需要他的保护，她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有用的情报，也更加深认识了斯大林的为人。

在斯大林的周围，唯一没有刻意对她献殷勤的人是莫洛托夫。在她眼中，莫洛托夫是一个没有任何激情，总是落落寡欢的人，他严肃冷漠，总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波斯克列贝舍夫，可以说是斯大林的第二个“我”，他拥有巨大权力。波斯克列贝舍夫看上去很朴实，其实不能把他称之为傻瓜或等闲之辈。这个农民的儿子明白，政治斗争给他的东西远比种地或放牛养猪得到的多。天生的农民智慧帮助他站稳脚跟并成为斯大林的不可取代的人。他对领袖的感情很深，性格温和、不露声色，细声细语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善于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善于随机应变，因而逐渐地摆脱了所有的竞争者。身处政治旋涡之中的达维多娃能够在斯大林身边存在下去，也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她知道她的生命的安全在于斯大林的充分信任，而斯大林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波斯克列贝舍夫，所以他是一个千万不能得罪的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常常悄悄地对达维多娃表示他的关怀，这个倾慕者并不急于求成，而是采用渐进的迂回战略向达维多娃发起了韧性的进攻。在一次音乐会后，他邀请她到自己的别墅。他家里陈设简朴，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象医院一样干净，找不到一粒灰尘。他们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波斯克列贝舍夫是依靠绝对忠诚获得斯大林的充分信任的。当斯大林下令逮捕他的妻子时，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回答道：“如果你觉得需要，那就逮捕她吧”。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他的妻子不幸是托洛茨基儿子的妻妹，而他却经受住了考验。

达维多娃曾作为人民代表或是特邀人员参加了许多次对反对派的审判，并陪同斯大林提审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哥达、叶若夫以及扎科夫斯基等人。这些审问极端粗野，无情的抽打，难以入耳的谩骂，以及各种各样残酷的虐待。每次参加，对达维多娃都是一次心灵的磨难和灵魂的虐待。这也可能是斯大林对她的残酷考验。

有一次，夜里难以入眠的斯大林谈起了他的一段无人知晓的往事。“年轻的时候，我在图鲁汉斯克边区流放期间，认识了一位当地姑娘。除了自己的村子——新乌达村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见过。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种不大一点儿地。姑娘很早就酷爱读书，书是从移居同村的一位流放者那里借来的。这位姑娘叫帕莎，她温柔，性格内向。有一天晚上我们朗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童话故事。那时我非常孤独，需要温馨和对女人的亲热。于是我们彼此接近，互相许诺永不分离。但事实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我被革命事件所吸引，而帕莎则留在新乌达村。1926 年之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的消息。后来突然来了一封信。帕莎问我的身材怎么样，告诉我，在我逃跑之后，她生了个儿子，说是很难把他养大，因为没有吃的东西，他们要饿

死了。我没有回信，不想招引人们对我的怀疑。过了十年，来了第二封信，是帕莎的儿子写的。他寄来了已故帕莎的照片，信中说他在狩猎场工作，还没成家，请求与我见面。我把信烧了。不久前从伊尔库茨克监狱来了第三封寄给我的信。帕莎的儿子求我对他的命运进行一下干预。波斯克列贝舍夫坐飞机去了伊尔库茨克，原来他毫无过错。根据我们的建议，他被任命为我们在流放期间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子而现在博物馆的馆长兼看管人”。

达维多娃在同斯大林的长期相处中感觉到，假若他想当一名戏剧演员，他准会达到空前的水平。他具有惊人的魅力，可以使任何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变得易怒和凶狠起来，在他的灵魂深处，不知不觉地渗进了老年人的所有特性：乖僻的语言与见解，任性而苛求的挑剔，颓丧而萎靡不振，严重的矛盾心理。

不知为什么，斯大林一度对赫鲁晓夫反感起来，那时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有一次，斯大林象训斥小孩子似的叫喊起来，“回到你的老窝去，用被子蒙上你的嘴脸，你如果无缘无故来莫斯科，我们就要处置你。蠢货，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赫鲁晓夫面色苍白，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维辛斯基也是一个追求达维多娃的人，他为她不愿就范而恼羞成怒，搞到了她的许多不利材料。然而，在马林科夫的帮助下，斯大林出面干预了这件事。他把几个人叫到办公室，维辛斯基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允许，不敢落坐。斯大林不留情面地对他说：“安德烈·亚努阿利耶维奇，我看你对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怀着一种野兽般的敌意，完全丧失了感情分寸。你在继续宰割她。我们解除了你总检察长的职务，叫你作我的副手，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你说，你要干什么？你是个身强力壮的农夫，想搞女人，可是你要明白，用赤裸裸的手段不会赢得女人的心。不要再打扰达维多娃了，否则会更坏，我要让你的后脑勺吃枪子儿。记住，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的女人！我的话到此结束”。斯大林不慌不忙地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我手头存放的这份文件里写有被枪决的罪犯的遗孀和女儿的名字，你不想让这些女人安生。为了同她们保持暧昧关系，你向她们许愿，让她们留在莫斯科而无需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你不止一次地滥用你的职权。维辛斯基，最后一次向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请求原谅，否则她会感受了你的恶意中伤而归罪于你，我和马林科夫以及波斯克列贝舍夫将作为证人”。

实在难以认出这位前法官大人。他坐立不安，大汗淋漓。维辛斯基走近达维多娃，低着头，毫无血色的灰青嘴唇嚅动了一下，用刚刚能听到的声音说：“请您高抬贵手，原谅我给您带来的痛苦”。

达维多娃不断地被卷入到上层的勾心斗角之中，贝利亚始终是她所恐惧的一个人物。贝利亚企图使达维多娃为他所用，不断地对她使用各种手段来要挟。波斯克列贝舍夫则成了她的保护人，并同贝利亚发展到冲突的地步，最后只有把贝利亚的所做所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不客气地对贝利亚怒斥道：“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把自己人派到达维多娃那里去。你忘了，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的女友，她是我的女人。你命令用醋酸毁坏她的容貌吗？”斯大林把一杯残酒泼到了贝利亚的脸上。一阵热血涌上了这位人民委员的双颊。“滚开，你这只该死的豺狼！”斯大林手中的那只微型手枪在闪闪发光。

达维多娃回忆道，斯大林除了同她保持密切的关系外，还有一位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大剧院的独舞演员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徐娘半老”的花腔女高音、外貌相当漂亮的瓦列里娅·巴尔索娃，以及罗莎·卡冈诺维

奇、玛丽娜·谢苗诺娃、瓦列奇卡·伊斯托米娜、勃罗尼斯拉娃·茨拉托戈罗娃、娜塔丽娅·什皮列尔，这些都一度成为斯大林的情人。

1952年10月20日一大早，达维多娃就被接到昆采沃别墅，躺在床上正在病中的斯大林要见她。“给波斯克列舍贝夫打电话”，斯大林欠起了身子，“让达维多娃留下。而你们这帮混蛋，都给我走开！”波斯克列舍贝夫把盛着镇静剂的勺匙递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那颤抖的双唇边。“萨沙”，斯大林嘟哝着，“转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娼妇达维多娃……应当死去的首要就是她……”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发出低低的呼哧声，浓浓的唾液沫流到枕边。

“把薇拉·达维多娃这个娼妇……处死……请向我发誓，你要这样……”斯大林再也不能讲话了。

波斯克列舍贝夫用车送达维多娃回家。告别时，他向她说：“韦罗奇卡，我把许多人毫无怜悯地投入牢里，斯大林的话过去对我来说一向是最高法律。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谈话。但他最后讲的这些话我将随身带入坟墓。今天在我的一生中是最可怕的一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永远丧失了人性。请允许我永远做您的最忠实的朋友，好吗？……韦罗奇卡，当人们不再打扰您的时候，您就经常到我这里来吧……”

达维多娃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斯大林。他死于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戴着手铐脚镣被押解到莫斯科军区水泥地下室的有：斯大林秘书处主任、中将、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舍贝夫，斯大林私人卫队长、中将弗拉西科……还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大剧院歌剧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所有的人都分别被关进单人牢房。

五周过后，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获释。命令她永远离开莫斯科，她选择了第比利斯市为自己的居住地。那时她47岁。

后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建议”达维多娃在苏共中央全会和苏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发表谴责斯大林的声明。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赫鲁晓夫威胁她，扬言要对她进行报复……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离开了莫斯科大剧院，和自己的丈夫姆切德利泽-尤日内迁往第比利斯。她在音乐学院教学，1964年被授予教授职称。1976年达维多娃隆重地庆祝了自己的70寿辰……

这些都是达维多娃的回忆，她的亲身经历或许能帮助我们揭开斯大林的情爱之谜。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回忆是列昂纳德·根德林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这就必然会我们对它的历史真实性发生疑问。或许我们仅仅把它作为回忆录性质的历史小说来看更恰当，而不认为它是可靠的史料。同时，作为个人的回忆录，书中的达维多娃也难免有自我美化、自我辩白的倾向。不管怎么说，它代表着作者或者达维多娃对斯大林及其有关人物的事件的评价和看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点。



## 结束语：让历史学家来评判

写完《斯大林之谜》，经历了一次次强烈的心灵震撼，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眼前仿佛还有一个活的斯大林，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神态表情，他的音容笑貌，还都历历在目。

然而，能对斯大林再说点什么呢？心里却感到一片茫然。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边春风送暖，万物复苏，草木吐绿，又一个北京的春天。

许许多多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在脑中涌现。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取得了超越前人、举世瞩目而永远铭刻在历史记忆中的辉煌业绩。他参加并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在世界历史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苏联这个横跨欧亚大陆，二千二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二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里激发起人们的创造热情，用他铁的手腕保证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团结，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实现了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变迁。他把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打下自己永远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记。更重要的，是他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抗击了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从莫斯科打到柏林，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并因此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斯大林成为一个世界巨人，他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他改变了一个世界的命运，他把世界历史打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就对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影响而言，斯大林无疑是少数几个屈指可数的历史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都会怀着极大的兴趣来认识他，历史学家更会试图从他这里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斯大林，仍将是历史注目的焦点之一。

斯大林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千百万人为什么会狂热地崇拜他？斯大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身上好的品格和坏的品格对于他的人生发展都起了哪些作用？……对于这一切，每个人自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

对于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对他的肯定和否定，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许许多多的著作说了许许多多的话。说他好话、为他歌功颂德的有他的同事、学生和宣传机构，还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如爱伦堡、肖洛霍夫，甚至还有他的对手如英国首相邱吉尔，更难以想象的还有他的政治反对派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人——他们死到临头还在为斯大林大唱赞歌，当然，他们各自出于自己的不同动机和目的。说他坏话、对他否定谴责的有他的敌人，他的受害者，有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也有他以前的同事后来的继任者如赫鲁晓夫，甚至还有他倾注许多爱的他的女儿。这许许多多复杂的矛盾的现象正是由于他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和矛盾性所决定的。

苏联著名学者德·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现象》一文中写道：“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在我国历史（俄国史和苏联史）上，没有比斯大林更矛盾的人物。他一个人所受到的赞扬和指责都足够整整一个罗马军团的历史人物来承担。如果我们在真理面前、在历史面前是诚实的，那就不能不承认约·维·斯大林对于为争取社会主义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和罪行”。他认为，“能够名垂千古的人为数不多，斯大林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他的不朽是

不安宁的。关于他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将会长期争论下去，伴随着各种各样渲染过的修饰语：既有信仰，也有仇恨；既有痛苦，也有永恒的困惑。不管怎样，斯大林的命运再一次使我们确信：归根到底，伟大思想的权力比人们的权力更强大”。

生于波兰并参加波兰共产党、后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出党而移居英国的英籍波兰作家艾萨克·多依彻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写道：“斯大林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的，但又是创造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斯大林事业中最好的部分，肯定要使斯大林流芳千古，就如同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事业中最好的部分也使他们流芳千古一样”。在他的斯大林画像中，斯大林从正面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来看却是伊凡雷帝的子孙。“斯大林是用野蛮的方法来消灭俄国的野蛮状态”。

这里我们想到了恩格斯的几段论述。他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中写道：“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论权威》中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谈到在历史上恶的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指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

我们引用这些话并不是想为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和开脱责任。斯大林，无论是从他政治镇压的残酷性，还是从他政治迫害的规模来看，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我们只想说，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弄清特定历史人物同他所处的时代、历史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人物。分析和研究斯大林，还需要同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现象结合起来。人类社会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它只有超越过去，才能不断前进。有一点我们可以坚信：人类社会是在向着更加文明、更加人道、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政治也必然要抛弃它过去的旧的形式而采取新的文明形式。

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无疑还会有很多的争议。千秋功罪，还待后人评说！

1994年3月重新修改于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

## 附录一 斯大林生平年表及大事记

1879年12月21日 斯大林诞生在格鲁吉亚的小镇哥里。1890年11岁父亲去世。

1894年15岁 进入第比利斯东正教学校。

1899年20岁 被神学校开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取名“柯巴”。

1901年22岁 进入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到巴统工作。

1902年23岁 在高加索组织了一次有影响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第一次被捕。

1903年24岁 关押了一年半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宁33岁，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

1904年1月25岁 从流放地逃回第比利斯。与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婚。

1905年12月26岁 前往芬兰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第一次见到列宁。

1907年11月28岁 第一个妻子去世，留下了一个2个月的孩子雅可夫。

1908年3月29岁 第二次被捕，又被判处流放。

1910年3月31岁 再次被捕，被流放。

1911年32岁 又两次被捕，被监禁6个月。

1912年33岁 被捕被监禁5个月。改各“斯大体”，成为党的中央委员，同莫洛托夫创办《真理报》。在维也纳写成《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

1913年2月——1917年3月 34岁——38岁 最后一次被捕，被流放长达4年之久。

1917年3月38岁 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党中央任命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组成领导核心。

斯大林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当时她16岁。

1918年3月——1920年11月外国武装干涉，内战爆发。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在察里津前线，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成为斯大林的密友。

1919年3月 共产国际成立，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

1921年11月42岁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时被授予“红旗勋章”。

1922年4月43岁 斯大林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2年12月30日苏联建立，最初加入的有俄罗斯、南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4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4年1月21日45岁 列宁病逝，终年54岁。

1924年5月 发生“列宁致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事件。

1925年1月46岁 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由伏龙芝接替。

1925年10月 伏龙芝因治疗手术死亡，伏罗希洛夫接替他的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1925年12月 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击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6年1月 47岁 斯大林发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7月捷尔任斯基逝世，亚哥达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要职。

1927年11月 48岁 “托季联合反对派”失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

1928年1月 49岁 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1928年7月 农业全盘集体化开始实施，遭到布哈林等人的反对。

1929年1月 50岁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

1929年4月 布哈林右倾反对派被击败。

1929年12月 21日全国庆祝斯大林50寿辰。农业集体化被强制推行，提出“消灭富农”的政策。

1932年冬——1938年春全国发生大饥荒。《柳亭纲领》谴责斯大林。

1932年11月 8日 53岁 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留下了一个11岁的儿子瓦西里和一个6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1934年2月 55岁 召开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934年叶若夫主管了监察委员会，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波斯克列贝舍夫负责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特别部，直属斯大林。马林科夫被提升为党中央人事部副部长。

1934年12月 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

1935年1月15日 56岁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判并判刑。1936年8月 57岁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处决。托姆斯基自杀。

1936年9月 亚哥达因肃反不力被叶若夫代替，主管内务部。

1937年1月 58岁 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皮达科夫等13人被枪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内务部遭到清洗，许多人自杀。

1937年6月 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红军高级将领因“叛国罪”被处决。军队被清洗，一大批高级军官被杀。

1937年12月 叶努启则等人被处决。

1938年3月 59岁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布哈林、李可夫以及亚哥达等18人被处决。

1938年7月 贝利亚取代叶若夫，主管内务部。叶若夫等内务部官员被逮捕枪毙。

1938年9月 希特勒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8月 60岁 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1940年8月 20日 61岁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被暗杀。

1941年6月 22日 62岁 德国进攻苏联。

1941年10月 德军占领乌克兰，逼近莫斯科。莫斯科战役。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被俘，后来死在德国集中营。

1942年7月 ——1943年2月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1943年11月 64岁 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

1944年7月 65岁 苏军把德军赶出国土，进入波兰东部。1945年2月 66岁 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

1945年4月30日 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

1945年7月 苏美英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

1946年——1947年乌克兰大饥荒。

1946年69岁 “犹太复国主义案件”，一大批人被处决。莫洛托夫的妻子、安德列耶夫的妻子、加里宁的遗孀等被逮捕流放。

1949年9月 70岁 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被处决。

1949年12月 21日全国大规模庆祝斯大林70寿辰。

1951年11月 72岁 “格鲁吉亚案件”，一大批人被逮捕处决。

1952年10月 73岁 召开党的十九大，莫洛托夫致开幕词，马林科夫做政治报告，赫鲁晓夫做修改党章的报告，伏罗希洛夫致闭幕词。斯大林辞去总书记职务。

1952年12月 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伏拉西克失宠，并被捕入狱。

1953年1月 “医生谋杀案”，克里姆林宫里的许多医生被逮捕。

1953年3月 5日斯大林逝世，终年73岁。

## 附录二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原题：《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同志们：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在大会许多代表的演说当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苏共中央的各次会议上，已经就个人崇拜及其有害后果谈了许多。

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

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造成极其严重、极其深刻危害的根源的。

鉴于一般对个人崇拜产生的种种实际后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遭受破坏而产生的恶果缺乏充足的认识，考虑到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巨大无限的权力这一事实，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是绝对必要的。

别的姑且不提，我们首先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者在发觉个人崇拜稍有露头的时候，就给予多么严重的指责。马克思在给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威尔芙姆·布洛斯的信中写道：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做所为恰恰相反）。”

其后不久，恩格斯又写道：

“马克思和我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

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众所周知的伟大的天才弗·伊·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经常强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作用，强调党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机构所发挥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以及中央委员会

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领导革命解放运动的工人阶级领袖的作用。

列宁在非常重视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的同时，对个人崇拜的一

切表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对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所谓“是英雄还是群众”的观念，列宁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列宁还抨击了任何想使英雄和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的企图。

列宁教导我们：“基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着共产党这一事实，党的力量依赖于人民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总是自豪地提到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袖和导师的布尔什维克党。凡是重大的问题，列宁总是要提交给工人和他们的政党征求意见。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苏维埃国家机构中减轻及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尝试。他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原则、党生活的准则，他强调了党的领导方针是委员会制。列宁在革命前的时期就说过：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团。列宁还指出：“这一届党代表大会到下一届大会的中间时期，中央委员会遵守并解释党的各项原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及其权威。他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极度中央集权化的非常有权威的团体……”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的确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具体领导。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列宁在原则问题上总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列宁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其他人，在他说服对方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说明自己的意见。列宁总是热心地主张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会议，实现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党章。弗·伊·列宁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为了我们党的胜利，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此外，列宁敏锐的眼光在当时就已经看到斯大林身上的某些品质可能会在以后产生严重的后果。

列宁担忧着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他指出有必要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地位调作其他工作，其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不能对同志们采取适当的态度，他会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

1922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这样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封信已经散发给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在党史上，列宁这个遗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文献。各位代表大概已经读了这个文件，但是我还是请同志们再读一读，各位可能还记得列宁的纯朴的语言吧！这些话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为党的政策、将来的方向而担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霭，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交给了代表们。那时，代表们对是否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务问题进行讨论，其结果是，代表们希望斯大林能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铭记在心，克服自己使得列宁十分担



心的那些缺点。在这种希望下，代表们赞成让斯大林继续担当此职。

各位同志！党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公布给大家两个未发表过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表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遗嘱中业已阐明的斯大林的性格。两个文件当中的一个是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担任政治局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另一件是弗·伊·列宁写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下面我就把这两个文件宣读一下：

“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允许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觉和伊里奇的事业，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我求助于弗·伊的比较亲密的同志你和格里哥里，并请求你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斯大林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无谓的纠纷。我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了这封信，两个半月以后，1923年3月列宁寄给斯大林下述信件。

“致斯大林同志，副本送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的话，但是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同志们！我对这些文件无须多加说明，两个文件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据。斯大林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忠实的战友，是党创立以后积极的战士，党对这些是很了解的，并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斯大林甚至对她也采取了这样的举动，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斯大林对于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斯大林的这个缺点日益发展，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列宁死后不久，斯大林尚能注意列宁的忠告，但后来他就开始无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重大训诫。

当人们分析了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当人们考虑了斯大林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以后，他就不能不认识到，列宁的担忧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不良性格在列宁在世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滥用其重大的权力，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毒害。

为了使斯大林发生的这些问题不再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出现，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必须正确地分析这一问题。斯大林出于他的粗暴而放肆的性格，不但对反对他的一切事物，而且对那些看上去违背了他的意图的事情都施加了残忍的暴力。

对于别人，斯大林是不能进行说明和说服，也不肯耐心地协力工作，相反，他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别人，他要求别人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不论是谁，只要他反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企图论证自己的见解和立场的正确性，那

他就会被斯大林从领导集团中排除出去，然后在精神和肉体上加以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时期，这一现象特别严重。当时许多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都成了斯大林镇压行动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一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获得了成功，其结果是强化了党，锻炼了党。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党在党内各级组织和那些提出反对列宁主义理论以及敌视社会主义政治方针的人们展开了政治思想的大规模斗争。这是一场无比困难的斗争，但仍是不可少的斗争。这是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政治路线以及布哈林一伙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是要向世界资本主义屈服。如果 1928-1929 年前后兴起的右倾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正因为这样，党在思想意识领域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党向全体党员以及非党群众指出了托洛茨基派及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恶毒及危险。这样一来，阐述我党方针这一重大工作取得了成果；这样一来，不管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党的压倒多数支持了列宁的方针，党能够将党的列宁主义方针付诸实现，党能够唤醒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应当特别指出：在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伙以及布哈林之流进行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这一斗争始终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斗争。从那时过去几年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成，剥削阶级大体上被消灭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结构有了根本的变化，与党敌对的政治活动和社会集团的社会基础显著缩小了，党在思想领域的敌人业已在政治上彻底失败，在这时期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

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确实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镇压运动最初是针对那些业已被党击溃的列宁主义的敌人，即托洛茨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集团。但接着就针对了许多诚实的共产主义者，针对了那些在内战时期和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初期最困难的时候肩负重担，并且为捍卫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右派进行了积极斗争的人们。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的敌人”这一说法。有了这种说法，自然就无须再去证明参加争论的某个人或是某些人在思想意识上的错误。此外，利用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违反一切革命法则和制度准则，对那些与斯大林抱有敌对意图的人，以至于那些印象不好的人进行最为残酷的镇压。利用“人民的敌人”这一观点，可以在事实上抹煞一些种类的思想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在具体性质的问题上，人们要想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可能了。一般在实际作为有罪的唯一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口供”，这是违背现代法律学一切准则的，后来证明，这些“口供”，乃是通过对被告施行肉体上的压迫而获得的。

这是公然违背革命法制秩序的做法，事情发展到使以前捍卫党的方针的

完全无辜的人们也成了牺牲品。我们必须指出，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方针的人也并没有那么多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的重大理由。特别提出“人民的敌人”这一说法，其目的在于把这些人从肉体上消灭掉。

还有一个事实，后来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被消灭掉的许多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是和他一道工作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的确犯过错误，然而尽管如此，列宁还是肯定了他们的功绩，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设法把他们保留在党内，这些人是被列宁带着一起前进的。

在这一方面，有必要让本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解弗·伊·列宁在 1920 年 10 月 给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份未发表过的备忘录。在这里，列宁阐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义务。他写道：必须把监察委员会变成党和无产阶级意志的真正机关，“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特别任务是对待所谓反对派的代表要关怀和有区别，甚至时常象真正治病那样对待他们；他们由于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里上的恐慌。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的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指示等等。”众所周知，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以及那些脱离了党的正确旗帜的人，列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同时，正如上面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领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与那些并未与党决裂而是一时与党的方针不符合并且不久就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人保持紧密的接触。列宁忠告说，对于这样的人不应当采取极端的手段，而应当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列宁对待群众的贤明态度在他对高级干部所作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斯大林与群众的关系则与此截然相反。列宁的特点在于他有这样的才能，和群众一起从事工作，耐心地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不是采用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人民群众施加思想影响而使他们跟着自己走，而斯大林不会这样做。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胡作非为滋长了其他人的气焰，数千人遭到了逮捕、流放、审判，不经过正常的审讯就被处置，造成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的状态。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会有助于党内各级的团结，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相反，那些忠实于党但和斯大林关系不好的活动家被从党内驱逐出去并被消灭。

我党为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个斗争时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原则，如果对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体谅和关心，并和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是去驱逐和消灭那些人，而是把他们引导到自己一边来，如果是这样，那也不会出现违反革命法则秩序的行动，也不会好几年里使人们成为恐怖行动的牺牲品。恐怕只会对那些对苏维埃制度犯了罪的人采取非常手段了。

人们想起若干历史事实。

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二名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的计划，不仅反对，他们甚至在 10 月 18 日的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宣称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起义是冒险主义。这样一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仅把中央委员会的起义决定泄漏给

了敌人，而且也向敌人泄露了这场有组织的起义不久就将爆发。

这是对党和革命的背叛。就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还提出是否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党内驱逐出去的问题。

然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又给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领导地位。在列宁给予他们的地位上，他们进行着负责的党的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活动。人们知道，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犯了其他许多重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非但没有枪毙他们，甚至也没有逮捕他们。

再举托洛茨基分子的例子来看看，在隔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今天，我们能够完全冷静地谈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了。我们能够十分客观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结果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分析，围绕在托洛茨基周围的那些人也不可能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属于党的知识分子阶层，另一部分则出身于工人。我们能够举出当时赞助托洛茨基主义的许多人的名字，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积极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及十月革命本身，他们在革命中为了巩固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而转到列宁主义立场。难道有必要去消灭这些人吗？我们确信，假如列宁活着的话，他是不会对这些人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的。

以上只不过是一些历史事实。然而是不是列宁在的确有必要的场合对那些革命的敌人也不下决心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呢？不！谁也不能这么说。有必要对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展开无情的打击的场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会毫不宽容地采取这种方法的。各位可能还记得列宁在和进行反苏维埃暴动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者的斗争以及1918年和反革命富农及其他敌人的斗争中，他对这些敌人就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最为极端的措施。然而列宁只是对那些真正的阶级敌人才采取这种手段的，对于那些虽然犯了错误但可以通过思想影响加以引导的人，列宁不但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反而把他们保留在党的领导部门。

只是在剥削阶级仍然存在，并且猛烈地抗拒革命而且他们的垂死挣扎采取了包括内战在内的极为尖锐的形式，只是在这些必要的场合，列宁方采取猛烈的镇压措施。

相反，在革命业已获胜，苏维埃国家得到强化，剥削阶级业已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确立基础，我党在政治上已经团结，而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思想上业已强化。然而斯大林却在这个时期，采取了极端措施进行大规模镇压。

一系列的事件显示了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是常常不仅对真正的敌人而且对那些对党和苏联政府毫无罪行的人进行镇压并加以肉体消灭。这里没有一点道理，有的是对于弗·伊·列宁感到震惊的残忍暴力的炫耀。

后来，尤其当贝利亚集团的假面具被揭露以后，中央委员会就这一集团捏造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残忍和丑恶的专横行为和斯大林不正当的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证明：斯大林滥用其无限的权力，他用中央委员会全体的名义行动，但不用说中央委员会连中央委员会政

治局的意见他都是不听的。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行动，他经常个人独断决定党和政府极为重要的事务。这些事务他是连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的。在分析个人崇拜的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向一切人指出这种个人崇拜对我党利益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贯强调党领导工农社会主义政府的作用及意义。他指出这是我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联国家的执政党的重大责任。”他要求认真遵守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方面实行委员会制。

领导部门的委员会制，乃是基于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我党的本质。

列宁还指出：“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

众所周知，列宁自己就是严守这些原则的一个实例，在重要问题上，列宁从来没有不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劝告而自己独断专行。

即使我党和我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列宁也认为必须定期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来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并通过领导机关慎重地起草决议案。

例如，我们可以想起1918年。当我国在帝国主义侵略进攻之下处于危机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讨论燃眉的极端重要的问题——和平问题。1918年突然处于内战，但还是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我们的党纲，并就党和处理农民群众的关系，在红军的组织和苏维埃的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党的社会构成的重要问题，作了决定。1920年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制定了有关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的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称为关于党的团结的历史性决议。

列宁在世的时候，党代会是定期召开的，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道路上的重要关头，列宁总是认为党应当对所有那些有关内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列宁极其重视把自己的论文、信件提交党的最高机关——党代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威的领导机构进行活动，它严守党的原则，实行党的政策。

列宁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列宁死后，我党各种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也得到遵守呢？

在列宁刚刚死去的几年里，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大体是定期召开的。但是后来斯大林就越来越滥用权力。于是这项原则就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15年里，尤其是这样。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相隔15年，这难道是正常状态吗？而在这个时期，我党经历了无数的重大斗争，党是有必要就卫国战争后国防和战后15年期间的和平建设这些重大事件通过有关决议的。但是甚至在战后也没有召开这次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全会差不多没有召开过，在此只须指出连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就够了。1941年10月曾计划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了莫斯科，他们等着全会的召开。等了两天，但他们白等了。因为斯大林甚至不愿意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见面、谈话。这件事看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是如何灰心丧气。

而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采取了粗暴不逊的态度。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的原则，他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 1934 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保存有斯大林对待党的许多干部专横态度和手段的资料。现已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监督之下成立了党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在于调查对苏联（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镇压的经过。

该委员会调查了收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里的资料 and 文件。调查结果表明：针对共产党捏造了事件，进行了虚伪的告发，公然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其结果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调查结果表明：在 1937—1938 年被打上敌人烙印的许多党、苏维埃以及经济方面的活动家决非敌人。他们也不是间谍、破坏分子，而往往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横加罪名，而在许多场合因不堪野蛮的拷问——根据作为预审法官的捏造者的命令——承认了一切重大的莫须有的罪名。该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的关于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该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是如何遭到大规模镇压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由中央委员会加以保存。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共选了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 83 名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 1937—1938 年期间）。（会场发生愤怒骚动）

第十七次党代会的组织情况如何？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当中 80% 是革命前或者内战时期入党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 1936 年以前入党的，以出身而言，大会代表大部分是工人（占拥有表决权的代表的 60%）。

由此看来，由以上这些人构成的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后来证明其中大多数是党的敌人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相信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 70% 被打上党和人民的敌人的烙印。其唯一的原因在于对诚实的党员的名誉进行中伤，捏造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完全破坏了革命的法制秩序。

不仅中央委员会成员如此，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大多数也遭到同样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 1966 名中有 1108 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人被以因反革命而定罪遭到逮捕。正如上面所述，参加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帽子，这个事实本身就显示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会场内激愤）

我们肯定会想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乃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而在历史上知名。大会每个代表都是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经在革命前夕的非法时期以及内战前线为了党的利益而艰苦战斗。他们勇敢地与敌人进行搏斗，他们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而斗争。要说这些人竟然会在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在政治上业已肃清的时候，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居然会作为叛徒而投入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阵营，这难道能使人们相信吗？

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其后果就是如此。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非常猛烈，其理由何在？在当时斯大林把自己居于党和人民之上，他既不顾中央委员会，也不顾

党。第十八次党代会以前的时期，斯大林尚能听取集体的意见，然而，当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集团在政治上遭到完全肃清而在社会主义这一斗争中胜利的佳年而形成的党的统一以后，斯大林甚至对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也越来越不重视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事而只不过要一些统计人员而已，在斯大林眼里，其他一切人都要听他的意见，只能对他歌功颂德。

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晚在斯大林授权之下（并由政治局批准，政治局是在二天以后加以讨论并批准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努基泽签署了下面这项命令：一、对于因策划恐怖行动而起诉的案件，审理机关应急速加以处理。

二、命令各司法机关不得以考虑到有减免的可能性而阻止属于这一范围的罪犯的死刑的执行，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接受这一上诉状。

三、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对上述范围的罪犯要在判处以后立即执行。

这次命令构成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秩序残暴行为的基础。在许多捏造出来的审判事件中，被告们被指控犯了“策划”恐怖行动的罪，这一来，对这一事件作重新考虑的可能也完全被剥夺了。即使被告在法庭上指出他们的口供乃是强加于自己头上的，因而他们否定自己的罪状。即使这样，情况仍然如此。

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是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也夫可能得到警卫工作的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后，尼古拉也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1934年12月2日被带去询问，但途中“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1939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

1936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怕的程度。1936年9月25日斯大体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内容如下：

“我认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的，紧急必要的。雅哥达完全没有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集团的能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事件中就耽误了四年。所有的党务活动家和大多数内务部成员也一致承认这件事。”严格地讲，必须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仍然没有会见党的活动家，他也没有可能了解他们。

斯大林的这项命令说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耽误了四年时间。斯大林要求弥补已耽误了的工作，他的这项命令逼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家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处决。

必须指出，在193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2~3月全会上，这个事件也提出来了，叶若夫作了题为《从日本—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走狗进行的有害活动，破坏活动及间谍案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的报告，基于这一报告，全会通过下面这项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分析了在调查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总部及其

追随者的过程中表明的所有事实，全会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这些极其恶毒的人民的敌人的过程中，至少耽误了四年。”

当时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是在所谓的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于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是不是真的那样危险呢？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会前夜的选举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获得了约4000张选票，而支持党的方针的人则获得了约72.4万张选票。从第十五次党代会到2~3月全会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托洛茨基分子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改变了原来的见解，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很明显，在社会主义获得如此胜利的情况下，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恐怖行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就党的活动的缺陷和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叛徒的罪行这个专题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阶级斗争是如此的激化。报告以此为借口试图使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的政策在理论上合法化。斯大林把这说成是历史教导他的，说成是列宁教导他的。

列宁的确说过由于剥削阶级的抵抗，进行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是列宁的这些话是在剥削阶级仍然存在而且相当强大的时代说的。

而当国内形势好转，而且红军在1920年1月攻占罗斯托夫，在和邓尼金的战争中取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即下令捷尔任斯基停止大规模镇压，废除死刑。列宁就苏维埃国家的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正确性在1920年2月21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说了下面这段话：

“协约国的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实行了恐怖。因为称霸世界的大国不择手段，用大批军队压到我们头上。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也不能支持，这也就叫做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履行了要实现自己的纲领的诺言。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任务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我们用事实证明了一点。”

---

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的这一明确教导，在我国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而且没有重大理由去实行异常的大规模恐怖的时候，斯大林让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实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

这种恐怖行动并非专对已经失败了的剥削阶级的余孽，而是施加在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活动家身上。这些活动家被指责为有“叛变行为”、“间谍行为”、“破坏行为”，策划虚构出来的所谓“阴谋”，基于这些诽谤和中伤，他们被加上莫须有的荒唐罪名。

在1937年中央委员会2~3月全会上，许多中央委员提出实在的“疑问”，即在向“叛变行为”进行斗争的借口下确立的大规模镇压方针是不是真正的正确。

波斯蒂谢夫同志极好地在下面这段发言中提出这一疑问：

“我相信在整个激烈斗争期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不是脱离革命就是投身到敌人的阵营，只有健全的成员才能为党的事业而斗争。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已经过去的时候，卡尔波夫以及象他那样的人竟会出现在敌人阵营，而现在根据证实，卡尔波夫难道不是被说成是在1934年加入了托洛茨基派的吗？”



“那些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真正的党员居然会在 1934 年和现在投身到敌人阵营去，我个人对此是不能相信的，我不懂得，困难时期和党共同行动而在 1934 年起却加入了托洛茨基派的说法到底从何而来呢？对此我无法想象，这是件奇怪的事……”

根据斯大林的公式，即社会主义的社会越接近，敌人就日益增多的公式，根据基于叶若夫报告而通过的 2~3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潜入国家保卫组织内部的挑衅分子和那些毫无人性的野心家一起利用党的名义，针对党的干部、苏维埃国家干部以及一般苏联公民施加大规模恐怖措施，在这一方面只须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从 1936—1939 年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的人数增加到十倍之多，众所周知，对于党的领导阶层也施加了种种任意的残酷手段。

第十七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乃是基于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过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的，这个党章指出：“当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监察委员采取驱逐出党这种极端措施的时候，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还应当召集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及监察委员出席”。还规定：“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的人员当中的 2/3 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驱逐出党。”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当中半数在 1937、1938 年被逮捕。他们被肆意破坏党章的非法手段从党内驱逐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驱逐全然未经中央委员会讨论。

此外，对这些所谓间谍以及破坏分子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加以分析的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全是捏造出来的。以通敌为理由而被逮捕的许多人在残酷的非人道的拷问下供认自己育罪。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说，许多政治犯在军事审判时取消了自己的口供，并要求进行客观的审查。但斯大林不让政治局委员见到这些陈述，斯大林知道这样的陈述是很多的。

中央委员会认为绝对有必要向党代会公布针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的许多这种捏造事件。让我们举出党和苏维埃政府最优秀的活动家艾赫同志的事件作为例子来说明那些恶毒的挑衅、可恶的歪曲以及破坏革命法制秩序的犯罪行为。艾赫同志 1905 年入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

艾赫同志是基于中伤的材料在苏联总检察长未予承认的情况下于 1938 年 4 月 29 日夜被捕的，总检察长的承认是在被捕后 15 日发出的，艾赫事件的审判是对苏维埃法制秩序的粗暴践踏，而且是任意的捏造。艾赫的确是在审判员预备的活动口供书上签了名，这是拷问的结果。

1939 年 10 月 1 日艾赫递交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在否定了一切罪过的同时，还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艾赫在申诉书中写道：“我一直在为苏维埃政府进行战斗，再没有比在这个政府监狱中坐牢更为悲惨的事情了。”

艾赫在 1939 年 10 月 27 日递交给斯大林第二次申诉书，这份申诉书现在还保存着，在这个申诉书中，艾赫指出了非常合理的事实，并对中伤和污蔑进行反击，他指出：对他的挑衅住的污蔑是来自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托派分子因艾赫同志在西伯利亚地区任党委第一书记时曾批准逮捕他们而怀恨在心，图谋报复，另一方面在于负责审理的审判员歪曲事实。艾赫在申诉书中写道，“……今年 10 月 25 日，我彼通知说事件的审理业已结束，还让我看了判决书，如果我真犯了加在我头上的罪过的哪怕 1%，我在被处死以

后，就不会给你写这一申诉书了。然而我没有犯指控我的任何罪行。我的心灵没有一点污点，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对你撒一次谎，而现在当我两脚立于坟墓的时刻，我也不会撒谎。关于我的这一事件完全是挑衅和中伤造成的，是侵犯了革命的法制秩序根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判决书一部分的口供不仅荒谬无稽，而且包含着有对于全苏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的那些正确决议，在我的口供里却说成是反革命组织的敌对行动。

“我对党，对你的确是犯了重大的罪过，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可耻的事情，这就是我已经招认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乌沙柯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进行拷问，他们不肯扳直我被打弯的肋骨，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进行逼供，我没有能忍住刑罚，作了口供，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别人加上罪名。

“我的口供大部分是乌沙柯夫提出我写的，或者是他口述的笔记，口供的其他部分是我重新抄写内务人民委员部从我曾负责全部工作的西伯利亚获得的材料。如果在乌沙柯夫捏造出来由我署名的口供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他们就让我在另外的口供上署名。对待卢希莫维奇也是如此。卢希莫维奇开始被控是“预备总部”成员，后来在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名子就消失了。这个“预备总部”是在1935年由布哈林创设的。对待“预备总部”的领导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对我的审讯中，最初是命令我把自己的名子写进去，然后又命令我把朱尤拉克的名字写进去。同样的事情另外还有。

“我恳求他重新审理我的案件，但这并不是对我有什么助益，而是为了揭露那些恶毒的挑衅。由于我的屈服，由于他们的罪恶中伤，现在险恶的诽谤还象蛇一样缠绕在许多人的身上。我决没有背叛您，也决没有背叛党，我知道，我正走向死亡，那是由于党的敌人以及那些对我进行挑衅和捏造的家伙的卑鄙无耻的暗害。”

这样重要的申诉书，是值得中央委员会讨论的，然而当时却没有进行讨论，这份申诉书落到了贝利亚手里。另一方面，对政治局候补委员艾赫同志的恐怖虐待仍在继续。1940年2月2日，艾赫被带上法庭，在法庭上，艾赫同志没有认罪，他讲了下面这段话：

“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除了强迫我签署的名字以外，没有一个是字是我写的。从被捕时起，我就遭到拷问，我是屈服在负责审理的法官的压力下才作出口供的，才写出这些荒谬无稽的话的……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要对法庭、对党、对斯大林表明，我是无辜的，我与任何阴谋都绝对没有关系，在我整个生活中，我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我将抱着这个信念而死。”

2月4日，艾赫被枪毙了，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艾赫事件纯属捏造，要恢复艾赫的名誉。

1905年入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曾关在沙皇劳动集中营达十年之久，他在法庭上取消了逼供的全部口供，最高军事法庭会议记录中记录了鲁祖塔克下面的这段陈述：

“……被告在军事法庭的唯一要求是希望报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有来被肃清的骨干分子，他们炮制出奇妙的事件，强迫无辜的人做口供，而我们则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和那用形形色色的人的口供制造出来的犯罪案件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他们审理案件的方法是把谎言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反对那些已遭谴责的人，而且对那些完全无罪的人进行中伤。

被告向法庭提出要求，要求法庭允许他把所有这些事件用文字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被告在法庭上说他在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一切领域总是和党的政策、意见是一致的，还他对党的政策不抱任何恶意。”

鲁祖塔克的这一申诉遭到了漠视，尽管鲁祖塔克在世时仍是列宁为了党的团结而设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就这样，这位十分权威的党的机关的负责人倒了下去，成了残酷专横的牺牲品。鲁祖塔克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谈话。对于鲁祖塔克的判决二十分钟就下来了，他被处决了。

1955 年对鲁祖塔克案件认真调查的结果表明：对他的谴责是伪造的，是基于一些诽谤性资料的。鲁祖塔克被恢复了名誉。

专横跋扈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帮家伙利用挑衅的方法捏造出来莫须有的“反苏集团”“阴谋组织”，这从罗森布鲁姆的口供中可以看出。罗森布鲁姆是在 1906 年入党的党员，1937 年彼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

1955 年调查柯马洛夫案件时，罗森布鲁姆揭露了以下事实：罗森布鲁姆在 1937 年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还命令他针对自己和其他一些人作出虚伪的口供，后来罗森布鲁姆被带到萨柯夫斯基的办公室，萨柯夫斯基对罗森布鲁姆说，如果他能在法庭上供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1933 年捏造的口供，即所谓“列宁格勒恐怖活动总部进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以及派别活动，就可以释放他”。（此时会场骚动）

萨柯夫斯基发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冷笑，他对罗森布鲁姆说明了如何巧妙地捏造出“反苏阴谋”的卑劣手法。

罗森布鲁姆揭露出：

“为了让我们听懂他的意思，萨柯夫斯基举了几个考虑的好例子来说明这个总部及其总部组织，萨柯夫斯基详尽他讲述了这个组织的情况以后对我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公开审判这个案子。

“在丘托夫、乌加洛夫、斯莫洛丁、波西隆、沙波什尼柯娃（丘托夫之妻）等 4 名总部委员，以及另外 23 名支部成员被带上法庭时，必须事前天衣无缝地捏造好‘列宁格勒阴谋总部事件’，为此必须有证人。这个证人的社会出身（当然是过去的）和党内地位将起不小的作用。”

萨柯夫斯基对我说：“并不要你去发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先提供你这一阴谋总部及其一切支部的概况，你必须认真熟悉这些情况，并把法庭上必然会进行的讯问和回答全部背下来，准备这个案件恐怕要四、五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你不要烦躁，安心准备好了，你的命运在于审判过程及其后果，如果你撒谎并做假言，你也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放进了绞索，如果你按所说的做了，你可以保住你的脑袋，政府将负担你的衣食住用，一直到死为止。”

这就是当时的卑劣的手段。（会场骚动）

至于在地方上，捏造的情况更是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州总部“发觉了”所谓“乌拉尔叛乱事件”——即右派、托洛茨基派、社会革命党、教会领袖的阴谋组织。其首领据说是 1914 年入党的党员、联共（布）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书记卡巴柯夫。从当时审理的资料来看，差不多所有的地方、州、共和国都必定有“左翼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以及挑衅破坏活动分子的组织或总部”，理由不太清楚，但共同之处在于这些组织的首领都是州党委或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会场骚

动)

就这样，对“案件”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捏造、逼供招认的各种诽谤性“口供”，以及威逼之下的互相谴责，这些方法的结果是使几千名诚实无辜的共产主义者牺牲了生命。同时针对柯秀尔、丘巴尔、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等等党和国家的优秀活动家也捏造出了“案件”。

那时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结果使党丧失了许多高级干部，只属于军事法庭管辖的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好名单，事先就被判好刑，这样恶劣的手段是得到允许的，叶若夫把这些名单交给斯大林，让斯大林批准这些预定好的刑罚。从1937年到1938年，共有数千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以及经济部门的活动家3831份名单交到斯大林的手里，斯大林批准了这些名单。

大部分这些事件现在正进行调查。已发现许多是捏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案件，所以认为他们是无效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从1954年到现在，高级法庭、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37679个人的名誉，这里头的许多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名誉是在死后才恢复的。

大量逮捕党、苏维埃、共青团、经济部门以及军队中的活动家，不仅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害，而且严重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事业，大规模镇压行动给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共产主义者中撒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形形色色的诽谤家、阴谋家活动起来了。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改善党的作用，然而大规模镇压直到1938年还在进行。

正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拥有伟大的力量，不但能够克服1937—1938年的困难，而且培养出了新的干部。然而，没有1937—1938年的大规模镇压，如果不是造成高级干部的重大损失，我们社会主义的前进和国家无疑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就1937年的卑劣手段而言，叶若夫应受谴责，然而我们必须回答下述疑问：叶若夫难道能够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比如逮捕柯秀尔吗？对此案件有没有交换意见，有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呢？没有。在处理这方面的案件时也是没有的。叶若夫难道能够擅自作出这些关系到党的优秀干部的命运的重大决定吗？不能。认为这仅仅是叶若夫一个人的事的想法是幼稚的。很明白，事情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叶若夫在没有斯大林的命令和批准下是做不了的。

我们重新调查了柯秀尔、鲁祖塔克、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以及其他案件，恢复了他们的名誉，他们究竟是如何被捕并判为有罪的呢？我们重新调查了证据，发现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在检察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捕的。在这方面，是无须任何手续的，要知道斯大林在决定任何事情时又何曾获得手续呢？在此案上斯大林就是首席检察官。斯大林不仅批准了逮捕令，而且主动发布命令，我们说明这些，是为了让本届代表加以考虑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事实证明：这些行动表明了党的一切准则和苏维埃法制秩序都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胡作非为。斯大林怀有病态猜疑，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是了解这一点的，斯大林有时对人说：“为什么你今天总是鬼鬼祟祟？”或者“为什么你今天总是眼下斜而不敢坦然正视我？”因为怀有病态猜疑心，斯大林即使对那些了解多年的党的优秀活动家也不信任，在他看来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

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控制了国家保安组织的贝利亚一伙为了证明被捕者的罪状捏造出来的材料的“正确性”而竭尽全力。然而证据从何而来？来自被捕者的口供，而这些“口供”是由办理负责审理的审判员去索取的。可是怎么对那些人作出罪行的口供呢？答案只有一条——即施加肉体压力进行拷打，使人处在失去知觉的状态，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判断能力和人的尊严，是使用这些办法后获得口供的。

大量逮捕的浪潮在 1939 年开始后退。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开始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家伙，说他们对被捕者使用肉体压迫的方法。斯大林在 1939 年 1 月 20 日给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负责人发出密码电报，电文如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到苏共（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 1937 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用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的顽固的敌人采取例外措施的——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

最近——在本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讯问了审判员罗托斯，罗托斯就是那个曾经审判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的人，他是一个卑鄙愚蠢的人，然而决定了那些党和苏维埃优秀人物命运的，实际就是这个人。此外地还对这些事件从政治上作出判断，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些人有罪，于是就提出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材料。

人民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这样愚蠢的人独自一个人就能对柯秀尔及其他人审讯后定下他们的罪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定命令的话，罗托斯是做不到的。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罗托斯作出如下口供：

“我得到通知，说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于是，我就必须使他们做出是人民的敌人的罪状的口供。”（会场骚动）罗托斯就是靠拷打获得口供的。那时给罗托斯下命令的是贝利亚。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罗托斯还说：“我还以为在执行党的命令呢！”真叫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斯大林关于实行肉体压迫的指示得到了执行。

正如这些以及其他事实显示的那样，党为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法制被破坏了，一件事情由一个人随意决定。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的结果使卫国战争发生了重大问题，从我国小说、电影以及历史学“科学研究”来看，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简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斯大林什么都知道，苏军根据斯大林早定好的作战计划。用所谓“积极防御战术”，这一战术正如我们知道那样使德军进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这些文学作品的逻辑必然是——苏军完全是在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使用了这样的战术才转为攻势打败了敌人，根据这种小说、电影以及“科学研究”，苏联红军以及我国英雄的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全部成了斯大林战略天才的后果。

我们必须对此问题进行慎重分析，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从历史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教育、实践的角度来说，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这方面的事实如何呢？战争爆发前，我国报纸和所有政治教材一致自

豪地说：“敌人胆敢侵略神圣的苏联领土，我们就要加倍地打击敌人，我们将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在我方不受多大损害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然而，这些勇敢的言论并非全部基于具体的事实。如果真是基于具体事实，我国国境就可以在实际上得到保证不可侵犯。

在战争中和战争后，斯大林总是把我国在战争初期经历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然而，同志们，这与事实完全相反。希特勒一登上德国政权的宝座，就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那些法西斯分子公开这样说，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掩盖自己这一计划。

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的，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订立了各种条约，组成了侵略集团。战争爆发前，许多事实表明，希特勒竭尽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他在苏联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以及装甲部队。

据现在发表的文件，丘吉尔在1941年3月通过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利普斯，直接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德国为了进攻苏联而重新编制其军队。

当然，丘吉尔并非出自其对苏联的好感才提出这次警告的。丘吉尔对苏联发出警告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的，即他想让德国和苏联卷入流血的战争，而由此来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正如丘吉尔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向斯大林发出危险的警告，然而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为了不致引起军事行动，不要相信这种情报。”

必须指出：关于德国军队企图入侵苏联领土的这种情报还来自苏联自己的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但是因为领袖们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情报，所以有关人员只能战战兢兢地送上一些谨慎的报告。

例如：1941年5月6日，苏联武官沃罗佐夫大尉从柏林送来下述这份情报。

“苏联公民波齐尔……同代理海军武官作了如下报告，即据希特勒司令部中某德国军官说：德国还准备在5月14日经过芬兰、巴尔干各国以及拉脱维亚侵入苏联。同时还要轰炸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并在国境各城市空投伞兵部队。”驻柏林代理武官弗·罗波夫在1941年5月22日的报告中指出：“克鲁普斯现在确信德苏战争不可避免，迟早会在6月中旬爆发。据克鲁普斯说，德国现在将147个师团（包括空军和后勤部队）集结在苏联国境……”

尽管有这种重大的警告，斯大林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苏联的防卫以免遭到突然袭击。

苏联有没有进行这种准备的时间和能力呢？我们的的确是有时间、有能力的。我国工业已经发达，可以供应苏军所需要的一切物资，这可以由下面这件事得到证明，战争中敌人侵占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以及其他苏联西部的领土，我们丧失几乎一半的工业以及重要的工业、粮食生产地区，尽管如此，苏联却在东部组织生产军用物品，我们把从西部工业地区运出的设备安装在东部，结果我们可以供应我军消灭敌人所需的一切物品。

如果苏联的工业能够认真及时地动员起来，供应苏军必要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恐怕就会非常少了。然而，这样的动员工作并没有不失时机地抓起来，这一来在刚刚开战的时期，我军的装备是很恶劣的，我们显然缺乏击退敌人所必需的大炮、坦克以及飞机。

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战前就能够生产优良的坦克和大炮，然而所有这些都未进行大量生产。实际上，我们在战争前夜才刚刚开始实行军队装备的现代化。结果是，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无充足的生产武器的老式机

械，又没有足够的新式高射炮的生产计划。

我们的反坦克炮弹的生产也未组织起来。许多要害地区一遭到攻击就立即暴露出防卫上的弱点，因为旧式武器已经调走，新式武器尚未运到。

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坦克、大炮和飞机。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充足的步枪可以发给动员参军的士兵。那时，我从基辅给马林科夫打电话：

“人民志愿军参加新军队，要求得到武器，你一定得送武器给我们。”马林科夫回答说：“我没有办法送武器给你。我们已经把步枪全部送到列宁格勒。你们必须自己武装起来。”（会场骚动）

武器的情况就是如此。

与此相反，比如下面这个事实，我们也不会忘记。希特勒军队侵入苏联之前不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柯尔波诺斯（后在前线战死）给斯大林写了封信报告说：德军正在布格河畔作进攻准备，恐怕很快就会进攻了。就此，柯尔波诺斯提议：组织和巩固防卫战线，从国境地区撤出三十万居民，还要设立一些拥有反坦克壕和战壕的坚固据点。莫斯科对这一建议的回答是：这会引起挑衅，所以不要在国境设置防卫工事，这可以使德军没有任何侵苏的借口。这样一来，在我国国境，击退敌人的准备工作只能是不充分的。

甚至在法西斯军队在实际上开始入侵苏联领土的军事行动时，莫斯科下令不要在德军的炮火下应战，为什么呢？事情很清楚，斯大林认为战争并未开始，只不过是德军方面一些违反军纪部队的挑衅活动。而我们一应战，说不定会让德国得到开战的理由。

人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希特勒军队侵入苏联的前夜，一个德国公民越过边境报告说：他们已经接到命令在6月22日凌晨二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这件事马上被告知斯大林，但他对这一警告也加以漠视。

就这样，斯大林对什么都置若罔闻，一部分军队司令官的警告，敌军逃亡士兵的报告，甚至敌人公开打炮都被他置之不理，在这样一个特别紧要的历史关头，难道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警惕性的模范吗？斯大林连这样明白的事情都加以漠视，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战争刚开始敌人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了我国空军、大炮以及其他许多军事装备，杀害了我军大量干部，打乱了我军的阵脚。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无力防御敌军侵入苏联领土的纵深。

从1937到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猜疑心以及别人的挑拨中伤，杀害了许多军事司令员和政治家，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招致了非常令人痛心的结果。在1937至1941年，对于一部分军事干部实行了镇压。他们包括从营长、团长到高级军官，在这个时期，那些在西班牙及远东战争中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差不多全被消灭了。

对于军事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破坏了军纪。因为好几年以来，就在党和团基层组织里教育所有军官以及士兵，要他们去揭发“说不定就是隐藏着的敌人的上级首长的假面具”。（会场骚动）这给战争时期的军规带来了恶劣影响。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们在战前拥有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军事干部。对此，只须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些军事干部当中的一些人尽管被投入监牢吃尽了苦头，但总算活了下来。战争一爆发，他们就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为祖国的光荣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这样说的时

罗科索夫斯基（正如我们所知道他虽然曾被投入监狱）、戈尔巴托夫、麦列茨科夫（他是本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波克拉斯（牺牲在前线的优秀军官）以及其他许多人。然而，另外还有许多司令官都死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他们未能再次出现在苏军阵前。

战争初期极大地威胁了我们祖国的产重局势，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造成的。

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前线遭受了最初的严重损失和失败以后，斯大林认为一切都完了。斯大林在当初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已经永久地丧失了列宁建造起来的一切东西。”这以后，斯大林在很长时期里实际上并不在指挥军事作战，他完全撒手不管了。后来一些政治局委员去见斯大林并对他说：“为了改善前线的状态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只是在这以后，斯大林才积极地重新担当起领导工作。

由此可见，战争初期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可怕危险主要是斯大林错误地指挥我党和我国才造成的。

战争刚刚爆发时，我军组织极端混乱，遭到了巨大损失。然而，我们要指出：事情并不仅仅就此而已，即使在战争刚刚开始以后，由于斯大林抱着神经质歇斯底里地去干涉具体的军事作战，这也使我军遭到了重大损失。

斯大林对前线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除了在前线平静的时候到莫沙斯克公路去作了短时间的逗留外，没有访问过任何前线、任何解放了的城市。就斯大林访问莫沙斯克一事，许多作品掺杂着大量的想象作了描写。此外，还为此作了许多画。斯大林要对作战干涉并发布命令，但这些命令又没有考虑到该前线的具体形势，这当然招致了极大的兵员损失。

就此，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指挥前线作战的作风。出席本届大会的有当时任西南战线司令部作战部长的巴格拉米扬元帅，这位元帅可以证明我在这里讲述的事实。

当时，哈尔科夫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我们作了正确的决定，要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因为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作战的话，我军就会遭到致命打击。我们将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向他说明：为了不让敌人围歼我们相当多的集结部队，有必要根据这一形势变更作战计划。但斯大林不顾我军许多集结部队正处于被围歼的危险，不讲道理地拒绝了我们的方案，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的包围战。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向他恳求：“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在这里出席这届大会）：请你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这一目前的形势。”

我们应当注意：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会场骚动）

是这样的，同志们，斯大林总是在地球仪上查找作战位置的。我向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请用地图向斯大林说明形势。在现在的形势下，不可能按计划继续进行作战了，根据这一正当的理由，务必更改原来的决定。”对此，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我也不能向斯大林说什么了。因为斯大林不愿听取有关这一作战的任何议论。”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向斯大林打了电话，然而斯大林自己不接电话，却让马林科夫代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正从前线打电话，我想和斯大林直接通话。”但斯大林却让马林科夫转告我说：



我应该和马林科夫通话。这次我又重说了一遍前线发生严重局势，我想让斯大林直接了解到，但斯大林尽管离电话机仅几步远，他却不肯接电话，还是告诉我应当和马林科夫通话。用这种方法“听取”了我的希望后，斯大林说：“一切按原计划执行。”

结果如何？预料的最恶劣情况发生了，德军包围了我们的集结部队，我们丧失了几十万士兵。

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为了这种天才，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会场骚动）

战后有一次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谈话的时候，米高扬说：“赫鲁晓夫就哈尔科夫作战打来的电话是对的，遗憾的是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斯大林粗暴到了无法向大家说明的程度。他，斯大林怎么能够不正确呢？他是个天才，而斯大林总是正确的。谁都有错误，而斯大林认为自己决无错误，总是正确的。斯大林在理论上、实际生活中犯了不少错误，尽管如此，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他是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的。本届党代会后，我们恐怕必须重新评价战争中的许多战役，应当让它们恢复真正面目。

在我们成功地挡住敌人，并且成功地转入攻势以前，因为斯大林既不知道战斗的真正情况，又要贯彻那套固执的战术，我们流了很多血。

军人们知道，直到1941年底，斯大林总是不肯采取冲击敌人侧翼并向其背后渗透的机动战术，而是下令不断进行正面攻击，一座一座地夺回村庄，这给我们带来极大损失。只是后来，当肩负整个作战的任何我军将领们为了改善处境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这才使前线局势马上变得对我们极为有利。尤其可耻的是，当付出巨大的牺牲，得到伟大的胜利之后，斯大林就开始贬低那些对胜利作出许多贡献的司令官。斯大林非常关心人们如何评价作为军事领导者的朱可夫同志，斯大林经常问我对朱可夫同志的意见，这时我就回答说：“我老早就认识了朱可夫，他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一位优秀的军事领导人。”战后，斯大林在评价朱可夫时，讲了种种荒谬无稽的话，下举一例：“你夸奖朱可夫，他是不配的，据说朱可夫在前线开始作战前总是做这样一件事，他抓起一把土闻闻，然后决定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不能按计划作战’。”

当时我说：“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发明的，这件事并不真实。”很可能斯大林为了把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及其军事天才贬低到最低限度而编造出这种话来。

同时，斯大林为了抬高自己作为伟大领袖的威信，而进行了非常的努力，他用各种各样方法向人民灌输这样的想法：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是由于斯大林的勇气、果断和天才，其他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正如库斯玛·克留契可夫所说：“斯大林把一件制服同时穿在七个人身上”。（会场骚动）让我们举出我国的历史影片、军事影片以及一部分文学作品来看看。这也有同样的倾向，这些东西简直令人作呕。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宣传称颂斯大林是军事天才这些问题。我们想起“攻克柏林”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只有斯大林在行动，斯大林在许多空椅子围成的一个位置上发布命令。还有一个人靠近斯大林在报告些什么呢——这个人是斯大林的仆人波斯克列贝舍夫。（会场发出笑声）

要是这样的话，军事司令部、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在哪里？军事司令部、政治局、政府干了些什么？对于这些，影片丝毫不提，斯大林代替了一切人

行动，斯大林无须考虑任何人的话，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影片是在假象笼罩下向人民显示一切的。什么原因呢？因为这违反了事实，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而把斯大林包裹在一片光耀之中。

人们要问，肩负战争重担的军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军人在电影里没有出现。只有斯大林的镜头，而没有军人的镜头。

使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并非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雄的军队——它的天才指挥员和勇敢的士兵，以及全体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苏联文化的领导人，各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工程师、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取得胜利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国的核心力量做出了英雄的行动。光荣归于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各个机关的领导下克服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困难，忍受了战争的苦难，为了保卫祖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作出了英雄的行动。苏联妇女在工厂、农庄、各个经济文化部门担负起生产的重担，许多妇女在前线直接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我们勇敢的青年为了保卫祖国，消灭敌人，在前线和敌人斗争中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苏联士兵、司令员以及各级政治领导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军在战争爆发以后的几个月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失去冷静，他们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恢复和整顿了组织，他们在战争中建成了强大的英雄军队，他们不仅挡住了强大精明的敌军，并且粉碎了敌人。

法西斯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他们企图征服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我国数亿人民团结一致创建的伟大业绩是在多少年的时间里被人类感激地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

战争获得胜利的主要作用和功绩，归于苏联共产党、苏联军队，以及在我党鼓舞下的几千万苏联人民。（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我们再来谈其他一些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际上保障居住在我们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平等和友好。在这方面，苏联是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榜样。然而在斯大林的阴谋下却出现了一些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苏联民族政策的行为。我们想指出这样一件事，有的民族，整个地区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都被从故乡集体迁往其他地方。这种集体移民，决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1942年末，正当敌军阵线被我永久性地突破，从而局势有利于苏联时，却作出了将卡拉恰伊人从居住地迁出的决定，这一决定被执行了。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同样的命运落到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头上。1944年3月，全部车臣-印古什人被强迫迁移，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消灭了。1944年4月，整个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驱逐到远方，共和国本身也被改名为卡巴尔达共和国。乌克兰人之所以免遭到这种命运，只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以致于逐驱他们也没有地方了。否则，他们大概也会被斯大林驱逐了。（笑声，全场骚动）

不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要有一些常识的人，谁也不能设想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说整个民族要为对敌行为负责呢？怎么能够针对整个民族，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进行镇压呢？怎么能够要他

们为个别人或某些组织的敌对行为去遭受苦难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人民为自己通过巨大的牺牲、非凡的努力所争得的胜利感到自豪。全国在政治上处于高涨的时期。党通过战争更加团结了。党的干部在战争烈火中受到了锻炼，变得更坚强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认为党内还有什么阴谋活动了。然而就在这时期发生了“列宁格勒事件”。根据现在的证明，这是一起捏造出来的事件，一些同志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丧失了生命。他们是沃兹涅辛斯基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罗吉昂诺夫同志，波波科夫同志等等。

众所周知，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有才能的领导干部，他们曾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这只要指出下面这点事实就够了。正是斯大林让沃兹涅辛斯基当上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而让库兹涅佐夫当选为党中央书记的，从库兹涅佐夫担任国家保安机关的监察工作一事可以看出他受到了多大的信任。到底怎么会把这些人打上“人民的敌人”这一烙印加以清洗的呢？

种种事实表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为所欲为的结果，如果党中央政治局处于正常状态，就可以按照党的作法，对这样的事件的性质加以调查并搜集一切有关事实。那么，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一样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方面在战后是更加恶化了，斯大林更加残酷无情，更容易发火了，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重了，他担心自己被谋害，这种胡思乱想达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许多工作人员在他眼里是敌人。战后，斯大林更进一步把自己和集体隔离开，一切事情就只能由他作主，别的任何人都不在话下。

斯大林的这一猜疑心被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了。这是一个卑鄙的挑衅分子，一个恶毒的敌人，他杀害了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忠诚的苏联人民，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地位的上升引起贝利亚的戒心。现在已经弄清，正是贝利亚，要么他自己，要么他利用他的心腹出马，采取谈话、匿名信件以及各种流言的方式，让捏造出来的东西落到斯大林的耳朵里去。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调查了这一所谓列宁格勒事件，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也恢复了名誉，光荣的列宁格勒党委会的名誉也被恢复了。阿巴库莫夫以及其他捏造出来了这事件的人被送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只是在今天才开始了解到这一事件的真相呢？为什么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些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指挥了审判列宁格勒事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当时对总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也无法干预。斯大林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种材料，他也没有调查这些诽谤性材料就下令审讯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案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同样具有教育意义的是，根据发生在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运动组织事件。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51年及1952年3月就这些事件作出了大量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事先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决定的。斯大林独断专行地处理了这一事件。这个决议是针对许多共产党员的严厉谴责。基于捏造出来的文件，决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一个帝国主义援助下的民族运动组织，其目的是要消灭这个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许多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人员受到牵连，在格鲁吉亚被捕。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这些都是针对格鲁吉亚党机关的诽谤。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和另外二、三个加盟共和国一样，也有资

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但这里有个疑问，问题尚未作出决议的时候，民族主义倾向怎么竟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出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加入土耳其的危险呢？（会场骚动，笑声）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推测。谁都会说格鲁吉亚在苏维埃政权下经济文化获得了多么大的发展。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产量超过了革命前 27 倍多。格鲁吉亚发展了许多革命前没有的许多新兴工业，即钢铁冶金、石油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等。文盲早就消灭了，而革命前的格鲁吉亚有 78% 的人是文盲。把这种情况和土耳其劳动人民的苦难状态相比，格鲁吉亚人怎么可能想起要加入土耳其呢？要知道在 1955 年，就按人口平均钢产量而言，格鲁吉亚相当于土耳其的 18 倍，按人口平均电力生产量则相当于土耳其的 9 倍，据 1950 年的国家形势调查，土耳其人口 65% 是文盲，在妇女中则 80% 是文盲。而格鲁吉亚有 19 所高等学院，共 3.9 万名学生，格鲁吉亚人民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很明显，在格鲁吉亚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无用武之地的。由此可以明白，在格鲁吉亚并不存在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数千无辜的人成了胡作非为的牺牲品。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在这位被格鲁吉亚人称颂为格鲁吉亚民族的伟大儿子的领导下发生的。

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1955 年 7 月党中央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和南斯拉夫发生纠纷的原因，认为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南斯拉夫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兄弟党会议得到解决，没有任何重大理由可以造成这一事件的发展。同南斯拉夫关系的决裂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既无错误也无缺点，然而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夸大了，其结果是和这一友好国家断绝了关系。我想起了苏南关系刚刚开始人为地遭到破裂的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斯大林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对自己名声的看法，他就是这样行动的。

斯大林习惯于说：“我动一动小指头，柯秀尔就完蛋了。”

我再动一动小指头，波斯蒂谢夫、丘巴尔就会完蛋了。”“我再动一动小指头，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就完蛋了。”

然而铁托却没有完蛋，不管斯大林动了什么，即使他不仅动了小指头，而且动了他能弄得动的一切东西，铁托也没有倒台。为什么？这是因为和南斯拉夫同志翻脸的时候，在铁托背后有着经过争取自由独立战斗严酷考验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支持自己的领袖。各位可以由此看出，斯大林沽名钓誉到了何等地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所有现实的意志，他不仅用自己的猜疑心理主观独断在苏联国内来处理 and 人们的关系，而且用来处理和整个一个党，整个一个国家的关系。我们慎重地分析了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找到了适当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是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一切进步人类和苏南两国人民共同承认的。和南斯拉夫不正常关系的消除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有利于加强世界和平。

此外，我们还想起“医生谋杀案”。实际上，除那位恐怕受到某种影响

和命令的女医生季马舒克的叙述以外，什么也没有（她是国家保安机关的非正式助手）。她受命给斯大林写了封信，信里面说医生们使用了不适当的医疗手法，对斯大林来说，只要有这封信，也就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存在着医生阴谋集团，于是他就下令逮捕一批苏联著名医学家。他还亲自出主意去审讯被捕的人，他说应当将医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戴上手铐，说应当殴打其他某些人。作为代表出席本届代表大会的有国家保安机关的伊格纳切夫同志，斯大林向他粗暴地说：“你如果不能从医生那里取得口供。你的脑袋就别想要。”斯大林亲自召见了预审审判员，指示他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审讯方法，这样的所谓方法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所谓拷打、拷打、再拷打。医生们被捕后不久，我们政治局就接到了他们招认有罪的口供。接到这一审讯文件后，斯大林对我们说：“你们真象小猫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没有我，事情会怎么样呢？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问题既然以这样的口气提出来了，人们也就无法调查作为审判根据的这些事实了。人们也不能去接触那些招认有罪的人以判断事实真相。而在逮捕医生的时候，我们是感到怀疑的，他们曾为我们治过病，而当中一些和我们个人是认识的。斯大林死后，我们审查了这一案件，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个可耻的事件是斯大林捏造出来的。然而他没有最终来得及把事情引到自己设计好的结局。因此，医生们总算留了下来。现在他们全部恢复了名誉，并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进行了同样的劳动，他们照样给政府最高级领袖们治病，并得到了我们的完全信任，他们和以前一样，履行着自己的义务。

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劣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组织的走狗。这个家伙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才在党和国家取得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地位的呢？现在很清楚，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那时没有表明贝利亚是党的敌人的迹象吗？不，确实有这样的迹象。在1937年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曾指出贝利亚曾为姆萨瓦卡（土耳其）谍报机关工作，然而中央委员会尚未结束讯问，卡明斯基就被逮捕、被枪毙。斯大林是否考虑了卡明斯基的揭发呢？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这对他来说也就够了，而当他相信了某个人或某件事，那是任何人也提不得反对意见的。谁胆敢提出反对意见，谁就会遭到卡明斯基的同样命运。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迹象，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申诉书是意味深长的（顺便提一下他在坐了17年牢以后，也恢复了名誉）。斯涅戈夫写了下面这段话：

“在恢复原中央委员会委员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的名誉的问题上，我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详细证明，证明在处理拉夫连捷夫案件时，贝利亚的作用和他的毒辣的动机。”

我认为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有关的事实，报告给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因为我认为这个适合写在调查书里。

1931年10月30日，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作了报告。区党委会的全体执行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活到现在的仅有我一人了）。在这一会议上，斯大林在演说末尾就北高加索区委书记处的组成提出一项决议：第一书记为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第二书记为贝利亚（在党史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工作人员被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但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是相当了解贝利亚的，所以他一口拒

绝同贝利亚一道工作，于是斯大林就提议这件事不作决定，在工作中解决。两天以后，下了一道决定：“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而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从北高加索调走。”出席本届大会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作证。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和贝利亚长期不和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这可以追溯到谢尔哥同志在北高加索工作的时候。这种不和导致贝利亚给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捏造了“案件”，这一案件特别追查了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所谓对贝利亚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

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包括了他的罪行和他的辩护。这里，必须提到其中若干事实。特别要提到的是各加盟共和国主席、本届大会的所有代表，可能都知道这份起诉书。在中央委员会就贝利亚背叛行为的通报中，我特别想提到贝利亚如何狼心狗肺地处理了凯德罗夫、戈卢别耶夫以后，又处理了戈卢别耶夫养母“伊特丽娜案件”，他们未经审讯就遭到枪毙，而其判决是在处刑以后再批下来的。共产党员凯德罗夫通过安德列耶夫同志给中央委员会一封信（安德列耶夫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这封信说：“我从利柯斯兰监狱阴暗的单身牢房向你求援，但愿我具体的叫声能传到你的耳朵里去，请不要置若罔闻，务必要保护我，请你给我免去审讯的威胁。人们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我被告于莫须有的罪名，时间将会证明我是有理的。”

“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走狗，不是奸细，也不是他们指责我的那样是一个反苏组织的成员。我对祖国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我是一个全无污点的共产党员，差不多几十年，我在党的队伍里为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进行了战斗。”

“起初，审判员威胁我这个60多岁的老人，说要以更加残酷无情的方法来摧残我的肉体。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不肯承认审判我的方法是违法的，他们为了把我打成顽固凶恶的敌人，为了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还要对我进行迫害。但是，我想我对党是一片忠心的，不管怎样，直到最后一口气，我还是党的忠实的儿子，我是不会变为敌人的。然而，我无处可逃，无法避免正在向我袭来的猛烈的无限制的打击，我的痛苦已到了极限，我的健康完全受到损害，我的精神完全丧失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在苏维埃的监狱里被打上祖国卑鄙叛徒的烙印而死去，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这样极端的痛苦和烦恼撕碎了我的心！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吧！我要高喊，这样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党、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贝利亚总不应当允许这样无法挽回的残暴的行为发生啊！我坚信，如果不是对我进行恶毒和可怕的拷打，如果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审判，是很容易表明这些罪状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我坚信真理和正义会取得胜利，请相信我这个共产党员凯德罗夫，尽管已被法庭判了死罪。”尽管如此，贝利亚还是把他枪毙了。（全场激愤）

贝利亚残酷地陷害了奥尔忠尼启则一家，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妨碍了贝利亚实现其可耻的计划，而贝利亚是要除去可能妨碍他的任何人的。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反对贝利亚，贝利亚把这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甚至没有调查，并给予适当的处理，就同意肃清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而且使得他本人不得不自杀。（会场激愤）这就是贝利亚干的。

斯大林刚一死去，党中央委员会就剥下了贝利亚的画皮。经过非常周密的调查，确定贝利亚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贝利亚被枪毙了。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杀害了成千上万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贝利亚的假面具一直未被揭开呢？原因在于他极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弱

点和猜疑心，他支持斯大林的一切做法，他的行动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同志们，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主要是斯大林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增加自己的光荣而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它可以说明斯大林的自我欣赏以及他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这本书充斥了最为放肆的阿谀奉承，这本书是一个实例，他说明了是如何把一个人神化并把他说成是没有错误的圣人，说成是最伟大的领袖，说成是不管什么时期都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最高战略家的。总之，凡是能够把斯大林吹捧上天的一切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没有必要举出充斥这本书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的实例，我们必须附加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本人批准和编辑的，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本人添加进草稿的，斯大林在编这本书的时候，认为最主要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过要让给他作诗的阿谀奉承的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没有，相反，他在认为对自己的功劳歌颂得不够的地方就补上一段。

下面是斯大林亲手补上去的若干段：

“斯大林和怀疑主义者、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一伙进行了战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紧密地把党的核心领导团结起来，他高举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把党团结在列宁指示之下，将苏联人民引导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道上，斯大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领袖。”

斯大林亲自写了这段话后，又加了下面这段话：“斯大林完美地担负了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他受到苏联人民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是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

从古至今，有这样的自吹自擂吗？这难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吗？决不！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反对的。此外，敬爱的弗位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斯大林小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到这段话后太难为情了，于是亲自改为：“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正如我们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

你们大概知道，斯大林本人而不是人民对他自己作了怎样的颂扬，斯大林亲手把称赞自己的话写进这本书的草稿之中，特别是斯大林用了大量的话吹嘘自己是军事天才和战略天才，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斯大林是如何吹嘘自己是军事天才的。

斯大林写道：“前进的苏联军事科学被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在判断战争形势的时候，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包括：起永久性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理论，进攻和反攻的法则，近、现代化战争中军队和武器的合体，坦克集结群和空军的作用，炮兵作用等等，在战争的任何阶段，斯大林都天才地考虑了一切因素，从而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

斯大林还写道：“斯大林的军事天才，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得到发挥。斯大林天才地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击破了它。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进行战争是极其巧妙地用兵的典范。”

用这样的方法将斯大林颂扬成了战略家，斯大林本人并没有起到战略家的作用。同志们，这是事实，是可耻的事实。

除了这本斯大林传略外，让我们再举出一件事。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写的，顺便提一下，为了满

足个人崇拜，这本书是约了一批作者写的。这可以由斯大林传略再版中下面这段话证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是在斯大林同志合作并取得他本人最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准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

然而，斯大林对这一段却感到不满意，在传略最终的版本中用了这段话：“由斯大林同志执笔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出版。”这是加上去的。

（会场骚动）

经过这样的更改后，集体的著作成了斯大林个人写的书了。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疑问：斯大林既是本书的作者，为什么将自己吹嘘成这等地步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和人民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历史歪曲成“斯大林天才”呢？这本书难道能够正确反映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努力吗？难道能够正确反映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主义的道路而采取的措施吗？这本书主要写了斯大林集团、他的演说和报告。任何一件事没有例外，都和他的名字连接起来。这就毫不奇怪由斯大林来写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难道是这样的吗？另外，还搞了斯大林奖金，（会场骚动）可是甚至连沙皇也没有设置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金。

在苏联国歌中，共产党连一句也没有提到，而斯大林认为这个国歌最好，因为这里面有对斯大林无与伦比的颂扬：

“斯大林教导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完成伟大使命”。

国歌的这一部分，把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党的一切教育领导思想活动全部归于斯大林。当然，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贬低了党的作用。必须附带指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经通过决议：要编写反映党和人民的作用的歌词作为国歌。（长时间热烈鼓掌）

此外，许多大企业和城市都用斯大林名字命名，这难道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干的吗？他难道不知道在全国各地都树起了斯大林纪念建筑物和纪念这位活人的塑像吗？斯大林本人在1951年7月2日签署了部长会议主席团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他的大型纪念碑，同年9月4日，他又下令拨出了33吨铜来建造这座大型纪念碑。到过斯大林格勒的人肯定见过。在人们甚至无法通过的地方，斯大林的全身铜像已经树立起来。战后，在这一地区的人民正住在简陋的小房子的时候，却花了巨额款项来建造这种铜像。请大家想想，斯大林在自己的传记中写道：“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真是这样吗？

同时，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的措施是缺乏敬重的。尽管30多年以前已经决定建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纪念物，但是这个纪念物项目总是延期乃至不了了之。这决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我们还不得想不到1925年8月14日的政府决议：“在教育事业上设立列宁奖金”。这个决定虽在报纸上发表了，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设立列宁奖金，这件事必须纠正过来。（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用了上述的办法，就象我们在斯大林传略中引用那骗人的事实：把整个历史，包括伟大的十月革命在内，全说成好象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起第一位作用。许多文学和电影作品对列宁形象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贬低。



斯大林爱看《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这部影片。在这部电影里他被描写成了站在装甲车上，亲自用指挥刀消灭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克里门特·埃弗里莫维奇（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把斯大林的真相描写出来吧。他是知道斯大林是如何战斗的，伏罗希洛夫接受这件事可能有困难，但还是接受的好。不但党和全体人民同意，就是连他的孙子也会感谢他的。（长时间鼓掌）

出席本届大会的人数中 99% 在 1924 年以前差不多根本没听说过斯大林，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列宁，可以说全党、全体人民，从孩子到老人都知道列宁。（暴风雨般长时间鼓掌）所有这些，必须彻底纠正过来，历史、文学、美术必须正确反映列宁的作用，正确反映我们党的作用以及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

同志们，个人崇拜将错误的原则应用在党的事业和经济活动中，个人崇拜使党内、政府内的民主遭到了粗暴的践踏，造成了没有效果的行政管理，对于各种非法行为和缺陷的掩盖和对于现实的粉饰，在我国出现了许多拍马屁的人、虚伪的乐观主义者和骗子。

我们还不曾忘记，在苏联经济方面的领导人大量被捕的阴影下，许多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失去了自信，变成了谨小慎微，害怕任何新事物，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要吓一跳，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就拿党和苏维埃决议实行的情况来看吧，这些决议都是在不考虑到具体情况用千篇一律的方法执行的。情况发展到党的活动家们在不管多么小的会议上都只是照本宣读一下“演说”，这就产生了党和苏维埃事业公式化，整个机构官僚化的危险。

斯大林不愿考虑到现实生活，不肯注意地方上的实际情况，这可由他对农民的指导得到证明，只要对国内形势关心的人都知道农业的困难情况，但斯大林对此却毫不在意。我们有没有把情况向斯大林说呢？的确确实说了，然而他并不支持他们。因为他是不了解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的，他只是从电影上看到农村和农业。可是这些电影都对农业的实际情况作了极大的美化。许多电影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描写成火鸡和鹅，压弯了的麦子，显然斯大林认为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弗拉基米尔·里伊奇则抱着与众不同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的生活，他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接触，他常和人民代表会面，常在工厂集会上发表演说，到农村进行访问，和农民谈话。

而斯大林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他什么地方也不去。这已有几十年了，他对农村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 1928 年 1 月，那时，为了谷物供应问题，他到西伯利亚去了一趟。这样一来，他又怎样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呢？

有一次在讨论时，他听说农村形势困难，家畜和肉类的生产尤为恶劣，于是就让我们制定一项决议，要设立委员会来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及国营农场的家畜饲养业。我们制定了这一计划。当然，当时我们的提案并没有把所有可能性都包括进去，但却提出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产品产量的方法，就当时畜产的发展，我们提议，为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给予物质刺激，应当提高畜产品的价格。然而我们的这项提议却未被接受，到了 1953 年 2 月，这一提案被完全放弃。

不仅如此，在讨论这一计划的时候，斯大林提议说农民生活很好，对集体农庄农民增加税额，只不过象鸡身上拔一根毛一样。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吧。实际上集体农庄的农民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价值 212 亿卢布。斯大林的这一提议，可曾见过任何资料？显然没有，斯大林说什么、什么，那就一定是什麼、什麼，反正他是天才，而天才是无须斟酌的。不须明了就立即指出应当

如何的了，他只要发表意见，一切人就必须重复这些意见并称颂他的贤明。然而，农业税提高到 400 亿卢布这样的提案难道也是英明的吗？不！完全不是！因为这一提案不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评价，而是基于脱离实际的个人空想。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上摆脱农业困难的道路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各位代表的演说，使我们大家受到了鼓舞，我们高兴地听到许多代表在演说中指出，已经具备条件以使畜产业第五个五年计划在 2、3 年内完成，毫无疑问，新的五年计划将成功地实现。（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我们现在质烈地批判斯大林在世时广泛推行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精神的不良现象的时候，可能有许多人要问：“怎么会这样的事呢？斯大林难道不是 30 年间里领导着党和国家吗？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是取得了许多胜利吗？这些能否定吗？”我们认为提出这种问题的只能是那些被个人崇拜迷了心窍的难以救药的人，那些对革命事业和苏维埃国家本质不能理解的人，以及那些不能从马列主义出发，对苏维埃社会发展中党和人民的作用进行曲解的人。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和贫农并得到一部分中农支持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人民实现的。列宁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创造了工人阶级战斗的党，而且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法则这一在和资本主义的战斗中无产阶级的胜利科学武装了党，并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严酷锤炼中把党钢铁般团结在一起。在这战斗中，党一贯捍卫着人民的利益，党成了人民的富有经验的指导者。党给劳动人民夺来政权、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列宁这样一段英明的话：“历史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的，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人民群众了解这一点。”我们历史性的胜利，归功于党组织的活动，大量地方机关的活动以及我国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这些胜利是全体人民和党的伟大势力和活动的结果。决不象个人崇拜时期描绘的那样是什么斯大林领导的结果。只要我们从马列主义这一角度来考虑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明确指出：斯大林晚年的领导方法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

对于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极重要的一些问题，对于一些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拖了好几个月不去解决。在斯大林领导下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和平关系经常受到威胁。因为一个个人的决定往往形成严重纠纷的原因。往往酿成了这些纠纷。近年来，我们抛弃了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国内外政策方面采取了若干适当的措施，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来，是如何有利于他们积极开展工作。是如何有利于发挥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而所有这些，又是如何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鼓掌）

有的同志可能会质问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这帮人当时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不及时地主张反对个人崇拜？为什么只是到现在进行了这一工作？对于这一点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局的人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是有不同见解的。刚开始的时候，政治局委员的多数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权威和思想给予党的干部以及党的活动家以巨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以后，尤其在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而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捍卫着列宁主义，并大规模地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很高。并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党必须和企图侵犯

我国、背离马列主义正确道路的人们，即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到了后来，斯大林日益滥用其权力，开始打击党和政府的优秀领导人，并对诚实的苏维埃公民采取恐怖措施。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斯大林就这样处决了柯秀尔、鲁祖塔克、艾赫、波斯蒂谢夫以及其他党和政府的优秀领导人。

谁要试图起来反对这种毫无理由的猜疑心和责难，这个人必然会成为镇压行动的牺牲品。波斯蒂谢夫同志的死正是由此而来的。在他演说告一段落时，斯大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谢夫同志明确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同志，我是布尔什维克。”这种说法开始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敬，后来就被认为是有害的了，结果波斯蒂谢夫失彼镇压，并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打成人民的敌人。

对于当时的一般形势，我常和尼古拉·阿列克塞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交谈。有一次，我们两人同去旅行。他说：

“常常有这样的事，作为朋友被斯大林邀请去的一个人，在他和斯大林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知道在这以后将被送到哪儿去，是自己的家呢？还是监狱。”

显然这种状况使政治局委员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只要考虑到，在斯大林晚年，中央委员会没有召开过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那人们就能理解对于我们政治局委员来说，要想对某个错误或不正确的措施以及领导方法的重大缺点和缺陷采取反对态度是多么困难。

正如前面指出的，许多决定都未经过集体的讨论，而由一个人作主或传阅通知一下。众所周知，政治局委员沃兹涅辛斯基的悲惨命运正是斯大林专横行径的牺牲品。将他从政治局开除的这一决定也没讨论过，而是采取了非常的作法。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诺夫被撤职的决定也用了同样的手法。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重要性减少了，它的工作则由政治局所设立的各种小委员会——所谓“五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八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来担当。可举 1946 年 10 月 3 日政治局决议为例：

“斯大林提议：

一、政治局外交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今后不仅过问外交问题，还要参与国内建设及国内政策问题。

二、六人委

员会加上苏联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兹涅辛斯基，

称七人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名）”

这简直是扑克牌的术语。（会场笑声）很明显，在政治局设立这样的委员会，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其结果是政治局部分委员不能参与国家最重要事项的决定。

我党最老的党员之一——克里门特·埃弗里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处在一种手脚简直无法动弹的状态。连续几年里，他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斯大林不让发给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文件。每当伏罗希洛夫同志一听到召开政治局会议消息时，他总是要打电话问能否参加。有时斯大林也同意他出席，但总是勉勉强强的。斯大林出于自己极度的猜疑，荒谬地怀疑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英国的特务。（会场笑声）的确怀疑他是英国的特务。

为了听到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自己家里的谈话，安装了特别的窃听器。（会场激愤）

斯大林作出片面的决定：将现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列·安德列维奇·安德烈耶夫从政治局的工作隔离开来。这是肆无忌惮的恣意行为之一。还应当考虑到下面这件事，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召开以后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在自己的演说中点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名字，把一些毫无根据的罪名加在这些党员身上，斯大林如能在自己的权力宝座上多坐几个月的话，真说不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能不能在这次党代会上演说了。显然，斯大林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他常说政治局委员必须有新人来换。第十九次党代会以后，斯大林提出 25 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目的在于除去政治局的老同志，而引入经验不多的新人，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来颂扬自己。可以推测，斯大林的意图在于将来进而肃清政治局的老成员以掩盖自己所有那些可耻行为——也就是我在这里分析的那些行为。

同志们，为了不至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以前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度的称颂。当然，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指出的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同意之下做出来的。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同志们，列宁经常强调指出：“谦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绝对不可少的。”列宁本身就是谦虚的最好化身。我们不能说自己在这方面已经以列宁为模范，向他学习了，只须指出以下这一点就够了。许多城市、工厂、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机构、文化机构以我们的名字命名了，好象成了这些仍在健康地进行活动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私有财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参与了各个城市、电台、企业、集体农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行动。我们必须纠正这一点。

（鼓掌）

然而这件事应当慢慢地稳步来做：为了防止错误和过头，中央委员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慎重考虑。我想起了乌克兰人是怎样得知柯秀尔被捕的。原先，基辅电台总是一句：“柯秀尔电台开始播音”，然后才播送节目的。有一天，没有听到柯秀尔的名字就开始了节目。于是每个人都知道柯秀尔出了事。而且恐怕自己被逮捕。因此我们现在撤销所有这些命名称号，人们就会认为：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用的命名的这些同志遭到了什么不幸，会认为他们又被逮捕了。

（会场骚动）

以往，某个领导人的权威和重要性是如何判断的呢？是看有多少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已经到了我们消灭这些“私有财产”，把工厂、企业，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了。（笑声、掌声，赞同声）这是符合我们的主张的，个人崇拜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体现的。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

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我想，大会代表们能够正确理解所有这些提案。（雷鸣般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个人崇拜，我们还必须在思想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作出正确的结论。其目的如下：

第一、要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指出个人崇拜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气味，而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并对个人崇拜进行斥责和消灭。对于企图复活个人崇拜的一切尝试，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要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在思想活动的一切领域，必须重新树立并真正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重要原理，即作为历史创造者，人类一切物质精神福利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的决定性作用。在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共产主义的胜利等等。与此同时，必须作出巨大努力，以在历史、哲学、经济学及其他科学或文学美术领域对个人崇拜的有关的种种错误见解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批判和纠正。特别有必要在最近的时期编写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客观性的党史教科书、苏联社会史教科书以及有关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事件的书。

第二、要把过去几年以来，党中央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了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些工作的特点是，所有的党政机关从上到下严格遵守党领导下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集体领导的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了的党内生活原则。广泛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

第三、要彻底恢复那些由苏联宪法规定的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与滥用职权的个人专制行为进行斗争。由于个人崇拜的恶劣影响，长期以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了破坏，由此而产生的恶果，必须完全加以肃清。

同志们，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获得了新的力量，而且不可动摇地团结起来。大会还表明了我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决心。（雷鸣般鼓掌）

我们彻底地提出了同与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个人崇拜这一根本问题，并提出要消灭其恶劣后果。这一事实，乃是我党伟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的证明。（长时间鼓掌）

我们坚信，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各项历史性决议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将带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道路取得新的成功和胜利。（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

我们党的光荣旗帜——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长时间鼓掌，一同起立）

### 附录三 参考书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列宁全集》  
《列宁文稿》  
《斯大林全集》  
[中]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  
[苏] 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  
[中]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  
[中]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  
[英]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  
[英] 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  
[苏]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政治肖像》  
[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法] 让·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  
[中] 解力夫《纵横捭阖——斯大林》  
《赫鲁晓夫回忆录》  
《托洛茨基回忆录》  
[南] 米洛凡·德拉热斯《同斯大林的谈话》  
[苏] 鲍里斯·巴扎诺夫《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  
[苏]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美]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  
[美] 路易斯·费希尔《斯大林的生与死》  
[苏] 列夫·费尔德宾《斯大林大清洗内幕》  
[苏] 康·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苏]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  
[苏]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斯大林死之谜》  
[苏]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  
[英]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美] 罗·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  
[苏] 阿列克赛·阿米别依《赫鲁晓夫的悲剧》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  
[苏] 费利克斯·梅德维杰夫《布哈林案件》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美] 马丁·艾波恩《出逃的斯大林女儿》  
列昂纳德·根德林《克里姆林宫大墙之内——斯大林和歌剧演员达维多娃》  
[苏] 阿·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